

出版者說明

奧古斯特·倍倍爾(一八四〇——一九一三年)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創始者與傑出的活動家之一。他在從事活動的初期,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領導之下,對世界工人運動有過巨大的功績。他後來雖然犯了中派主義、即隱蔽的機會主義的錯誤,但是直到他逝世為止,他却始終保持着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信心和忠誠。

本書譯文係根據英文節本譯出。作者在書中從一八四〇年寫到一八七八年秋為止,敘述了上一世紀德國工人運動的興起,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創立和成長,以及作者本人成爲社會主義的最熱誠的信仰者和革命家的經過。

序 言

給英文版的讀者

我高興地答應我的出版者的請求，來利用我的英文版的回憶錄的序言，跟讀者說幾句話。

我想，回憶錄的目的在於向大眾說明在某一時期中和某一行動範圍內起了重大作用的人所受動機與環境的影響，並有助於更清楚地了解某些當時的事件。

我個人的信念，就是，即使是一個最卓越的和最有力的人物，往往也是被推動的，而不是推動力；他所能做的，只不過是在某一既定的社會狀態下，在勢必被承認與實現的事上，加上些助力，促其實現罷了。我既有此信念，乃使我免於自視一己的作為是大過於一個自願促成一件新生事業的助成者的，而他對於這種新生的根源，也是全然無知的。

我的生活環境把我投入於一段歷史演進過程中的一個助手的地位，同時這也是我的經驗的一種後果。一旦被投身於這起源於上一世紀六十年代的德國工人階級運動之中，我的責任與興趣，不但使我參加在這運動中所產生的意見的爭執之中，並且也使我去省察當時新湧現的思想觀念，並且要盡可能地來公平決定，我是贊成它們還是反對它們。這樣，就在幾年的過程之中，我由一個堅決的社會主義反對

者變成爲它的最熱誠的信仰者。我過去是一個掃羅而現在變成了一個保羅；甚至直到我的暮年，我仍保持是個保羅，而且還愈益堅信我的信念是正確的，因而只要我活着，我仍將是個保羅。

由於過去五十年在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工業發展的結果，所謂羣衆的無產階級化正在穩步地前進，並且引起了一種不斷加深的階級對抗，產生了人類中這樣的一個階級，它的利益與現存的經濟制度的衝突變成空前未有的尖銳，並促使他們進入社會民主主義的行列——現代工人階級。若沒有這巨大的經濟發展及其後果，我與那些有相同信念的人，也許仍能用天使們所使用的語言說話，可是這些話是不會產生任何效果的。由於這樣發展的結果，無論如何，我——並且我並不全部否認在這件事上個人的功績——經某些人的幫助，成了德意志社會民主黨的領導者，這個黨在今天是世界上那種色彩最強的黨；它直接或間接同時影響德意志帝國的對內與對外政策的黨，其影響之大，實在遠超過了它的對手所肯承認的。帝國的前總理卡普里維伯爵是當時唯一的一個政治家肯老實承認政府在準備每一個提交帝國議會的法案，都得考慮過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可能影響。並且沒有一個熟悉德國情況的人會懷疑：若沒有這樣一個强有力的社會民主黨存在，德意志的外交政策更不知要多麼蠻橫。

這書也許可能引起英文版讀者的興趣，從這些回憶錄中可知道德意志社會民主黨怎樣達到了今日這樣有力的地位。目前這一段回憶錄記到一八七八年秋爲止。那時經過

兩次謀刺威廉皇帝以後，俾斯麥親王乃以爲這時正便於敦促帝國議會通過一套高壓法案：這一套對付社會民主黨的辦法維持了十二年以後（直到一八九一年）證明完全無效，斷送了的是親王自己的宰相職位。

俾斯麥親王曾希望這套法案，即令不能鎮壓住這個黨的發展，至少也可以阻滯它的發展。可是他注定要親眼目睹，把這個黨的組織及報紙禁壓了以後，這個黨所能有的票數却從一八八一年的三十一萬二千票增加到一八九〇年的一百四十二萬七千票。到那時候，已是德意志最強大的黨了。這種勢力的增長完完全全說明了他的壓制立法不但是無效的而且是多餘的。被擊敗了的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而是俾斯麥。他的被免職標誌着他的失敗。

這情勢表明在反社會主義法之前，使我們的宣傳一再成功的那種力量，在這法律條例實行後，仍在繼續起着甚至更大的作用。並且直到今天它們仍在起着作用，這可由一九一二年一月間，帝國議會最近一次的選舉來證明，當時這個黨所得的票數不下四百二十五萬票，有一百一十個代表選進了帝國議會。這事實，從黨員百分之九十九是工人這點上看來，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這樣發展的特徵乃是從一八八一年以來——這日期是在反社會主義法下的第一次競選——雖然本黨代表的議席數目有所增減，票數却一直是在穩步地增加；這一點，本黨視爲有着決定性的重要意義，這是黨的成長的真正的標幟，並且是黨已較以前更深地在下層階級紮根生長的確實標記。

這成功之可能完全繫於以啓發羣衆爲目的的緊張而不

斷的宣傳；這種工作需要大量的時間、精力、錢財的犧牲與一個偉大組織的創建，反過來，唯有各種力量的合作才能得到這種結果。我也不否認，我已把我的全力貢獻給了這次成功。

奧·倍倍爾

一九一二年六月舒恩堡—柏林

目 次

序言

第一章	童年與少年時期.....	1
第二章	學徒與職工生活.....	12
第三章	我參加了工人運動與公共生活.....	21
第四章	拉薩爾宣言及其後果.....	27
第五章	德意志工人會社聯合會.....	30
第六章	斯圖加特城大會：威廉·李卜克內西.....	37
第七章	一八六六年的災禍·一八六六年的戰爭及 以後.....	45
第八章	德意志工人會社聯合會的進展·我私人的 瑣事.....	58
第九章	紐倫堡大會.....	64
第十章	工會運動.....	71
第十一章	我的第一次判罪·“國際”與拉薩爾派的 糾葛.....	76
第十二章	施維澤爾與他所領導的無產階級勞工 運動.....	79
一	傳記.....	79
二	“社會民主黨人”報.....	84

三	施維澤爾——一個議會的雄辯家與全勞工聯合會的獨裁者	91
四	巴門—易北菲爾大會·全勞工聯合會內部對施維澤爾的反對	96
五	愛森拿赫大會·社會民主勞工黨的成立及工人會社聯盟的解散	101
六	愛森拿赫會議以後·施維澤爾的結局	107
第十三章	在議會中	117
一	北德意志立憲議會	117
二	北德意志帝國議會與關稅議會	123
第十四章	普法戰爭	129
一	宣戰之前	129
二	不倫瑞克黨委會之被捕	134
三	德意志帝國併吞亞爾薩斯—洛林	138
四	被捕	142
第十五章	議會的活動·叛國罪的審判	149
一	德意志帝國議會第一次會議	149
二	德累斯登大會·帝國議會第二次會議	153
三	在萊比錫進行的叛國罪審判	157
四	帝國議會的其他演說與“不敬罪”的審判	160
第十六章	在要塞中	164
一	漢勃土斯堡	164
二	哥尼斯坦	170
三	士維考	171
第十七章	由一八七一年至哥達大會	174
一	各國政府與社會民主黨	174

二	社會民主黨的兩派	176
三	一八七四年的會期	179
第十八章 從哥達統一大會至反社會主義法律		
	前夕	184
一	統一大會	184
二	餘波·我對巴黎公社的態度	187
三	更多次的起訴	192
四	一八七六年哥達的黨大會	194
五	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七年的競選運動	196
六	一八七七年的哥達大會·選進薩克森議會· “未來”報	199
七	入獄時機又成熟了	202
八	內政·在萊比錫監獄中	206
第十九章 執行反社會主義者法律的前夕		
一	謀刺皇帝及其後果	210
二	第一次“特殊條例”或稱壓制條例	212
三	努畢林的謀刺皇帝及其結果·一八七八年的選舉	214

第一章

童年與少年時期

人是隨處可以誕生的。一八四〇年二月二十二日，當我在寶滋一堪倫的砲台的穹窿中看到了光亮的那一刻，我也享有了這種權益。我的父親，約翰·高脫樂勃·倍倍爾，是步兵第二十五聯隊第三中隊的一個下士，我的母親是威廉明娜·約翰娜，娘家姓西蒙。

說一些關於我父親和母親的事，並不是多餘的，因為是對於了解我的性格所必需的。我的父親是生在波森省的俄斯脫羅伏地方的一個桶匠的兒子。我想我的假定是對的：就是倍倍爾家約在宗教改革時，從日耳曼的西南部遷向東去。我確知有一家姓倍倍爾的，早在一六二五年就住在西利西亞的克呂慈堡；可是在日耳曼的西南部姓倍倍爾的人却更多。我父親遷回日耳曼西部的原因是因為他和他的學生兄弟奧古斯特——我的教父——一起被編入了普魯士——波蘭的一個聯隊；但是，當一八三〇年波蘭起義爆發時，普魯士政府便想最好還是把這些軍隊調離波森省。於是我父親的聯隊便歸屬於當時的梅因斯的聯合砲台。這一次的移動促使我的父親有機會和我的母親相識。

我的母親生於一個久已定居在前帝國自由市威茲勒城

的不甚貧窮的小資產階級的家庭裏。她的父親是一個麵包師兼自耕農。當家中人口增多時，我的母親便到法蘭克福去做工。她從法蘭克福又到了梅因斯，就在那裏終於認識了我的父親。後來我父親的聯隊重又駐紮在波森時，我的父親，爲討好他未來的妻子，也許因爲他喜歡萊因河西岸一帶的地方甚於他的故鄉，便設法調到常備軍的第二十五聯隊裏去，駐紮在寶滋一堪倫。他的孿生兄弟奧古斯特——我的教父，跟着他學，調到常備軍的第四十聯隊去，當時駐紮在梅因斯。

那時候一個普魯士軍隊的下士的家庭只能在很困苦的情形下生活。俸給只是聊勝於無。在那些日子裏，普魯士的軍隊與官吏階層只能仰靠着很有限的收入過活；差不多每一個人都要忍饑挨餓，都要爲了上帝、國王與祖國束緊褲帶。說普魯士是忍饑挨餓而起家的這句話，是含有真理的。我的母親有某種營地售物的執照——也就是說，她具有售賣一些零星雜物和食品給士兵們的許可證。櫃台就在我們唯一的一間屋子裏。這情形現在仍在我的眼前，看她在菜油燈光裏，把半辨士一份的熱氣騰騰的煮洋芋盛到兵士的陶瓷碗中去。對於我們小孩子說來——那時我已得了一個弟弟——穹窿裏的生活正充滿了樂事。我們在好些房間跑進跑出，受着軍曹與兵士們的撫愛與調笑。等兵士們都出去了，我常常到我的教父溫脫曼軍曹的房間裏，從木栓上取下他的吉他來玩；我務必要彈得把弦全弄斷了才罷休。爲了減少這種毫無羈勒的練習的破壞性，我的教父用一塊木頭刻成一隻吉他形的東西，上面也裝上弦。這樣我

就能和我的弟弟，在寶滋大街的一個院落的門口坐上幾小時，來亂彈這些琴弦，以致引得住在街對面的騎兵中隊長的女兒們大為高興，竟往往有時送給我們點心和糖菓來酬勞我的演奏。當然啦，軍事操練不許為這種音樂練習的利益而受到妨礙；整個的環境鼓勵了軍事操練；它簡直是風行一時的。

可是我的父親漸漸地用另一種眼光來看兵士的生活了。的確正如我母親時常對我們說的，他是一個完全與眾不同的漂亮、規規矩矩、而又有良心的兵士；可是在那時他已經服兵役十二年多了，這種生活已經過够了，而且也厭倦了。顯然，他並不缺乏當時在萊因省地方特有的獨立與反抗的精神。好幾次，當他回到自己陰暗如穹窿的房間裏來時，他滿面怒容，嘴裏還在咒罵着。在經過十五年服役以後，他有好幾個月因為很重的病，躺在陸軍醫院裏，面對着死亡與以後一家將忍受的窮困，他反覆地和很迫切地警告母親，在他死後，切勿將小孩送進陸軍孤兒院去，因為一進去就必須受服役九年的條件的束縛。他還怕母親迫於無奈，也許還是可能這樣做，他就以那種由於病勢沉重而引起的激動一再地叫着：“如果你那樣做了，我一定在連隊面前把孩子們刺死！”他完全忘了，到那時他已經死了。

就某一種意義說來，我的父親在一八四三年年初，得到了拯救，他被委任為邊防軍。他接受了委任，並且帶着全家，有時步行，有時乘坐裝載傢具的大車——因為那時還沒有火車——到達了靠比利時邊境的一個小城漢佐根那特。

可是在那裏我們沒有住所。由於艱苦的守夜，我父親

却在三個月見習期尙未滿期之際患了很重的病。我母親把這種病叫作肌肉發炎；我想是風濕症；總之，肺癆跟着也來了。我父親既然見習尙未滿期，當然不能解除兵役，我們又須同着重病的父親一道照來時一樣回科倫去。對我母親說來，那真是苦日子。

在科倫父親被送入陸軍醫院，媽媽被配給了一間營房。十三個月後，父親死了，享年三十五歲，却並未留給母親請求撫恤金的權利。他死後不久，我們便不得不離開這間營房，若不是我父親的孿生兄弟奧古斯特·倍倍爾來照顧她和我們這幾個孩子，她還要被迫回到她的出生地威茲勒去。爲了更好地盡這份責任，他便在一八四四年的秋天，決定跟我母親結婚。我的繼父早在一八四一年九月脫離了軍籍，那是由於他先害了喉頭炎後來又轉成肺癆，結果失了音的緣故。他得了一份“撫恤金”，每月兩個泰勒，約合六先令。此後，他在梅因斯的一所陸軍醫院做了兩年巡警，後來又做了科倫附近勃勞魏勒一所感化院的看門人。一八四四年的夏末，我們在勃勞魏勒住了下來。這所感化院是由一大片房屋、院子、菜圃空地構成的，四周繞着高牆。男犯、女犯、少年犯都分別監禁着。要進到我們的住處所在地的監獄屋子裏去，我們得穿過好幾座院落，打開好幾扇門得很嚴緊的大門。監獄是跟外面的人類世界完全隔絕了的。入夜，暮色初起，幾十隻大大小小的貓頭鷹便在屋子上飛翔，尖銳的鳴聲，使我和我的弟弟異常恐懼。這些貓頭鷹築巢在附近禮拜堂的墓園裏。就是不提這事，這樣的家也決非我們小孩子所喜歡的；就是對於我們的父母，依我的想法，也不會

滿意。那些囚犯是被虐待的；他們的呻吟、尖叫聲，在整座建築物內震盪着，當然使我與我的弟弟感到恐懼。

在勃勞魏勒地方，我被送入鄉村小學去，那時只有五歲上下。

那時生活非常單調，極大部分的時間被關在獄牆裏。我們的父親，生性就嚴厲，很容易發怒，這種傾向由於他的肺癆病的加劇而更厲害了。母親與小孩都爲了這緣故受許多氣。好幾次，當他激憤得發狂，已開始鞭打我們的時候，我的母親不得不奪住了他的手。若體罰是教育智慧的最高的流露，那我早該是一個卓越的人物了。不過誰敢如此武斷呢？不論我現在是怎樣一個人物，是和鞭打沒有任何關係的。

另一方面說來，我們的父親爲了我們，的確盡了最大的努力，因爲他到底是一個好心人。例如逢到聖誕節、新年或復活節，他爲使得我們高興，往往盡他微薄的收入所及地化費；當然即使如此，他所化的錢也是不很多的。除了供住處（兩間房間）、燃料和燈火以外，我父親還有八泰勒（合二十四先令）的月俸。這些錢得養活五個人。

我父親的病加劇得很快，一八四六年的十月十九日他死了。我的弟弟與我對於繼父的死，覺得是從壓迫下釋放了出來。不論那一次小孩子的自我表現，只要他認爲不當時就加以懲罰，那種嚇人的嚴厲，使我們一見他就發抖。他使得我們怕他。愛他，那是我們從來也沒有感覺到的。我母親怎樣忍受第二個丈夫的死亡，我不知道；不過這次不是一段快樂的婚姻。從這第二次的婚姻上，她又未得到撫恤

金。無可如何，只能回到她的故鄉威茲勒去。十一月初，我們又一次把我們所有的東西都裝上了車，出發向科倫去。那時天氣嚴寒，又下着雨。到了科倫，我們的傢具都卸在靠近河邊的道路上，候船運到珂勃倫茲，再從那裏裝車溯拉恩河流域到威茲勒。第五、六天我們才到那裏。

威茲勒住着我們的外祖母，我母親的三個姊妹和一個弟兄——他們都已結了婚。在這裏我們度過後半期的童年。我先被送進貧民學校，它所佔用的那所房子從前是屬於條頓騎士團的。在院落裏還存着那幢二層的樓房，就是歌德的“維特”裏的女主角，夏綠蒂·勃夫住過的。後來我碰巧，有好幾次睡在那座屋子裏，因為我的一個表姊做着這名勝夏綠蒂的房間的導遊人。我記得很清楚，一八四九年舉行的那次歌德百年誕辰的紀念會，就在維爾特巴哈泉水附近，從這次以後，這泉水便稱為歌德泉了，十年後在薩爾茲堡市府劇場舉行的席勒的百年誕辰紀念會我也在場。

幾年以後，這貧民學校歸併入公民學校（公共初等學校）。我們——從前貧民學校的學生——於是被稱為免費生。

在學校裏，我跟我的先生們處得很好。我是最好的學生之一，因此我的幾何教師，一個非常傑出的矮小人物，竟開始啓發我，使我與其他兩個孩子窺得了數學的奧妙。甚至我們還學會了應用對數表。較次於算術與幾何，我所喜歡的科目是歷史與地理。宗教指導對於我毫無意義，我也不大管它，而且在家裏我母親——一個開明而有自由思想的女人——也不為這事來麻煩我們。我之學習它，只是為

了不得不學而已。我雖然是算在最好的學生中的，可是有時回答我們的首席牧師的話，却是和他的哲學不能調和的，這樣我便要受到善意的訓斥了。雖則我是一個好學生，所有的功課都是名列前茅的，而做各種的鬼把戲我也是屬第一的，因此我得了品行墮落的壞名聲：尤其是我們的唱歌教師，他的工作是一一若不是爲了他的大肚子，或是年紀老，或是由於某種慣常的權利，我再想不出別的原因了——對於一切經向校長告發的惡作劇，由他來處罰違犯校規的學生。

我在唱歌教師心目中的壞名聲漸漸生了根似的，他以爲凡是一切頑皮事情，我當然都有份。若是爲了免使一個同伴受到不公平的處罰而去替他申辯，那我馬上受到嫌疑，即使我是完全無辜的，也一同受到處罰。後來在黨的事務上，我這種特性——無論如何，都求公正——使我得到一個綽號：“公理維護者”。我們的唱歌教師給我的判斷倒大多數都是十分公平的。

我也有懂事的一天了，我對自己說：“現在你應該開始成爲一個懂事的人了。”事情是這樣發生的：駐紮在威茲勒的來復槍大隊的少校的兒子是我許多次逃學中的同伴。考試的日期近了，外面請來的人只一個，就是我這個朋友的父親，他的身材可真是又高又大。考試結束了，把成績唸出來，也够奇怪的，竟是完全按品行而定的。所有的學生都聽到自己的分數，除了我和我的朋友。只有我倆各得五分——最低的分數。這位少校，眼睛也不瞬一下，我可很明白，我那好朋友回到家不會得到好話的。從那天起，我就再沒有

看見過他。他立刻被送進了軍官學校。後來我聽說他得到了高的軍階，可見得在學校裏做個壞孩子對他就如同對我一樣，是沒有多大損害的。不過從這一刻起，我就成了個好孩子——那就是，任何可被罰的事我都不做了。下一次的考試我得了第三名，又下一次也就是末一次我考了第一名。按照我們這一級的意見，我甚至還該得一份發給的獎品。當校長宣讀第二個得獎人的名字的時候，全級一致喊出了我的名字。校長說我雖然已經改過了，可是還不配得到一份獎品；因此我就未得獎而踏出了學校，走上人生的道路。

在威茲勒我們的境遇絲毫不能改善。母親無從請得撫恤金；在後來的一個時期，她從政府方面所得到的唯一的款項，是我們兩個孩子每人每月約十八個辨士的錢。這是她不顧第一個丈夫的警告，把我們兩個孩子的名字送進波茨坦陸軍孤兒院之後才發給的。這是貧困逼着她這樣做的。爲了謀求維持我們的生活，她已經把從她母親那裏繼承來的土地賣掉了好幾小塊。使得她做出這件事，在她是非常困難的，因爲她原已下定決心，凡是當時還在的東西，她要一絲無損地留給我們，免得她死後，我們一文莫名。我從我自己的母親身上看到了，一個母親爲了她的兒女真是不惜犧牲一切的。有一次，她爲姨夫——一個製手套的人——縫製白色的軍人手套，工價約合兩辨士一雙。她一天做不了兩雙——這些錢還不够維持生活，却够累死人了；即使這種工作，兩年後，她還是不得不放棄了，因爲那時她也染上了肺病，在她最後的那幾年，肺病使她什麼工作都不能做。我是最大的男孩子，必須料理家務，煮咖啡，收拾房間，每星

期六還得擦洗房間。我得收拾錫蠟碟子和廚房的用具，整理牀鋪等這類事，這種經驗對我後來出外尋覓工作和做政治犯的時候是非常有幫助的。後來到母親連日常烹飪的事都不能做的時候，我們通常到姨母家去吃飯；至於母親要吃的一些東西，是我們到幾家比我們富有的人家去取來的。這時，我決意自己去賺些錢，就到了一個九柱戲球場中當小廝。放學後，我便經常到一所花園飯店的九柱戲球場裏去，每次柱子給擊倒了，我便去把它豎起來。每晚非將近十時不能回家，星期日還要更晚些。這樣不休地俯下身去，使我背痛得老呻吟着回家，最後我只得不幹了。在秋天時，我們孩子們的另一件工作，是到我們的一個姨母的田中去裝洋山芋。這可不是一件好事——從早晨七點鐘到天黑，在那又冷又濕又多霧的氣候裏；我們得的代價是一大袋的洋山芋，可用以度過冬天，並且每天早晨到田裏去之前，我們還能分到一種令人興奮的食品——一大片葡萄乾蛋糕，這東西是我們非常喜歡的。

當我十三歲，我弟弟十二歲的時候，我弟弟接到通知，可以進入陸軍孤兒院了。我在軍人體格檢查時，未能及格，便被認為不適於服役。但是這時候我母親却沒有這種勇氣了。感到她的末日將臨，她不肯負責讓我弟弟爲了先受兩年免費的軍事教育而在役九年。她說：“你願意當兵的話，以後，你自動去參加好了；我現在不願意負這種責任了。”因此我的弟弟就沒有入陸軍孤兒院。至於我，却爲了自己被拒絕而感到難過。

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的革命年代激起了我幼稚的幻

想。威茲勒大多數的公民，依照當地的傳統，都是同情共和政體的。連學校中的學生也抱有這種同情。有一次我記得，有若干學生正在爭論他們在政治方面的派別問題的時候，偏巧只有兩個孩子——我是其中之一——自稱是王黨。這件豪舉害我們挨了一頓痛打。以後要是我的政敵們因我的反愛國主義觀點而大為憤怒時，因為他們以為帝制與祖國是一個東西，那我就請他們好好的記住：在他們的祖父與父親尚在年輕無知還是反愛國主義者的時候，我已經為祖國而受苦了。在那個時期中，萊因省的大多數人民是共和主義者。

我們這些孩子對於當時在威茲勒附近所發生的農民起義非常感興趣。那時農民還處在封建時期殘餘的種種奴役之下。當時大家都充滿了自由平等的思想，農民自然也要解除這種壓迫。他們聚了數千人向沙倫—勃朗費爾王子的堡壘進軍。他們進軍時，通常抗着一面黑白的大旗——普魯士旗——表示他們願成為普魯士人，却決不願為勃朗費爾人。這種隊伍中有幾個人帶着槍，大多數人却只有鐮刀、草耙、斧頭等武器。這種行列已發生過幾次，却從沒有發生過流血的事，後面跟着威茲勒的駐軍，目的在保護王子。至於本城的民兵，在那幾年中也已在威茲勒出現了，我對他們却公開的輕視，因為他們連一絲軍人的漂亮勁兒都沒有。

一八五三年我們成了孤兒。六月裏我的母親死了。她平靜無畏地面對了死亡。在她去世那天的下午，她覺得臨終的時刻近了，叫我們去喚她的姊妹來，却並不告訴我們為什麼這樣做。當她的姊妹來了，我們被叫出房間去。我們

悲傷地在樓梯上坐上幾小時，等着什麼事情發生。末了，快到七點鐘時，她的姊妹從屋子裏出來，告訴我們母親死了。就在當天晚上，我們只得收拾起我們的東西，沒有看見我們死去的母親就跟着姨母去了。可憐的婦人！她不論做妻子或做寡婦的時候，都沒有幾天快樂的日子；可是她還常常保持着樂觀與好興致。三年之內，她葬了兩個丈夫，並且失去了兩個孩子。因着病痛，給她添了很多的憂慮。一八四八年，我染了傷寒症，有好幾個星期在生死的邊緣上徘徊。幾年後，我又擔心也許會成爲跛子，結果，腿骨倒是健直的。我的弟弟在九歲時，從梯子上摔了下來，頭腦受了震盪，頭頂上也受了重傷。他沒有死真是僥倖。我母親至少忍受了七年肺病的痛苦。很少的母親能夠忍受比這更多的苦難與憂愁了。

當時，我到一個姨母那裏去，她有一個無條件繼承的水車；我的弟弟則到另一個姨母家去，她的丈夫是個麪包師。在磨坊裏，我得使自己顯得有用。我最喜歡趕那兩頭驢兒到鄉下農夫家去，送麪粉給他們，又把麥子馱回來。除了驢兒以外，我的姨母還有一匹馬，二頭牛，幾隻豬和幾十隻雞鴨。她還種了點田，因此頗不缺乏工作；雖然她有一個兒子幫助她，還用着一男一女兩個工人。當男工忙不過來的時候，我得照顧馬匹與驢兒，並且有時騎了馬兒去飲水。養家禽的那一角場地歸我單獨照料；我得餵養它們，拾取蛋兒，收拾窠棚。在這種工作中，一八五四年的復活節來臨了。我已到了學校生活的末期了。對這件事，我有着非常錯綜的情緒。我是非常願意留在學校裏的。

第二章

學徒與職工生活

“那麼，你想幹什麼呢？”我的監護人問我——他是我的
一個叔父。

“我想當個採礦工程師。”

“什麼？你有那麼多錢來供你唸書嗎？”

這一問，使我的夢想煙消雲散了。

我之所以回答“我想當個採礦工程師”，是因為最近威
茲勒附近鐵礦開採正在發展起來。既然學做採礦工程師已
完全不可能，我便決定做個鐵工，那也不過是因為我母親的
一個朋友的丈夫是一個著名的手藝高超的鐵工，並且他也
願意收我做學徒的緣故。雖然我決不是個笨漢，可是，老實
說，在車牀上，我却從未有過出色的手藝。實情是我為體力
所限；從小孩時起，我的身體一向很弱，又素來營養不足。
好多年來，我們的晚餐只有那麼不大不小的一片麪包，上面
塗一點黃油或果醬。我們每嚷肚子餓時——我們每天都嚷
——母親總這樣回答，“有時候，即使一個人肚子沒有很飽，
也得束緊褲帶”，這就可以明白，為什麼有好多年，我的最大
的志願只是要有一次能把麪包、黃油吃個痛快。

我的師父和師母是很正派而又可敬的人。我們吃的東

西雖然不怎麼豐富，但是也還不錯。工作很苦，而且作工時間也長；我清早五時開始上工，一直工作到下午七時，中間很少間斷；放下工具，我們就匆匆忙忙去吃飯，吃完飯，又拿起工具做。我在清早第一件事是必須到遠處一口井中去提水回來，而做這件工作，師母每星期給我一個半辨士——這是我學徒期間的唯一的零用錢。平時我極少出門，即使是在晚上散工後我也是這樣；並且外出時也從未有一次不經特別允許的。星期日也一樣，因為星期日正是我們生意最忙的日子，農人都趁這天進城來買東西、修器具，只有等到傍晚時，我才有二、三小時的自由。星期日的早晨，師父讓我到禮拜堂去；可是這項特權，我並不重視，常常設法逃避了；同時却仔細打聽當天唱了那幾首讚美詩、講道的牧師的姓名，免得被師父問出破綻來。可是，末了，到底被我師父查出來了，他只冷冷地說，既然不進禮拜堂去，還不如留在家中的好。於是我連這一點自由也失去了，我便更努力地讀書，那時既沒有人指導我怎樣讀書，我自然盡讀些小說。在學校時，我已讀過“魯濱遜飄流記”和“黑奴籲天錄”，現在我最喜歡的作家是海克朗特，他是一個寫和平時期軍人生活的小說家。我對軍事性質的事物的熱忱却因看了他的小說而大大地冷淡了下去，我也看華爾脫·司各脫的小說，和一些日耳曼的歷史小說家的小說。從前在家的時候，我曾保存了幾部歷史著作，例如希臘、羅馬的簡史和幾卷普魯士歷史。從這幾本書裏，我把普魯士的國王、名將和戰役等的年代都記住了。

我心焦地盼望着做學徒的日子快些滿期，因為我久已

想到外面去看看世界。可是這日子並未能如我所期望的那麼早就到來。在快要出師的時候，師父忽然死了；丟下師母一人，沒有人能來照顧，並且她打算把店舖出賣抵債，我便決定留下幫她的忙，因為她一向待我很好的。我努力地工作，從五月到八月，從日出上工直到晚上九點鐘才歇手。最後，到一八五八年的一月底，店舖賣掉了，我才得踏上我的旅途。師母算給我每星期一先令六辨士的工資，另送三先令作禮物。二月一日我開始步行出發，我的弟弟伴隨了我好幾哩。臨別時，他哭得很傷心，這頗不像他平日的性格。從此我就再也沒有見到他；一八五九年夏天，他在病了短短的幾天之後，就死了。這便剩下了我一個人，全家最後的一個。

我先到法蘭克福，住了兩天，再坐火車到海德爾堡。那時技術工人在各地來往必須帶着護照，須經警察在路上各處站口檢驗蓋章後才放行，若有規避，便要受罰。在有些城市裏——例如海德爾堡——他們還得到警察所去受體格檢查，尤其注意傳染性的皮膚病。從海德爾堡，我去曼亥謨，再到斯拜亞斯，在這裏我找到了工作。我受到很好的待遇，而且吃的也好，可是我得睡在作坊的角落裏。這也是那時的習慣，工人得跟店主同吃同住。工資却低，——約兩先令一星期——當我訴苦時，店主說他自己開始做工人時也是這點錢。然而那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那就是在斯拜亞斯，我竟愚蠢得在一場賭局旁坐了下來，一下子就輸了十八個克呂什，約合六辨士，差不多是我一星期的工資的四分之一！我就發誓再不賭錢，從此我終生履行了這一誓言。

春來時，我又踏上了旅途。我浪遊過巴萊丁侯區，經過蘭都、卡爾斯羅和其他城市，最後來到了巴頓南邊的弗蘭堡；在那裏我度過了一個非常愉快的夏天。從弗蘭堡的位置看來，它是德意志城市中最受人喜愛的一個城市，它的周圍環繞着雄偉的森林和許多引人入勝的美麗的風景。可是我却極希望有境遇和我相似的少年朋友作伴。那裏，手藝人的同業工會已經解散了，工會却尚未組成；那裏的工人竟沒有政治性的俱樂部可參加。至於純為社交性的俱樂部，我既無錢，又無興致去參加。就在這時候，我發覺了一個所謂天主教技工組合的存在，它在弗蘭堡有它自己的會址。等我確知它也收受非天主教徒為會員，我便參加了。

後來我居留在德意志南部和奧地利的時候，一直是這種天主教組合的一分子，並且我從未因參加了該組織而後悔。而他們對於信仰不同宗教的會員也從未表示過不能容忍。這種組合的任何一地的會長都是教士，會員中自己選舉一個資格老的會員做代表。會中常舉行演講，並有各種學科的班次授課——例如，法文——因此，這種組合，就某種範圍來說是一種教育機構。在它的閱覽室中，有許多報紙雜誌可供閱讀；雖然這些報紙雜誌只限於天主教的，我還是高興讀它們，原來我對政治感到很大的興趣。正派的青年的社交需要，在這裏同樣得到了滿足。這種集會有一種特點，就是主持集會的牧師們，也大多年輕而又活力充沛，他們也喜歡與年紀跟他們相彷彿的年輕人聚在一起。我有多少個愉快的黃昏，都是與這輩年輕牧師共同度過的。到今天，我仍珍藏着那本在第一頁上印着聖約瑟——這組合的

監護神的畫片——的會員手冊。

一八五八年九月，我離開弗蘭堡，徒步穿過黑森林來到了瑞士的歇夫浩森。那時，普魯士百姓是被政府禁止進入瑞士的——第一，因政治上的不同，第二，爲了防止人民沾染上共和思想。因此我趕快離開歇夫浩森，坐船駛過鮑騰湖——我暈船了！——又旅行過好些城市，最後，來到慕尼黑。在慕尼黑，我逗留了整整一個星期，還是找不到工作，就決定到勒鐵斯蓬去。在旅程的第一段，我搭乘在一隻木筏上做工以充船資而順流航行了伊薩河。

我在勒鐵斯蓬沒有碰到什麼有趣的事情，不過與老闆鬧了一架，儘管天氣嚴寒，二月一日我終於離開了該城。我和一個同伴先回到慕尼黑，然後打算進入奧地利。那時穿過奧地利邊境是件難事，你得向邊境上的守兵表示你至少有五個葛爾頓（約合八先令）；而我們却沒有這麼多的錢，我們忽然想出方法來利用火車，從巴伐利亞邊境上的最後一站上車，進入奧地利境內。外表上，竭力裝出我們是“先生們”的樣子，我們把皮鞋擦得特別亮，一身衣服都細心刷過，另外每人還裝了一條白硬領。結果完全成功，邊境上的守兵毫不疑心地讓我們通過了。在嚴寒、深雪中，我們徒步穿過了泰洛兒，在美麗迷人的陽光下，我們來到了薩爾茲堡，城中的美景迷惑了我們，許多房屋、禮拜堂都是美得令人眼花撩亂的意大利式的建築。

後來，我回想到這些浪遊的時期中，自己屢次被雨淋得全身濕透，冷徹骨髓，却從未得過大病，往往自己也覺得奇怪。我從未有過羊毛的內衣，而大衣則是從未奢想過的，可

是一個職工在路上撑起一把雨傘在當時將會成爲人們嘲笑或輕視的對象。時常在早晨，我仍得穿上前一天淋濕了的而當天一定會淋得更濕的衣服，可是年輕却戰勝了許多困難。

在薩爾茲堡我找到了工作，我就在那裏住下，直到一八六〇年二月底。一八五九年的夏天真是美麗的；可是那時正有戰爭——奧地利對意大利與法蘭西的戰爭。大批的軍隊開過薩爾茲堡，唱着歌兒，興高采烈地出發；幾個月以後，被打敗了，垂頭喪氣地退了回來。這些政治事件使我如此地激動以至於我把每個星期日——平時，我沒有空閒——整天都用於在咖啡館中看報。普魯士人當時在奧地利並不十分受歡迎，因爲那時普魯士沒有馬上就來幫助奧地利，被認爲是一種背信的行爲。但是後來，當泰洛兒來復槍義勇隊在薩爾茲堡設立了一個招兵處的時候，我的冒險的慾望支使了我去應徵，却因我是外國人而被拒絕了。可是，後來我從家鄉聽說普魯士正在動員軍隊，我便決心去充當祖國的一名志願軍。當時我就寫信給我的監護人，請他匯錢給我做路費；等錢匯到——六個泰勒，約合十八先令——已宣告和平，戰爭也結束了。可是錢已到我手中，於一八六〇年二月，我決計回家一趟。

我要用一次懺悔來結束我這段關於薩爾茲堡的回憶。偷果子素來是我的一個弱點；我想我是因爲某種遺傳因素而犯罪的人。在薩爾茲堡也不能例外，在兼任主教的公國君王的果園中，那樣光彩耀目的梨子引誘着我，我犯了罪。我始終不認爲這位主教會因此而難過，並且梨子當然對我

也沒有什麼損害。可是後來我讀到聖·安佈露司的文章時，我良心上的疑懼才消失了。他活到將近四世紀末，曾做過米蘭的主教；他在什麼地方這樣說過：“自然把一切東西給所有的人共享，因為上帝造萬物就是為了所有的人共同享用的。因此，賜予了共同享用的權利的是自然；而創始了財產的所有權的是不義的巧取豪奪”。

對於我的這種行爲，哪裏再有比這種說法更好的辯護或言之成理的呢？

那是在一八六〇年的三月裏，我重又回到離開了兩年多的威茲勒。我去投効軍隊，他們因我體格虛弱而延遲一年收錄。下一年又這樣，最後，到底因體格不合格而被拒絕了。

在威茲勒，我跟一個同行業的猶太主人作工；但是後來天氣轉好了，我的三個老同學便邀我一道動身到萊比錫去，我竟禁不住他們的誘惑。其實，我心裏一點也不想到萊比錫或薩克森尼去，倘若由我自己決定，也許我始終也不會到那邊去的；可是這一次的旅行，在好幾方面，對我整個的未來都有了決定性的影響。一個人的命運的決定者，往往就是機會。

在這裏，我想要插一段閒話，就是我堅決不同意這種說法：人是他自己的命運的主宰。人的行動是爲環境所迫的。所謂意志自由不過是夢想而已。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人並不能預料他行動的後果；只能在事後看出哪些結果是哪些行動造成的。他若不往左而往右走一步，或者反過來，往右而不往左走一步，結果可使他陷入一連串的完全不同的境遇

中，這境遇可能比他目前實際所處的境遇好得多，却也可能壞得多。至於他決定選擇的轉捩點，選對了或選錯了，那也只有的事後看到了這事的後果或影響才能說。² 往往因為沒有判斷事實的標準，甚至他自己也不知所從。所謂自力更生的人，只在極小的限度內存在。多少品質比爬上高位者好得多的人，都生死於默默無聞之中，因為不順利的環境使得他們潦倒——就是說，阻礙了他們個人的特長的更好地應用和利用。事實上是有利的環境把人提到了在人生中特殊的地位。因為大多數人不能得到這種地位，便在人生的餐桌上沒有了他們的席位；而即使環境於一個人有利，他必須有適應能力來利用這環境。可是這用不着個人的真才實學的。

我們步行到魏瑪，從那裏坐火車到萊比錫，在一八六〇年五月七日夜間十一時到達了該城。我很幸運地立刻找到了工作，而且正是我後來自己創立的那種事業。假若我遲二十四小時到達萊比錫，別人就會先我而得到這個工作。這是又一次，一個幸運的機會決定了我的將來。這是第二次，我在一家比普通工場規模要大好些的工場裏做工。我們一共有五個職工和一個學徒。我喜歡我的主人和我的同伴們，並且也喜歡這種工作，它對我是一種很好的訓練。我討厭的是早晨喝的咖啡很壞，午飯的質與量都很差。³ 早點、午後的咖啡和晚餐得由我們自備。我們和主人住在一起，七個人睡一個尚算寬敞的頂樓。不久，我便對這種吃食起了反感。只不過幾個星期，我引動了夥伴一同向主人提出抗議，並且表示如果他不讓步，我們大家便要放下工具不幹

了；換言之，雖然我們從來未聽到過這個名詞，我們却已用罷工來恐嚇了。協商了好久，主人允許我們自置膳食，由他給我們一筆膳費。後來我們又在清早睡在牀上堅持不起身，爭得了清早七時上工——本來是六時——的權利。更後來我們還勸誘主人給我們論件計工，雖然起先他聽都不要聽，他怕結果會產生“偷工”；不久他便知道他想錯了。最後，我們還得到了“住在外面”的權利。

第三章

我參加了工人運動與公共生活

一八六〇年的時候，從一八四九年以來壓迫人民的保守黨的反動勢力已開始衰落下去，這情形尤其是由於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的壓力，他們既已發展了他們的經濟力量，獲得了財富，便開始對政治發生興趣。同時，“德意志問題”獲得了新的生命，得到了極大多數人的熱情的支持。國家同盟要求召集一次德意志議會。目光比較遠大的自由主義者馬上看到了獲得工人支持的重要，為達到這個目的，他們藉助於舉辦工會組織，設法把他們認為可靠的人弄出來做工會組織的領袖。

那時候的德意志工人對於政治簡直一無所知。在反動的年代裏，政治活動已經死亡了。還有幾個工人的俱樂部，但它們却不參預政治。德國有幾個邦，連這種組織都因被認為它們會宣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被禁止。事實上，這些名詞，對於我們較年輕的一代，實在是毫無作用的。也許我們中間有些人曾讀過威特林的關於共產主義的文章，這却是例外。我實在想不起來，那時在萊比錫的人中間有誰對於“共產黨宣言”或馬克思與恩格斯在革命運動中的地位能略有所知。從這點上，我們可以知道，那時候的工人們

並未意識到他們的階級利益，更不知有一個“社會問題”存在。他們很熱心地去參加自由主義者幫他們組織的會社，而把那些自由主義者的領袖們當作他們最忠實的朋友。

萊比錫在當時被視為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的重要的中心。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我第一次參加了公共集會。那是由工藝會社的會長，一位大學教授召集的，他主張建立一個“工人進修會社”（按文字上說是“文化聯盟”）作為工藝會社的支會，因為若正正式式的稱工人會社，那時在薩克森尼也是被禁止的。這主張為另一位教授和當時在場的幾個工人所反對，他們要求充分的獨立性，主張這新的會社的主要目的必須是政治性的，至於教育則可由學校來推行，它不必在一個成人的會社中佔一項。當時我並不贊成這種主張；可是我很欽佩這些工人敢反對有學問的大學教授，衷心地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有他們那種談話的本領。

該會社組成的當晚我就參加了。演講與授課的人大都是教授或大學生。課程有英文、法文、速記、簿記、德文和算術，還有唱歌班和體育班。第二年我被選為二十四個執行委員之一，任圖書館館長和娛樂部的主任。我要當眾演講的願望，不久便達到了，因為我在執行委員會上找着一個辯論的機會。後來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我第一次演講時，講了才幾分鐘，坐在會議桌上的人便互相詢問：“這人是誰？他竟敢這樣說話？”

關於這會社的獨立地位和政治性的問題，在這會社內繼續爭持不決。反對這件事的人的策略，實在欠佳。對於大多數的年輕的會員，這種教育計劃是最有益處的，他們却

不願取消它。最後，反對派分裂出來，而且創立了一個新會社——前進社。雖有許多來勸我加入該社，我到底沒有參加進去。

這新的會社——前進社——並不只限於本社的聚會，也召集工人的和一般的集會來討論勞工問題和當前的一般問題。在這種聚會上講話的人們，也並無固定的目的。所討論的題目有工人傷殘保險、全德意志展覽會、全民普選問題以及為討論勞工問題的一個德意志議會，而最重要的題目就是，召開德意志勞工大會。因為這種相同的意見在柏林與紐倫堡也被提出了，於是便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我被選為委員之一。國家同盟也常集會討論下列諸問題：即德意志問題、建立全德海軍的問題、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問題以及普魯士議會中的齟齬問題。

無論普魯士的內部情形如何，自由主義者認為它是德意志諸邦中唯一能統一德意志的一邦，並能保護他們不為羣衆所控制。俾斯麥對於這些自由主義者知道得很清楚，他說：“他們雖恨我，但是更害怕革命。”他確能做到有什麼就利用什麼，他僱用了好些一八四八年的民主主義者；他還想設法利用那時在倫敦的李卜克內西，他還利用了羅塞·蒲契爾，想由這人引卡爾·馬克思來做“普魯士國家公報”的撰稿人。這種手段其實就是路易·拿破崙的手段，他專會巧妙地引起階級間的相爭，以維持自己的統治，甚至以普選為代價亦在所不惜。不久，便可很明白地看出，俾斯麥正想激起勞工運動來對付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在萊比錫舉行了一個會議，討論對於勞工大會的關係問題，柏林派了個代表

來，那人叫愛許勒。這個愛許勒一下子就大肆活動起來啦；他說，工人不必希望從自由主義者和國家同盟那裏得到什麼；不過他的確知道——從這種談話裏，他自己揭穿了自己的假面具，他實在是俾斯麥手下的一個特務——俾斯麥贊成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選舉，他甚至準備預支九千鎊或一萬鎊的款子給柏林工程師協會來設立一個生產合作社。就是這些工程師在當時被認為是進步自由主義分子的中堅。這種想法，後來拉薩爾也提倡過，不過當時拉薩爾這名字我們還不知道，雖然那時他的聞名的“工人綱領”已經出版了。一次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選舉的想法，那時已經俾斯麥的同僚樞密大臣華蓋納宣傳得盡人皆知。提出的辦法是由樞密院發佈命令實行。自由主義派對這計劃完全不發生興趣，覺得這有點太像拿破崙第三的方法了。

在後一時期——一八七八年的九月——當議會中正在進行辯論關於俾斯麥的反社會主義的辦法時，我指出了這些策略，同時控訴了俾斯麥以前曾設法要利用社會民主黨來達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現在却正在想盡辦法來摧毀它。俾斯麥承認愛許勒曾被警察當局所僱用。至於拉薩爾，他表明，並不是他，而是拉薩爾先表示願意與他開談判的，雖然談判進行時他並未加以阻止，而他至今仍不後悔。事實上，根本並無談判這回事，那可憐蟲拉薩爾又有什麼可以提供給他的呢？他早為拉薩爾所吸引，因為拉氏實在是他所認識的人中最高尚而又最可愛的一個人。加之拉薩爾又不是一個共和主義者；拉氏的理想是恢復德意志帝國，也就是他深表同意的理想。

聲稱拉薩爾爲保王黨的這樣一個極其無意義的企圖，實在是不值一駁的；拉薩爾的著作、信件具在，足夠證明這話是胡說。可是拉薩爾對俾斯麥的態度，仍覺得有些特別，由於他對自己的自信，並對自己獨立態度的自覺，竟想與俾斯麥開談判，就像兩大政權之間那樣，雖然事實上，他並無力量作後盾。至於這兩人中究竟誰佔優勢，我們也不必問，一八六四年八月拉薩爾的逝世把雙方的一方收拾掉了。

俾斯麥還否認他準備推行普選。我並不能證明事實與此相反，可是拉薩爾在法庭上替自己辯護時，曾說：“在這莊嚴的場合我向你們聲言，在下一年之前，俾斯麥公爵將要飾演洛勃·庇爾而實行普選。”

若拉薩爾跟俾斯麥兩人的會談中沒有談到這問題，我們很難相信拉薩爾竟會說出這樣的話來。當時，在保守派的圈子中，大家也很嚴重地辯論這事，俾斯麥當然決不是這種人，在他認爲適宜的時機要樞密院發一紙命令實行普選時，竟會顧及憲法上的細節而中止實行他的計劃。羣衆實際上素來一無政治權利的，當然更不會因此而怨恨。

但是我早已料到這些事情，我再回到我的敘事上去。我們派了代表到柏林去，與柏林的勞工領袖商議後，很快地便決定了德意志勞工大會在萊比錫開會的日期及大會議程；可是他們回來時對自由黨的領袖的談判，却頗爲失望。當國家同盟在萊比錫屢次集會中，顯然對於工人們並不視爲同路人。在第二次代表團到柏林去時，在我們心目中關於自由主義黨派的領袖們對勞工運動毫無同情這件事就毫不存疑了。就在這時，著名的軍火工廠羅威公司的創建人，

年輕的羅特維喜·羅威安排了與拉薩爾的會面。在這裏，我們的黨派知道了他們所尋求的是什麼——他們雙方的需要諒解和同情。事情是這樣與拉薩爾約定的，把大會延期到他的那本講工人在國家與社會中所處的地位的小冊子發表後再舉行，那本小冊子將由萊比錫中央委員會分發出去。

我在一八六二年十一月脫離中央委員會。我在工人進修會社中的工作佔據了我所有的時間、興趣和精力。所有晚上的時間全化在會社裏面，不久我便比會長們更深知會中同人的種種需要。我是極懇切地提出動議的，而這些動議在執行委員會會議和每月的例會上也幾乎總是通過的。這就大大地增加了我的聲譽。那時我依然是一個工人；我在車牀旁，每天從早上六時工作到晚上七時，中間只吃飯的二小時的間歇。而且，中央委員會的辯論和集會時的演說常顯得模糊和無目的，因此我毫無留戀地離開了它。

第四章

拉薩爾宣言及其後果

到底，在一八六三年的五月裏，拉薩爾發表了他的“宣言”[⊖]。幾天前，乘我們工人進修會社成立二周年紀念日的機會，我曾演說反對普選，理由是工人對於這事尚未達到成熟時期。我的這種行動，很使我的一些朋友嚇了一跳，雖然這篇演說詞很討了我未來的妻子的歡喜，她那時是聽衆之一。

這“宣言”在工人中間完全未起拉薩爾及其友人們所預料的作用。這種情形是無法避免的，因為那時工人們在經濟和政治方面仍然是非常落後的。經商自由，無遷徙限制，職業自由及居住地自由，廢止行路護照，集會結社的權利——這些都是工人們所能懂得的要求；至於“國家輔助生產合作社”這種事，他們簡直莫名其妙。那時聯合或合作這種想法還剛開始。甚至普選這件事在大多數工人心中都不覺得是不可或缺的事。正當自由主義派的報紙攻擊拉薩爾最爲激烈的時候，而保守派的機關報如“十字報”處事反倒比較客觀些，因為他們對於拉薩爾的攻擊自由主義派，未嘗不

⊖ “爲在萊比錫召開全德意志勞工大會給中央委員會的公開信”，這“宣言”通常認爲是德意志社會民主主義的起點。

私心竊喜。我們這樣地受到保守派的支持，頗使我們在萊比錫受到懷疑。不過倘若我們能記得，即使在今日已經過了五十年的啓發工作，努力提高工人知識，指導他們認識真正的利益，尙且有千百萬的工人去跟從資產階級的各黨各派；那麼對於在六十年代時，大部分工人以懷疑的眼光來看這種新的運動，我們當可不以爲奇了。

這“宣言”在萊比錫的作用是分裂了中央委員會。在別處所起的影響也一樣；柏林完全沒有反應；這運動漸漸在漢堡以及其他許多德意志的城市如漢諾威、喀賽爾、杜塞爾多夫和法蘭克福展開。拉薩爾原希望在短期內爲“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爭取到會員十萬人，作爲政治上的一大勢力。事實上，却須好些年後，社會主義運動才經常有這麼些人參加。萊比錫委員會在某次巨大的羣衆會議上辭了職，羣衆便選出一個新委員會，來起草一個爲成立“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的綱領。

四月十六日拉薩爾來到了萊比錫。在一個四千多人的集會上，他把他的意見在一篇演說中發表了，後來印出來的就是他的那本“勞工問題”。這次集會有許多自由主義者也在場，不時打斷他的演說。在後來討論時一個自由主義進步派的領袖起來抗議拉薩爾對他們一黨的攻擊，並反對在自由黨以外另外特組一個工黨。拉薩爾回答時態度非常溫和，原來他爲了自己所發起的運動，不但希望得到羣衆的喝采，而且還希望能贏得資產階級黨派的有力量的領袖的協助，他那時還希望能把他們拉到他那一方面去。

拉薩爾的“宣言”和在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舉行的

“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在勞工界中引起了劇烈的紛爭，並且繼續了許多年。劇烈的程度也與時俱進，其結果甚至好幾次釀成大打出手的事件。這些紛爭的結果，唯一的一點好事，就是雙方都竭力設法增加自己這一方面的信徒；尤其是在幾年以後，我所屬的那一派也轉向了社會主義的時候。不過我們這一派自己成立了一個組織而仍繼續與“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互相爭持下去。不過許多的時間、金錢與精力都白費了，這却頗使我們的敵人稱快。

在萊比錫，拉薩爾主義結果合併了兩個會社——我的一個會社和前進社——成爲一個新的組織即勞工知識促進會。事實上，這組織是不合法的，可是薩克森地方政府並不就動手取締它。這種情形，在我們關於這種事的經驗中碰到了不止一次——就是一切法律及壓迫的手段在遇到一種真出於自然的、因此是無法征服的運動時，便不能發生作用或行不通了。我當選爲這新會社的副會長，這職位我一直担任到一八七二年因被判爲圖謀危害“德意志帝國”的叛國罪而囚禁在一處軍事要塞時爲止。

我們的會社從市政府方面得到了每年七十五鎊的補助金，後來這組織的政策漸趨激烈時，補助金便被減少爲每年十鎊，在這種情況下，我當副會長的還繼續展開了工作。至一八六九年時，這補助金便被全部取銷，這組織經過三個晚上的辯論決計通過德意志社會民主黨的政綱，這個黨那時剛在愛森拿赫成立。

第五章

德意志工人會社聯合會

那時工人組成的會社的數目大大地增加了，不但在薩克森尼地方如此，在全德意志都是如此。這些會社的宗旨大多是教育性的；有些則不過是讀書會。我們的對手拉薩爾派的人，顯出了他們的目的一致性和他們的能力，使我們決心要把我們的幾個會社更加團結起來。這聯合的組織勢必是鬆懈的，因為我們並沒有像拉薩爾派他們那樣的共同的和固定的目標。他們爲了共同的目的，大家都抱着自我犧牲的熱情去奮鬥。我們這些會社只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反對拉薩爾派和大家表面上的都不過問政治；實際上，大多數的這類會社的指導者，或幕後的牽綫人，都盡力利用各種組織來達到各黨派的利益。他們代表着各種色彩的資產階級黨派；從共和民主黨至右翼自由黨——後來的國家自由黨。各派的人雖有不同的政見，却仍設法使大家相安無事；至於“德意志問題”，這些會社却並沒有規定固定的行動綱領。

這時勞工運動已傳到了德意志的西部；一八六二年五月在法蘭克福舉行的勞工大會上，爲了工人階級的態度這一點，引起了劇烈的爭辯。律師約漢·巴蒂斯特·施維澤

爾——他在這次運動中是一個頗為出色的角色——顯然受了拉薩爾的影響，主張勞工要有獨立的政治組織。這次爭辯的結果，發表了一個宣言，即邀請全德意志各工人會社出席一八六三年六月七日在法蘭克福召開的聯合大會。這次大會出席了一百一十個代表，代表着成立在四十八個不同城市的五十四個不同的會社。我代表了萊比錫的工人進修會社。

我把第一次的全部決議案都寫在這裏，這樣對於代表大會的觀點比看長篇的說明還容易明瞭些：

“第一次德意志工人會社聯合大會是以這樣的前提為其議事的出發點的：本大會認為一切工人會社及全體工人階級的首要任務是要在實現其改善工人階級關於學識、政治、法律、經濟各方面的地位的努力中互相合作，並要與所有為祖國的自由與強大而工作的人，與所有為增進人類幸福而勞動的人一致行動。”

雖然這項決議顯然是針對拉薩爾派的，可是並沒有提及拉薩爾的名字，可能因為沒有人相信拉薩爾所創始的運動是會有前途的。

另一個決議，要求各會社在政治經濟學及憲法理論方面指導會員這一案，却遭到了否決。對於今天的工人們來說，這種落後，將會被認為是難以置信的。其他決議如要求把勞工從種種反動桎梏下解放出來，設立勞工銀行、儲蓄銀行、合作商店、生產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並認為配有供給普通用途的動力的工場是促進國家繁榮及工人經濟獨立的最好辦法。這一切都是自由黨領袖叔爾茨—德里奇的意見。

代表大會並提出勞資雙方的合作是達到上述目的的最好辦法——一個意味深長的、本質上是小資產階級氣氛的含義的虔誠願望。最後傷殘保險及年老保險被認為至少可以部分地減低社會的貧困。關於組織方面，代表大會爲了推進新的會社的組織，並保持已組成的會社相互間的密切聯系，提出各地的聯合組織及代表們按月集會的辦法。最後這組織採用的辦法是每年開代表大會一次，改選會中的執行人員，每一會社每年繳納會費二泰勒(六先令)。因此在執行人員手邊可資運用的款項是很少的——有些會社甚至連這一點兒規定的費用都不繳納。這些反社會主義的工人會社決不肯急於爲了公共利益而有所犧牲的；用這一點把他們與拉薩爾派相比，他們並不見得好些。因此這些執行會務的人，只好去求助於國家同盟，得到了每年約有七十五鎊爲期三年的資助。另外，私自向資方請求，所得的却很少；對任何工人俱樂部的組織取反對態度已成了資產階級的一種特徵了。

在萊比錫對於拉薩爾一派人的宣傳，已感到有給以強有力的反擊的必要了。我受命去邀請叔爾茨—德里奇在我們集會時來演講一次。他答應了，並囑咐我們在萊比錫要警惕些，因爲早在一八四八年薩克森尼地方的工人已顯出傾向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想的趨勢。這次集會決定在一八六四年一月舉行。

按佈置好的程序，由我致詞來歡迎叔爾茨—德里奇，然後再選我做主席。我真是不幸。當我宣佈開會時，已有四五千聽衆到場了。在我演說到一半時，忽然說不下去了，雖

然這篇演說詞我已小心地試講過。我只盼望有個地洞可鑽下去。別人便被選為主席了！我立誓以後演講決不再試講，這一點我是對的。

叔爾茨—德里奇的演講並不是令人滿意的。他講得枯燥乏味，不足以激起聽眾的熱忱。很多人都對這次演講感到失望，而且並未能阻止這運動的更向左去。

我們嘗試在薩克森尼地方創立一個我們的會社的聯盟，事實上這樣做是非法的，所以我們便向內閣去請求特許。內閣答應可以特許，但以這些會社保證不夾雜政治及社會事件或任何公共事務為條件。為答覆這事，我在一次公共集會上提出了下列的決議案：

“工人會社向布斯脫大人[⊖]的照拂敬表謝意，却寧願不再提及此事。”

第二件議案是這樣的：

“到會的代表應敦促薩克森尼地方的全體工人竭其全力謀現行的集會規條的取消。”

這一件議案遭到在場監督的警官的反對，因為這是關於“政治的”。我抗議，後來却只得讓步，因為他恐嚇着要解散集會了。

在一八六四年八月三十一日，一個電報向世界公告斐迪南·拉薩爾逝世了。他由於決鬥受傷，死於日內瓦。這結局的影響很深刻。許多反對他的人都如釋重負的鬆了口氣；他們希望他的死將意味着他所發起的運動的終結。起

⊖ 布斯脫，後來奧匈帝國的首相，那時是薩克森尼王國的首相。

初，似乎他們所料想的不錯；原來對於這勞工聯合大會來說，他雖然費了很大的力量，到他死的時候，會員仍只幾千人，即使這幾千人中，也已起了爭端。再加上拉薩爾所指定繼承他的人，竟沒有這能力來補他的缺，而且也完全不稱職。我的一個朋友在拉薩爾剛死的時候寫了一封信，說到我們屬於工人會社的人，對於死者不應不表最後的敬意；因為拉薩爾雖是我們的對手，他的主要目的——提高羣衆——却與我們是一致的。可是隔了許多年後，這意見才被大衆認可。

常務委員會決定下次代表大會在萊比錫召開。起先有人反對，因為薩克森尼的集會法可能引起困難。那位布斯脫大人素來是能翻雲覆雨的，為避免不便，我們決定將議事日程中的軍事服役的問題取消，因為這條顯然是政治性的。最後，經了好些時日的拖延，布斯脫發下了許可證。大會便在十月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舉行。我被選為主席。議程表如下：

- 一、自由遷徙權(取消定居法律)。
- 二、合作事業：合作商店及生產合作社。
- 三、各會社所授各種課程的標準化。
- 四、給出差工人以補助金(這一項對於年輕的職工尤其需要)。
- 五、年老保險。
- 六、人壽保險。
- 七、勞力市場的管理——即通過勞工介紹所。
- 八、工人階級的住房問題。

九、選舉本會執行人員。

就這僅僅兩天的會期而言，這已是一件很長的議程了；幸而各項報告及議案都已於事前印好，我們設法把它們通過了，雖然不是十分徹底的。

到會代表來自四十七個會社，三個省聯合會，還有來自幾個工會的，其中有幾個是拉薩爾派的人臨時創立的。其他出席的人尚有杜伊斯堡合作社的弗利德里赫·阿爾培·蘭格博士；代表麥格德堡改進社的麥克司·赫希博士，和一位來賓——保守派的提倡合作事業的罕勃教授。

這次大會有些激動的場面，拉薩爾派的人作極端激烈的演說，使得其他代表都感到厭惡。否則倒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事情發生。我被選入常務委員會。

這裏我要說幾句關於蘭格博士的話。因為同是常務委員會的委員，我們兩人有很多時候同在一起。他是我所遇到的人中最可愛的一個。第一次集會時，我們都已對他發生好感。他有堅強的性格，不為威脅所左右。等他公開站在工人那一方面時，他竟成為工業城市杜伊斯堡中被驅逐的人。在一件與報紙爭吵而發生的事上，我大大受了他的好處——一張報紙誣指我受了布斯脫的錢而做事，為這件事，他熱烈地為我辯護。一八六六年戰後，他不得不放棄了杜伊斯堡商會秘書之職而遷居到瑞士的沮利克郡的溫脫妥城去。他在那兒發起修改本郡反動憲法的民主改革運動中，出了很大的力。後來他擔任了沮利克大學的教授。一八七二年他被普魯士的自由主義派的教育部長法爾克博士聘往馬爾堡大學。至一八七五年，他死在那裏，享年四十七

歲。他是我們中間最好的一個。

一八六五年的春天，第一次德意志婦女大會在萊比錫開會，成立了一個德意志婦女聯合會。在辯論時，我以來賓的身分出席。當萊比錫婦女教育會社向我們借用房間作為女子安息日聖經學校時，我們很高興地就答應了。

一八六五年是繁榮的一年，却也是屢次為了要求增加工資而罷工的一年。萊比錫的印刷工人罷工了。那時還沒有罷工基金。代表一個高級官員的一次調解失敗以後，宋納曼[⊖]便邀我向雙方提出，由我們的常務委員會出面仲裁。雖然後來與勞資雙方商談了好幾次，可是我的努力都白費了。但是這時一些著名的自由主義者對罷工工人所取的那種態度，促使我在常務委員會的“會議錄”第八期上寫道：就是那些平日專好諂媚老百姓，主張與勞工建立友誼的人，今天對罷工工人却竭其全力地拒絕工人們的要求。那麼無怪乎那些素來反對拉薩爾主義最烈的工人，對這種自由主義者要嚴詞斥責了。

⊖ “法蘭克福報”的主持人。

第六章

斯圖加特城大會：威廉·李卜克內西

第三次工人會社聯合大會是在一八六五年九月三、四、五日於斯圖加特城舉行的。六十個會社都派代表來參加，其中有漢門·葛留黎希；愛格哈特教授；愛德華特·潘佛，斯圖加特城的一個銀行家；海德爾堡的馮德教授，那位著名的生理學家，當時任萊比錫大學的生理心理學教授。葛留黎希隔不久便到沮利克去了。在那裏，他差不多與我同時，由於相同的教師，而轉信了社會主義。愛格哈特教授則屬於民主黨的極左派。

在當地的委員會內，除了潘佛那銀行家外，還有一位律師漢爾特，他後來曾出任符騰堡的內政部長。那一回我的職責是報告瑞士合作餐店的會社情況。我的報告材料既少，支持這種辦法的演說詞尤短。麥克司·赫希提出一個講到全民直接平等普選的報告，並提議各會社共同努力促其實現。馮德教授反對這一提案，並且不顧大家的不滿，他還是提出以前的問題。最後，議案經過修改後一致通過了，那只是把“全德意志的工人”換成“各會社”的字樣。

慕烈滋·牟勒，普福次亥謨城的一個珠寶商，報告了婦女問題。在他的印就的報告中，他主張婦女在社會地位上

應與男子完全平等，提出設立女工補習學校的辦法以及成立婦女勞工會社。關於這項議案的辯論是最長的一個。議案通過了。大家都明白婦女社會地位的解放是包括婦女的選舉權在內的。

斯圖加特城大會的議決案證明是更向左前進的有決定性的一步。在許多實際政治問題之中，所謂“自助者”們是站在同一立場上的。我們的組織也多少有了些改進。可是只要每年會費始終限於每一會社只出六先令那可笑的數目時，常務委員會對於經濟方面是毫無辦法的。我提議每一會員每年付一辨士的會費，會長每年支給薪俸四十五鎊。我的第一個提案被提付表決，我重又被選入常務委員會。

那些資產階級的黨派的領袖想要在這些會社裏獲得優勢的企圖愈來愈明顯了。大家都覺得德意志問題已臨近確切地決定的時刻了。左派與右派的紛爭愈來愈劇烈了。普魯士方面與奧地利及德意志各小邦方面之間的紛爭愈來愈激烈。德意志人民則逐漸使自己進入了興奮狀態。這種興奮的情形，甚至在大會晚宴席上乾杯時，也表現出來——那宴會所在的大廳，在四十二年後，即一九〇七年八月第一次國際勞工大會在德國國土上聚集時，也就在這裏。有幾個代表暗地裏屬意於普魯士的盟主霸權，民主黨人則贊成這問題應該有一個根本的解決，我們年輕的人懂得這意思就是指一個德意志共和國，雖然這句話並沒有說出來。

就在這當兒，一本小冊子出現了。標題是：“德意志從最深的屈辱下解放出來”，這書公開主張要建立德意志共和國，當然其間還包含着一次革命的意思。但是“革命”這名

詞當時對我們並不可怕。當時從事革命的人的演說詞和文章，又喚回了我們對於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革命情形的記憶。革命有成功的可能，在當時是各處都可以看出跡象來的。甚至俾斯麥與米開爾也考慮到有可能突然發生事件的情況了。拉薩爾、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意見很明白地在他們的信札中說了出來。“霍亨洛赫王子回憶錄”證明，南德意志的處高位的人也習慣於革命發生的可能性。假若在上的人如此，在下的人又何嘗不如此呢？

在大會上，關於聯合組織的權限的辯論和決議，恰可回答普魯士議會中對這同一問題的辯論。叔爾茨—德里奇與福顯——後者據說是一個政治經濟學家，在萊比錫的一次公共集會的場合中，他很認真地想證明社會問題的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由每個工人學會複式簿記學，並利用一個計時器來更好地支配他的時間——提議修改集會法。可是很顯然的，他們對於那些規定工人集會須得警察許可以及禁止罷工的條文却並未論及。這情形使得我們大怒。保守派的超等煽動家，樞密大臣華蓋納，便利用那些自由主義者的胆怯，臨時動議主張不但廢除一切妨害工人聯合的權利的種種法律限制，並且還主張政府方面成立某種帶有強迫性的工會。那時的保守派只要能“打擊”自由主義派，這種機會他們是決不放棄的。

在一八六五年及一八六六年年初，勞工運動中相持不下的各派似乎很有聯合的可能。因此，在梅因斯的一次聚會的臨時動議中便加入了這樣一項：“這樣的分裂既然違反一般勞工的利益，因此，此次與會的工人進修會社及‘全德

意志勞工聯合會’的會員應盡力促進團結一致。”在萊比錫的集會中也提出了一個相同的動議，却被否決了。不過大家同意，各黨各派在爭取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普選時應協力團結一致。另外在德累斯登由兩個勞工黨派聯合召開的一次公共集會還要求召開由全民普選產生的立憲議會並普遍建立民兵，由人民管理，以保護及維持這些軍隊。在柏林聚集的一次大會中，也有與這同樣的要求。

一八六五年八月，俾斯麥查禁了珂堡出版的“勞工報”。在普魯士，威廉·李卜克內西變成了俾斯麥統治制度下的一名犧牲者，因為他反對俾氏的政策，並且向工人們揭穿了俾氏的本來面目。

在一八六五年七月李卜克內西被逐出普魯士。他先已經過了十三年的放逐，因為一八六〇年的大赦[⊖]才於一八六二年回來。他是被一個老革命家奧古斯特·勃拉斯，在柏林創立了大德意志的民主報紙的“北德意志通報”[⊗]邀請來負責國外新聞部的。勃拉斯從前是一個極端過激派的革命家，因此李卜克內西對他絕對信任。但是到一八六二年俾斯麥組閣的時候，引起了他的懷疑。這位宰相送來一份手稿，並指明要立刻刊出；李卜克內西留下一張字條便走掉了。他那時已有一個妻子和二個孩子的生活要負擔，他便當一個自由主義的撰稿人來維持生活，同時也在工人俱樂部的聚會中演講，講詞中便攻擊俾斯麥的政策。他同時也被施維澤爾——“社會民主黨人”報的主筆——斥責為俾斯

⊖ 那時是因為威廉一世的加冕典禮。

⊗ 現在是半官方的(保守派的)報紙。

麥的走狗。他從普魯士被逐出來後，便來到了萊比錫，我便與他相識了；從報紙上知道他的活動以及他被放逐的事，我便對他這人特別感到興趣。他那時已是四十歲的人了，可是他有二十歲青年般的活力與火氣。我們剛介紹相識，便討論到政治問題。他的激烈的態度和他對自由黨的斥責，尤其是對他們的領袖的斥責使我大為吃驚；雖然我自己早已知道他們決不是沒有缺點的。無論如何，他是一個第一流的人物，雖則他的態度有時顯得頗為突兀，我們很快地便成了朋友。

我們在薩克森尼地方的人很歡迎李卜克內西。我們原已決定派人到各處去作旅行演講，却苦於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李卜克內西立刻就被邀請擔任這項工作。他也在工人進修會社內演講，而且他的演講比任何人的都能吸引聽眾。同時他還教授法文和英文。漸漸地他能維持清苦的生活，不過有時，我後來才知道，爲了供給他患肺病的妻子適當的營養，他還是不得不把自己許多珍貴的書籍出賣給舊書店。可是，他從不顯露他的艱窘；的確，凡是碰到他的人，或聽他談過話的人，都有一種印象，覺得他的境況是很滿意的。

由於我常常伴着他一同出門作政治旅行，又常同在一座講壇上出現，因此我們的名字常不斷地並列在一起，公衆把我們看成是不可分的一對。這情形的影響十分深遠，甚至七十年代時，我與一個朋友伊斯蘭勃合夥經營商業時，寄來的商務信件往往不寫“伊斯蘭勃與倍倍爾”而寫“李卜克內西與倍倍爾”，我那夥伴和我自己都覺得很有趣。

李卜克內西有着真正的鬥士性格，他有着不可動搖的

樂觀主義，沒有這種性格作支持是任何大事業都不能成功的。任何不幸，不論對他私人的或是對他那一黨的，一刻都不能沮喪他的精神或使他失常。他決不受恫嚇；在困難中，他總能找到一條出路。對於敵人的攻擊，他總是以正確的行動是永遠會戰勝旁人的原則來對待的。他對敵人是粗暴而不顧一切的，對朋友與同志却始終是幫助的，並且熱心地解決他們的困難。

在他的私生活方面；他是一個好丈夫、好父親，他是熱愛他的家庭的。他更是一個真正愛好自然的人。只要有一簇美麗的樹木在，那附近的環境不管多麼惡劣，就可激起他的興致而認為那裏是一處好地方。他毫無架子，飲食簡單。在我們結婚後不久，我年輕的妻子給他煮了一道鮮美的湯，他竟終生不忘。他也愛喝杯酒，吸一支好雪茄煙，但是在這些方面從不過度。當他穿了一身新衣服時——這種情形是不常見的——倘若我沒有立即注意到而沒有向他稱讚一下的話，幾分鐘以後他一定就要叫我看，還要問我這身衣服好不好。他是一個意志堅強的鐵漢，却有一顆赤子之心。在一九〇〇年八月七日那天，他去世的時候，我與他的相識整整是三十五年。

在黨的事務上，他有一種方法來對付人家對他計劃的反對，就是造成既成事實。起先為他這種脾氣，我很受了些苦，因為總是由我來吞這種他配成了的苦藥。還由於他處理實際事務的才幹有欠缺，別人不得不在執行他的計劃的步驟上留神。最後，我鼓足了勇氣，不再受他那獨裁式的影響；雖然我們因此不免有些齟齬，可是羣衆並不知道，而我

們的友誼也並未因此而受到多大妨害。

至於我受李卜克內西的影響到什麼程度，已有好些文章討論到了；至今有人說，由於他的關係，我才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李卜克內西比我大十四歲，因此他的政治經驗比我多；他還是個大學出身的人，我却不是。他在英國住過十二年，在那裏，由於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間的密切的交往，他學習到很多東西。我從未享有過這種有利的環境，那我當然勢必大大地受他的影響。假若他沒有做到這一點，那麼他會想，他不能影響我也不對我有所影響，或者是由於我不能跟他學習。但是，即使我從未與他相識，我仍將是個社會主義者；因為在我們第一次遇見的時候，我已完全走上這條道路了。爲了不斷與拉薩爾派的人作戰，我得讀他們的作品，以了解他們的真正意向。就這樣，我終於改變了我的信仰。

我一生中有一個原則，就是只要我發覺自己對任何事情所取的立場或觀點不對了的時候，我便立刻放棄原來的立場或觀點，立刻毫無保留地、堂堂正正地，不論在公在私，都站在我新獲知的信念的那一方面。這情形的最早例子就是：那些自由主義派領袖們，他們的一般政策和對勞工問題的態度，迫使我放棄自己原來的立場而走進社會主義的陣營。如此做法，我並無什麼特殊痛苦，雖然我不得不犧牲我的老朋友與我個人的交情，可是我認爲這是我的行動的必然結果。我敢說，我總是把事理放在人情之上的。只要那條道路從我所信奉的事理來看是無可避免的一條道路的話，我就決不容我自己爲顧及個人的朋友或親戚的緣故而

改道易轍。

我與李卜克內西的友誼確實加速了我的轉變。至於李卜克內西對我轉變成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負責的說法也一樣。在那些年代，我聽到了許多次他的出色的演說。他講到工會，講到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講到德意志的民主運動和當時的政治問題。當他涉及到馬克思與拉薩爾的時候，乃是以論爭者的態度提到他們的；盡我記憶所及，我從未聽到過他把他們的經濟學說就理論上詳爲一貫的解說過。我們兩人都沒有時間來作個人的學習，當時的政治鬥爭更不容許我們私人間有理論上的討論；而且就李卜克內西的氣質說，與其說他是個理論家倒遠不如說他是個政治家。“高尚”的政治，是他的嗜好。

像那時許多轉變成爲社會主義者的人一樣，我也是從拉薩爾方面進而至馬克思方面的。早在我們知道馬克思與恩格斯之前，拉薩爾的作品已在我們手上了。從我的第一本小冊子——一八六九年年終出版的“我們的時代”——中，可看出拉薩爾對我政治發展的影響。直到後來我在監獄中的時候，我才有時間讀馬克思的第一部“資本論”。五年以前，我曾試讀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却因不懂而中輟了；過分繁重的工作和生活的掙扎，使我無從閱讀並消化這一本艱深的書。“共產黨宣言”及其他著作直到六十年代的末年和七十年代的初年，才被我們的黨所知道。第一本我真正懂得而能欣賞的馬克思的著作是他的主張召開國際工人聯合會的“開幕詞”；那是在一八六五年的事。到一八六六年，我已成爲“國際”的一員了。

第七章

一八六六年的災禍·一八六六年 的戰爭及以後

工人階級對於公共事務愈來愈感到非常不滿，便愈來愈感到不安。他們一致要求要有一個改變；可是他們既沒有能確定他們的目標和鼓舞他們的信心的領袖，更沒有能夠團結他們的力量強有力的組織；因此他們的革命情緒反映在行動上竟是完全無力的。從來沒有過這樣一種行動，在內心是如此強烈，而行動起來却如此不見效的。所有的聚會的羣衆都是擠得水洩不通，凡一個演講的人講得愈激烈，愈博得人們的鼓掌喝采。

在我們會社的屋內舉行演講會時，我當主席的總要說幾句評語和發表一下我自己的意見。這樣，有些意見的不同之處可以得到充分討論，疑難也可以得到解釋。這種爲聽衆着想並充分利用一個演講會的方法，是極爲盛行的。可是爲了獲得一定的效果，其他的方法也是必要的。各會社的聯合因被認爲非法而大大地阻撓了我們的工作；加之由於我們沒有報紙，於是經常地個別人的交換意見，便越發感到需要。我們再次向內閣請求：允許我們在省內成立一個各會社的聯合會。交下來的條件却非我們所能接受的；可

是我們還是決定了召開各會社的聯合會，起草了一個綱領，就好像沒有什麼法律禁止我們這樣做。雖然後來由於警察總監的命令，在我們的會社內仍得有所變更，可是後來不久就受到集會法的限制——那就是被視為一個政治會社，並且因此它的工作當然更受阻礙了。

不過所有這些問題不久便被政治形勢所掩蓋了。一八六六年的春天，普魯士與奧地利的敵對態度已發展到嚴重關頭了。德意志問題的嚴重性遮蔽了一切別的問題與運動。勞工界的各部分大家同意一致行動，舉行了好多次的集會。禁止各會社為政治目的而聯合的薩克森尼地方的集會法已被完全置之不理，並且大家覺得各勞工團體普遍需要一個永久性的合作機構。從那時起，議會問題成為工人階級中最有興趣爭論的題目。我們要求整個德意志要有一個按照普選投票產生的議會（我們得記住，這是德意志在帝國下統一以前的事）和一個普遍的“國民軍”制度來保護這個議會。這種要求在那時所有的民主圈子內的人當然也正在推動；因為據說，一個議會若沒有這樣一支軍隊的保護，那隨時可遭遇到政變的。甚至那個自由主義的叔爾茨—德里奇在一八六二年七月德意志來復槍俱樂部聯合會集會的場合，也這樣宣稱：“一個自由憲法之永久發展的問題，在目前這種情形下是無法解決的，除非有國民軍[⊖]，事實上就是必須有國民武裝做議會的後盾。”後來的事情發展，證明了這種意見的正確性。在德累斯登的一次公共集會上甚至推出

⊖ 所謂“國民軍”，是由議會來管轄的民兵。

代表來把他們的願望與決議送到國王面前去。這當然是不會被接受的。不過那球一經推動，却向大家所完全料想不到的方向滾去了。

爲辨明我的政友與我自己對一八六六年戰爭的態度起見，我得先把當時引起這次戰爭的情形扼要地說明一下。這一戰爭是普魯士與奧地利間長時期爭奪德意志霸權的外交鬥爭的結果，它使德意志問題在一種出乎當時任何政黨意料以外的方式下解決了。從此以後，大多數的自由主義者在新秩序之下就保持緘默；既然作了資本主義的政治代表，他們希望從此他們的物質利益有一個顯著的改善，並且與他們以前所反對的人講和了。不過他們的變節毫未影響我們的立場。

由於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丹麥國王弗萊特烈克七世的逝世，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問題再度惹起人們的重視。這兩省的人民拒絕承認基列斯興二世爲他們的國王，而決定贊成奧古斯登堡的弗萊特烈克王子。這樣一來，這兩省在普遍的認可情形下重又成了德意志的了。而丹麥却表示反對，德意志聯邦便決定開戰。可是這樣的情形與俾斯麥的計劃不合。他就誘使他的“皇室律師”出來宣稱，奧古斯登堡王子的要求無效，這決定大大地激起了公憤。人民以爲要讓俾斯麥按照這兩省人民的意見來處理這事恐怕是不可靠的。

國家同盟的執行委員發佈了一篇宣言呼籲各教區、各團體、各會社、各聯合會及全國的愛國分子供給兵員、武器與金錢來支援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這兩省的德意志同胞

以保衛他們的自由。這宣言當然是絕對不合法的，却也沒有人來追究這事。輿論是同情這些法律破壞者的。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的支會甚至號召德意志的青年乘戰爭爆發前大概短短的一段時期內受軍事訓練並武裝起來。我們就可看出那時自由主義派的領袖認為建立一支人民的軍隊，不失為一個確實可行的辦法，並且已是事不宜遲的辦法。今天的社會民主黨人誰胆敢發表這樣一篇宣言，誰就該倒霉！這倒是一個徹底的進步！

這事以後，德意志全境，到處有公共集會，目的在於增進各公國的事業。因此，在萊比錫的一次勞工集會上提出，如遇外來的任何威脅，他們矢誓保衛祖國的榮譽、權利與自由。但是人民却反對各邦由普魯士來合併。最後不論如何，俾斯麥仍得一意孤行；普魯士和奧地利向丹麥作戰，丹麥被打敗了，不得不把爭執中的那兩個省份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割讓出來，由勝利者把它作為共領區來管理。由於這一着俾斯麥便得以擴大奧地利與德意志聯邦之間的裂縫。

各邦間的這種新形勢，並不能保持長久。俾斯麥考慮到：普魯士與奧地利間一切問題的最後解決，只可由戰爭來決定，並且他正在有步驟地向這目標做去。

他試用正如後來他所謂的“拖延磋商”的辦法，來挽救拿破崙的中立，按他的安排是：當普魯士自北方進攻時，意大利便由南面向奧地利進攻。在法蘭克福聚會的聯邦議會中，他提議，暫緩決定的日期，召開全德意志由秘密投票方式普選出的全體代表大會。奧地利不贊成，其他各邦的政

府及一般輿論對俾斯麥的提議的看法都表示十分的不信任。作爲一個激烈的改革家的俾斯麥，似乎與一個不顧憲法的普魯士的俾斯麥太矛盾了。

俾斯麥政策的結果之一是自由黨的分裂。他們有些人支持俾斯麥和普魯士，有些人反對他；不過後來到戰爭已不可避免時，這些自由黨人至少設法保全了各小邦的中立。

在薩克森尼，恰恰相反，那裏的自由黨人却使他們的政府對戰爭的最後發生負責；他們要求縮減軍備並與普魯士聯盟。萊比錫市當局也通過了一個與這相同的議案。與這件事對立的是民主黨人與拉薩爾派所召開的公共集會。工人進修會社也一致反對這個決議。我提出一個措詞強硬的議案，指責普魯士政策，反對德意志任何傳統的中央政權，並主張用秘密投票普選的方法產生議會。我的提案一致同意通過了。在法蘭克福的一次巨大的民主集會上，我又爲這事發表了演說，這集會是爲了對贊助普魯士的要求的法蘭克福議會分子來一個反示威而組織起來的。在我的演說詞中，我反對把普魯士放在德意志的中樞地位上的思想，因爲普魯士，除了從一八〇七到一八一〇年那短短的一段時期以外，當她正在受辱的時候，從未有過一個自由主義的政府，並且將來也決不會有。目前這戰爭的起因在普魯士，若結果引起了內戰，那麼全體人民應當向這個和平破壞者普魯士進軍。

當下選出了一個執行委員會，我是其中的一員，起草了這個綱領：

(一)德意志各邦的憲法與行政，應基於民主原則。

(二)爲一自願聯合之聯邦。

(三)建立聯邦行政機構及議會，却決不許普魯士或奧地利兩者任何一方佔有優勢。

(四)各邦自治。

(五)武裝抵抗普魯士的好戰政策。

(六)德意志土地決不割讓與他國。

可是這個綱領還未來得及公佈，戰爭却已爆發了。

六月十日各工人會社的常務委員會在曼亥謨集會，討論政治上的衝突。德意志問題引起了激烈的辯論。有一位堅持認爲普魯士霸權將大大有助於德意志工業的發展，另一位則表示否認。最後，決定各會社都應該參加當時的人民(急進)黨，並且接受法蘭克福的綱領，而加以下列的補充：“每一個人民政府，在不違反個人自由及全體人民的經濟利益的情形下，應促使各階級間的對立關係逐漸協調；而工人階級的物質與道德方面的改進，實爲各階級的共同利益且爲公民自由之必要基礎。”

當時的政治上的困難已大大增加了失業人數，便決定要求僱主以縮短工作時間來代替解僱。出納局長的報告却非常不能令人滿意；我們聽說“勞工報”由於缺乏基金和支持者不久便要停刊了。

戰爭進行的情形，比大家所料想的還要有利於普魯士得多。只有幾星期，普魯士已到了維也納的門口。奧地利在南方對意大利的戰爭却是勝利的；可是她同意休戰，於八月二十二日在布拉格締結條約。奧地利把威尼斯割讓給拿破崙，這事却大大地激怒了德意志的自由主義者。奧地利

被指控爲出賣祖國，受這種責罵普魯士也該有份。普魯士豈不是聯合了一個外國即意大利來打敗一個同屬德意志的國家嗎？俾斯麥豈不是曾與匈牙利的革命軍官克拉潑卡開談判想激起匈牙利來反抗奧地利的嗎？俾斯麥還不是曾爲那些薩克森地方投票贊成普魯士併吞薩克森尼的自由黨人，施盡他的保護；在和平條約中，明白規定他們一切有關這件事的行爲都赦不追問？然而就是這些自由黨人，在一八七〇年，用盡全力把我與李卜克內西定以叛國罪！

後來，常常有人問到李卜克內西和我，若那次奧地利勝利了，我們會怎樣想呢？這話說起來是真够慘的，事實上，只有這樣一個選擇——你與這一個強國站在一起，就是與另一個強國爲敵——但是這實在是無可如何的。我個人的意見是：對於一個不自由的民族而言，若打敗了，在內部發展上說起來，對於人民反而有利。在一個與民主政治相反類型的政府，勝利使它更驕氣凌人而橫蠻無理，打敗了却迫使它來接近人民而更要來贏得人民的好感。這情形見之於一八〇六——一八〇七年後的普魯士、一八六六年後的奧地利、一八七〇年後的法國和一九〇四年日本戰勝後的俄羅斯。若不是俄羅斯失敗了，俄國革命決不會爆發。只要那時沙皇的軍隊打幾次勝仗，恐怕再隔幾年革命還不可能發生。雖然革命失敗了，舊俄羅斯却已永遠消失了，恰如一八四七——一八四九年後，舊普魯士從此消失了一樣。在另一方面，歷史告訴我們，普魯士的各族人民，犧牲了多多少少的生命、財產，才打敗了第一次拿破崙的外來暴政，使他們的王朝免於屈辱，而這王朝接着便把在危險的時候答應

人民的一切美好的諾言全都忘掉了。一直到一八四八年，人民才得到按理講來數十年前便該兌現的諾言的實踐。後來俾斯麥豈不是曾拒絕北德意志議會一切真正的自由主義的要求，並且他的一切舉動完全像一個獨裁者？若那時普魯士打了敗仗，那俾斯麥的政權和直到今天仍在壓迫人民的大地主階級豈不是早就被推翻了？奧地利政府即使得了勝利也決不會像後來普魯士政府那樣強大的。奧地利，由於她的機構，從前是、現在仍然是一個軟弱的國家；普魯士却恰恰與她相反。但是一個強國政府對於民主主義的發展是更具有危害性的。沒有一個民主國中的政府堪稱堅強的政府，對人民而言它是軟弱無力的。若那時奧地利勝利了，奧地利政府也許就會採取反動措施。在這種情形下，反對它的不僅會是全體普魯士人民，而將是德意志其他各地大多數的人民，甚至還有奧地利自己的人民。假若一次反對奧地利的革命有很大的成功機會，那末，在民主的基礎上統一德意志也就很有可能了。可是普魯士的勝利，使這一切推測全都落空了。並且還帶來了一個結果，就是德意志的奧地利被擯棄在聯邦之外，使千百萬德意志人處在幾乎絕望的境地中。假若一個德意志人在國外任何地方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我們的“愛國者”就會陷入民族主義的憤怒的狂亂之中；可是他們對於這千百萬在奧地利的德意志人的精神上的被虐殺——假若我可以用這樣一個名詞稱呼它的話——却毫不抗議。

後來我才知道，我們的運動中的幾個大人物在一八六六年以前，就曾經討論過這些問題。在一八五九年六月，拉

薩爾這樣寫信給馬克思：“對法戰爭，我認爲是一件不幸的事——假使它是受大眾擁護的戰爭。在一次不得人民擁護的戰役中，我預見到對革命的一種巨大利益。對法戰爭的勝利將給革命思想以莫大的損傷。事實依舊如此，不管法國有幾個拿破崙，她仍是代表革命的，並且法國的失敗那就意味着革命的失敗。”同時，一八六〇年三月拉薩爾寫信給恩格斯說道：“我希望我在去年所寫的那本論及意大利戰爭（一八五九）的小冊子中所寫的即切盼普魯士與拿破崙間發生一次戰爭這事，不被誤解。我所希望的一次戰爭須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就是這次戰爭完全是出於政府的指使而並不是得人心的——實在還該是愈遭人民憤恨愈好。這樣，也唯有這樣的一種戰爭，才是我們的一件莫大的幸事。”在一八六二年十月間的一次演講中，他說道：“最後，德意志民族的存在，並不見得這樣的脆弱，他們的那些政府的失敗，並不見得真能危及民族的生存。若是你們諸位先生，肯理智地、仔細地注意一下歷史，你們便知道，我們人民在過去所得到的成就是多麼巨大、多麼具有重大的意義了，我們開闢了這麼大的新的地區，成就了智能上的偌大的進步，因此我們的存在，毫無疑問的，實在是必需的，並且也是不可避免的。若是我們不得不從事於一次對外的大戰，我們中間的若干邦國——普魯士、巴伐利亞或薩克森尼——可能遭受破壞，不過，恰像從灰燼中復生的鳳凰那樣的不可破滅，最後唯一的重大事件是——德意志人民。”

這次戰爭的結果，看起來似乎是由於意料之外的成功而有利於我們的。有一天李卜克內西滿臉高興地走到我的

店舖中來，他告訴我他剛買下了一家報紙，那是自由黨人因不勝繼續賠累而出讓的，他甚至已答應先償付約一百二十鎊的款子。我却大為不安，因為那時我們的錢櫃裏正分文全無。在那種情況下，我們要想發展這家報紙，那真是毫無希望。況且我們還得考慮到普魯士來佔領的事。但是李卜克內西還試着要安慰我，說那報紙的所有人並不要即付現款，日常的必需開支那也容易應付的。李卜克內西實在是因為他想到了自己有一種報紙，便可以發表什麼就發表什麼而過分高興了。他這樣地寫文章也太過分了些，好像這事的主角不是普魯士而是他似的。他的高興可並不長久。他的報紙被禁止發行了，而我却毫不難受；可是我並沒有告訴他。我們就此免除了許多的困窘；因為按李卜克內西的計劃，預備分五千股出售，每股定價一泰勒（約值三先令）售給德意志工人會社，那當然會全部失敗的。

這次戰爭的後果之一就是北德意志聯邦的興起，巨大的普魯士主宰了各小邦。當時召開由普選產生的北德意志議會的情勢，頗有可能，我們便覺得我們自己需要有一個較有永久性的政治組織，並且要有一套新政黨可資以號召的政綱。這政綱不能公開的社會民主化，因為黨內有些領導分子反對這種想法，而工人聯合組織的若干組織在政治意識方面還非常落後。在現階段發展中，避免分裂是很重要的；更加鑒於因戰事情況及德意志瓦解為三部分（北德意志、南德意志及奧地利）而造成的大部分資產階級正深受激動的情況下，我們知道最重要的還在於集中我們的力量求德意志的民主化。

爲了這個緣故，我們在開姆尼斯召開了一次會議，“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的會員們出席了，目的在成立一個新的民主黨。當時有下列的政綱付諸表決：

民主政治的要求

(一)人民在決定政府形式的權利上應不受任何限制。在一切公共生活的各方面(包括議會、各邦議會與各地地方政府)普選採取普遍、平等、直接的秘密投票法。由民兵來代替國家的常備軍。一切主權屬於議會，尤其是和平或戰爭的決定權。

(二)德意志在民主政府之下統一。決不是普魯士霸權下的“小德意志”；決不是經兼併而成的普魯士；決不是奧地利霸權下的“大德意志”；決不是區域的三分國家(南德、北德和奧地利)。這類情形，或其他類似的“王朝的各州獨立主義”的試驗，勢必引起自由的損害、分裂，及外力干涉的一切情形，民主黨誓必反對到底。

(三)廢除一切出身、階級及宗教上的特權。

(四)改進人民體格、文化、智力、道德各方面。學校與宗教分離，國家與教會分離。初等學校改爲公共教育機關，由國家維持，免費指導，並辦理免費補習學校。

(五)促進國民福利，勞動和工人應自各種限制、壓迫下解放出來。改進工人階級的狀況，有居住的自由，擇業的自由，全德意志的公民權，扶助及推進合作事業，尤其是生產合作事業，以求調和勞資雙方的對立。

(六)各地自治政府。

(七)以獨立法庭和陪審制度來培養人民對法律的進一步的尊重，尤其在政治與出版的案件上，應有公開申辯的訴訟程序。

(八)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的權利以及聯合的權利來增進人民的政治與社會教育。

當然這樣一個政綱在急進主義這一點上是完美無缺的了。雖然“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的會員們(社會主義者)接受了它，可是他們並未參加這個政黨。

日益迫近的北德意志議會的選舉，需要加緊組織與宣傳，這事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的犧牲。社會民主黨的宣傳員們常被他們的資產階級敵人嘲笑為靠着工人菲薄得可憐的收入而自肥的人們。雖則這種指責從未有過任何事實根據，而當我寫到這裏時更覺得其荒謬。做這種鼓動工作實在需要巨大的熱忱、堅忍和自我犧牲的精神。宣傳員必須以僅够用作現金支付的開支這樣的報酬為滿足，並且他必須盡量地節省這種開支。任何一個政治上的朋友邀請去住宿，那是認為當然的事；雖然那些朋友也是最窮的傢伙，他們的設備也是最樸素的。我們所有的這類經驗，常常是頗不平凡的。不止一次，我不得不與人家同住一個房間好像夫婦一樣；還有一次，在那家我睡的那隻沙發下面老貓生了小貓，叫喚了一夜。另一次我和一個朋友住在一間主人——一個織工——堆絨綫的閣樓裏。當我早晨醒來太陽已照到我臉上的時候，我發現自己躺在一大堆黃絨綫上，而我的朋友正枕着一堆紅絨綫。別的宣傳員，當時做着宣傳工作的，或後來做這種工作的，都有這種類似的經驗。李卜克內西也

非常活躍，不過他的工作被意外地中止了。有一次，他尚信賴這次戰後普魯士所頒佈的大赦，他到柏林去演講，便被逮捕了，被判監禁三個月。他被當作普通罪犯一般看待；例如下午六時以後，便不許有燈火等，這真是一個大的苦難。

選舉在一八六七年二月間舉行，我們因受財力所限，只能就我們組織最強的區域中提出三個候選人，我在格拉恰一彌倫區被選了出來，另一位做律師的朋友則在士維考一克利密支格被選了，李卜克內西却失敗了。我有四個對手，在第二次投票時我便以七千九百二十二票對四千二百八十一票獲得了勝利。

這時已有好幾次的選舉用着很不誠實的手段取勝。坐了火車旅行時，我往往聽見一些乘客猛烈地誣譏我們。有一次，在後一個車廂中有一個旅客說我曾允諾職工們：假若當選了，便給他們雙薪和每天八小時的工作。我為這些謊言與誣譏所激怒，便走過去問他是不是倍倍爾本人告訴他這些事的。他說是的，我便罵他厚臉皮的撒謊者。後來他還要反唇相譏，我便說出自己的名字。他這才無話可說；在一車人的哄笑聲中，他只得等車到下一站時匆匆下車去了。

一八六七年又有第二次選舉。連李卜克內西在內，我們有四個人當選。拉薩爾派的人在三個區中獲得了勝利，“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中有一派與拉薩爾派分離了也獲得了一席，後來又贏得一席。因此我們勞工方面一共獲得了九席。

第八章

德意志工人會社聯合會的 進展·我私人的瑣事

一八六六年的政治事件，對我們的那些會社實在是不幸的。我們沒有錢，我們的報紙停了刊，另外辦了兩種的結果也不見得好些。在我們辦第三種——“民主周刊”，由李卜克內西主編——以前，我們沒有過自己的機關報可以發表我們的意見並在政治或社會的問題上啓發我們的同人，這是非常重大的任務；我們對於敵人的攻擊也無法抵禦或辯護。我們必須付出巨大的代價來維持這種報紙的刊行，可是我們都情願這樣做，因為這種報紙是我們最有效的武器。我當然是一個經常的投稿人。

我對我們執行委員會的軟弱很感不滿。在一封信中，我反對他們那樣一直盡力使會社與政治分離的做法，我主張與“國際”取得聯系，並且鑒於北德意志聯邦對勞工問題的顯明的敵意，我還主張改善我們的組織。

我們的第四次大會於十月六、七日在耶拿開會。幾年來，我屢次堅持的關於組織方面的提議，終為他們所接受了。這一年的聯合會的會長就由大會選舉，由這會長所屬的會社內選出六人來做執行委員，而該會社的所在地就暫

時爲聯合會的總部。會長的待遇爲每年三百泰勒(約合四十五鎊)。在執行委員會以外,在全德另設“機要秘書”十六人管理執行委員會的財政事務,並就重要事務提出意見。我以三十三票中的十九票被選爲會長,因此萊比錫就成了我們的總部所在地。當時這“新政策”成了事實,終究我們所力求實現的已成了事實:聯合會的行政到底增加了效率。

這是德意志勞工大會第一次提出“勞工賠償法案”的要求。當時提出的實際需要是因爲一處煤礦發生了意外,一百零一個礦工喪了命。我們的要求到一八七二年由國王的詔書頒下了,可是我們對之並不滿意。

這新成立的機構給這聯合會注入了新精神。我們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大多數會社從他們麻痺的狀態中喚醒過來,刺激他們來採取積極的行動。爲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安排給它們值得它們努力的工作。我們每一期報紙的報頭上都刊印着些宣言,要求各會社對各種事務展開活動。幾乎立即就看出來了。各會社頓時充滿了生氣,而它們的投稿是前所未聞地得到報酬的。一切執行委員會的事務差不多全要我來辦理;我身兼會長、秘書及出納三職。與各會社來往的事務大大增加了,從一八六七——一八六八年的二百五十三件詢問事項及五百四十三件回文到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竟有九百零七件詢問事項及四千四百八十四件回文。回文大都採取報紙及讀物的形式,其餘則是信函,都由我親手寫,而且往往是很長的信。

我還要主持執行委員會的會議。我仍是工人進修會社的會長;我又是北德意志議會的議員,和關稅議會的一員。

爲了黨的利益作宣傳，我得常往各處旅行，同時我又是“民主周刊”的經常撰稿人，因爲該刊的“勞工專欄”全是由我寫的。這樣大家可以明白，由於這樣許多工作，使我對於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這一點兒營業忽略到完全不可原諒的程度，因此我的經濟情形非常壞，時常我幾乎不能看見自己的前途。我們很多人都遇到這種情形：我們不是放棄積極的政治活動，就是放棄我們的營業。若是我們的反對者今天這樣指摘我們，說在帝國議會中社會民主黨的代表，沒有一個是真正的工人，那這個很容易解釋：任何工人，只要公開給社會民主黨出力，便立刻被解僱。因此他只得保持緘默，或是黨因工作需要而要有宣傳員、編輯，或別的活躍的工作人員時，那麼只得由黨來維持他們的生活。對於自己經營商業的人，那情形更壞。我們的敵人常常訴苦述說社會民主黨的恐怖主義，其實這完全是胡說。他們自己的恐怖主義才壞哩。我看見好些好朋友，在他的政敵的恐怖主義下，逐漸慢慢地死去。這也很容易明白，爲什麼我們在議會中的議員大多數是雪茄煙商、煙草商和飯店主人；他們不得不經營這些商業是由於他們的政治見解已被他們的僱主開除了的緣故；並且幾乎只有這幾項商業，黨內的朋友可以做他們的顧客來支持他們。我自己在二十五年這樣長的一段時期中經營商業，屢次因公私利益的衝突，而使自己的營業受了損害。

我的那些不參與政治、或是不懂得我爲勞工運動而工作的意義的朋友們屢次說我是一個傻瓜，說我爲了工人犧牲自己。假如我只致力於地方政治、致力於中產階級的利

益，那我一定能够成功，或許還可成爲市參議員哩。遇到這種事，我常常付之一笑；因爲我的志向並不在此。

我怎樣巧妙地應付了這一切的工作——一八六七到一八七二年是我一生中最勞苦的幾年——也許對許多人是一個謎。對我自己來說也有幾分是謎，因爲我不但需要與許多困難奮鬥，而且我還得爲自己的病體掙扎。我的身體矮小，兩頰凹進去，臉色蒼白。我們結婚時在場的我妻子的朋友往往說：“啊，可憐的，她嫁的那個人，怕不會長久！”

幸而還好，他們弄錯了。

* * *

這裏，我順便插入幾件私事叙一叙。一個人，若在他的公共生活中要遇到成羣的敵人，那他之選擇與他過共同生活的女人，決不是件無關緊要的事。在一生中，她可能是他的助手，幫助他達到他的目的；也可能是他的累贅和包袱。我很高興，我能够說我的妻子是屬於前一種類型的。她是一個鐵路工人的女兒，她父親在我們相遇以前就死了。她在一所女帽商店中工作。在一八六四年，在她慈母去世以前不久，我們訂了婚。一八六六年的春天，我們結婚了。這一件事，我從未後悔過；我決不能找到一個比她更可愛、更愛我、更能自我犧牲的妻子了。我的任何成就都由於她的隨時幫助和從不疲倦的對我的照顧。在我們的較平靜的生活來到以前，我們得經過多少日子、多少年月的困難。一八六九年的一月，我們有了一個女兒，她是我們許多失意時刻中的一種安慰與快樂的源泉。

爲了我在勞工運動中的工作和我的婚約，使得我很想

在萊比錫定居下來。雖然一八六三年時，薩克森尼已確立了商業與手工業的自由，而非薩克森尼人却被視為外國人，若他自己想要開店舖，先得經過“歸化”的手續。辦這種手續必須化錢，約需七鎊十先令，包括萊比錫城的自由權（公民權）在內。我估計從家中可得五十鎊。我的主人已解僱了我，因此我不得不自立門戶營業。我到威茲勒去盡量設法弄了些現錢，並且在萊比錫租了一間馬棚改造成的屋子作舖面。那屋子可真不舒服，連生火的地方都沒有，可是我們沒有錢，只得住在裏面；到冬天夜裏我冷得要命。那時既沒有錢來“歸化”，我就只得借用朋友的名義來開張；一直到結婚以後，我借到了錢才“歸化”了。開始營業時，真是小本生意，只有一個學徒。幾個月後，才請了個職工。所有小本經營的困難，我都嘗盡了。我不得不長期放賬出去，可是職工的工資和日常的開支却不能不付現金。成品還只能賣給顧客，他們給的價錢比成本高不了多少。此外，那時到處充斥着德意志各小邦的鈔票，鈔票上我還要損失。終於我的公共事務方面的工作，使我在僱主中間出了壞名聲，大家都抵制我，不跟我來往。若不是我跟別的城市建立了某種商業關係（我做水牛角的門窗把手），我一定整個破產了。在打仗的年代，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商業越來越壞，買賣完全停頓了。當我與李卜克內西在監獄中受叛國罪的審判時，我的妻子寫信來說有一百零二天，一件貨品都沒有賣出去，職工與學徒每星期的工資却還得付。但是戰後跟着來的繁榮使情形好轉不少，這繁榮一直繼續到一八七四年，那時我接的定貨單超過了我的出貨量。到一八七二年

春天，李卜克內西和我開始服刑時——在要塞中拘禁二十二個月，我另在監獄中監禁九個月——我已能把營業全交給我的妻子，她僱了一個工頭、六個工人和兩個學徒。雖然我的妻子盡了她最大的努力，可是她沒有賺多少錢。我在監禁中仍得通訊接洽營業。等繁榮時期過去，跟着來了另一次危機，那時候我所製做的物品，到市場上出售時，竟遇到我不能跟它競爭的、由機器製造品所決定的價格。爲了做我們黨的工作，我正想索性放棄這營業時，却碰巧遇到了我的一個政友斐迪南·伊薩蘭勃，他除了必需的商業經驗以外，還有財力辦一所用蒸汽動力的小工廠。我們便合夥起來，不久還得了很好的名聲。我的職務是去訪問顧客和招徠生意——簡言之，就是做“跑街”的事——在後來的日子裏當反社會主義的法律實行時，這種職業使我能爲黨做些重要的工作。後來，我從萊比錫被驅逐出來重又入獄時，這次合夥便拆散了，我便只成了個“跑街”。最後，到一八八九年，我把這種職業也放棄了，專致力於寫作。

很奇怪的，許多人腦中想像出來的我的形象與實際的情形相差太遠了。我的合夥的朋友却恰如他們想像中的樣子。他是一個高大強壯的人，紅色的頭髮，紅色的鬍子垂到胸前。當有誰到辦事處來找我而以前沒有看見過我的，往往會去招呼我的這位合夥朋友。我還常常遇到這種情形：走進火車去，同車的客人認不得我，而我自己聽到關於自己的嚇人的故事。在好多地方，我被視爲羅賓漢似的一流人物，要把整個社會制度都推翻了。通常我在各處人羣中常聽到人說：“哎，這倍倍爾，真是值得尊敬的人！”這話真是稱讚之詞了。

第九章

紐倫堡大會

一八六七年七月，經過長久的協商，普魯士與南德意志各邦訂立了一個條約，產生了所謂關稅議會，這個議會考慮關於關稅及對南、北德意志都有的間接稅的各項問題。它是由北德意志議會的議員及南德意志特選的代表所組成。南德意志人民黨要求全體加入“北德意志聯邦”，俾斯麥拒絕考慮這個要求，人民黨便不顧我們三番四次的勸告，決定放棄選舉。不過，我們還是設法使南德意志的幾個民主黨人選入了這個議會。

這時巴伐利亞與符騰堡的各工人協會正在鼓動要採用民兵制度。符騰堡政府已答應把兵役服務期限減至十九個月，而巴伐利亞的期限則只有九個月。可是這種成就却因普法戰爭和南德意志各邦加入聯邦而取消了。

我們執行委員會的人相信在工人會社聯合會內兩派的政治分歧不應再繼續存在。從上一次大會以後，我既已得了會中的最高權，我很想最有利地來運用它。不論對這聯盟的統一的後果如何，重要的事倒是應該選用一套確定的政綱。因此，我們便請洛勃·石槐格——他是李卜克內西主編“民主周刊”時的同事——在國際工人聯合會政綱的相

同基礎上去準備一份政綱的草案，以便在下次大會召開時提出報告。

我們在下次大會上將提出政綱的消息剛傳出去，就在自由黨人所指揮的各會社間引起了大大的騷動。南北的自由黨的報紙都攻擊我們。我收到許多抗議、警告以及預言失敗的信。我回答他們社會改革不能與政治分離，事實上它們是相輔相成的。就工人本身的利益而言，他們應該是個民主主義者。當時曖昧的態度決不能再持續。在又一封信中，我還加了一句，若大多數會社竟然拒絕一個社會民主黨的政綱，那執行委員會的人與薩克森大多數的會社也許會退出這聯盟的。

爲防止分裂，我就着手發動一次大規模的運動，我寫信給一切我們想他會贊成我們的計劃的人。但是我既不全部清楚各聯合會的會員的立場，就不免收到若干拒絕的回音。無論怎樣，這情形並未影響最後的結果。

正在這時候普福次亥謨地方的慕烈滋·牟勒提出意見組織工會，並且發起一種運動，其目的在於把大學教授們和博士們（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們）從我們運動中的領導地位上排除出去。我寫信給他表示同意。印刷工人和雪茄煙製造者已照着英國工人的榜樣在做了，萊比錫的鞋匠和德累斯登的釘書工人也就要跟着做去。我的意見也以爲工人應該從自己的階層中選出領袖來；我們從經驗中知道博士們和大學教授們對我們並無用處。

培格(J. E. Becker)，任日內瓦“國際”德意志分會的會長，他寫信問我們是否願意加入“國際”。我回答說：在目前

這事是不可能實行的，不過我答應去詢問大會，由它宣佈同意“國際”的宗旨與目的並與之建立最密切的關係。同時我還請他派代表到紐倫堡來。

恰如我們所預期的，在九月五日至七日舉行的大會，到會的人數很多；九十三個會社的代表有一百五十五人。邀請到會的來賓有：從倫敦來的愛卡理斯，代表“國際”的總理事會；維也納工人進修會社的兩位代表；瑞士各會社的代表兩人；從沮利克來的蘭登道夫博士是一位革命者，他在德意志曾被判服過勞役，代表德意志共和黨；一位日內瓦“國際”德意志分會的代表；一位法國分會的代表；兩位德意志人民黨（民主派）執行部的代表；另外還有一位“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拉薩爾會社——的會員也到會了，雖然他並不是正式代表。如此說來，他是第一個敢與我們在一起的；他的這種行動，在拉薩爾派的首領施維澤爾眼中看起來，簡直是一種罪惡。

大會的會場設在富有歷史意義的市政府的大廳裏，那是市議會希望自由黨會勝利而借給我們的。我以致詞歡迎外國的代表來開始這個會議，接着就選舉大會主席。全部九十四票，我以六十九票當選。從這時開始，最後的決策將怎樣，已無可疑慮。選出來的兩位副主席，也是我們一黨的；我們的對方則全綫敗北了。他們還試想把以前的問題重提出來，可是在高呼“不要妥協！”聲中，當天的大會程序就經絕大多數通過了。

大會的討論報告作得非常精彩；在我所參加的會議中真算得是最好的會議中的一個。作為聯合會一般事務報告

人，我可以說這新的組織工作得非常之好，與以前的情形相比，現在這聯合會的工作真是出色的。現在聯合的各會社已有會員一萬三千人。關於政綱的辯論，引人屏息而聽。最後的結果是六十九個會社出六十九票贊成這個政綱，而三十二個會社出四十六票反對。少數人提出抗議並退出會場，不再參加以後的辯論。他們企圖組織一個新團體，定名“勞工同盟”，却未能成功。這些會社失去了一切的政治意義，後來成爲幾個自由黨的尾巴。

我們的政綱是這樣的：

“德意志工人會社第五次聯合大會集會於紐倫堡，宣告它同意國際工人聯合會政綱的下列各點：

(一)工人階級之解放，必須由工人階級自身來實現。爲工人階級解放的鬥爭決不是爲工人階級的特權或獨佔，而是爲了一切權利、義務的平等和剷除階級統治。

(二)工人在經濟方面依賴於勞動工具的獨佔者，實在是一切奴役、社會災難、智能衰退和政治上缺乏獨立性的根源。

(三)政治上的自由是建立工人階級經濟解放的必需工具。因此社會問題不能與政治問題分離，社會問題的解決基於政治，並且只有在民主國家內才有此可能。

再者，鑒於過去工人經濟解放方向的一切嘗試的失敗，都是由於同一國家內各種勞動者間缺乏團結及由於幾國工人階級間並無友愛的聯系；

並且勞工的解放不是一個地方的或一個國家的事，乃是在現代社會的國家中的一個社會問題，其解決基於若干進步國家理論與實際的合作。

爲此，德意志工人會社第五次聯合大會決議採取國際工人聯合會的方針。”

這些決議已把我們這些會社所採取的態度表現得明白無疑。可是人民黨（民主派）在幾天以後召集的全體大會上的行動好像真沒有那麼一回事一樣；甚至它還要聲明同意紐倫堡的決議。在這件事上，證明他們有某種程度的鑑別力，這在我們後來的激進派中是顯然沒有的。這種情形，尤其顯明的是在宋納曼身上，他盡力之所及制止工人會社從人民黨退出。

由於少數人的退出，破壞了大會的議程，因爲有幾個需要討論的問題的報告者，就在脫離派中間。宋納曼作關於由國家管理養老金基金的設立的報告。但是他的提議被否決了，尤其是認爲國家管理會使工人對於現存的國家不知不覺地採取保守態度，而這種國家是非常靠不住的；這個信念俾斯麥也有的，他後來宣稱給工人小額養老金是使他們服從現存國家的法令的最好的辦法——一個構成傷殘及老年保險法律的基礎的信念。別的議案還提出由中央集權的工會來設立老年及疾病基金。

我再一次地由五十九票中的五十七票當選爲會長，因此在下一年萊比錫仍然作爲我們的總部所在地。

那選出來報告執行部的工作的委員會很稱讚我們（爲這工作而給的報酬大概不足八鎊）。一切書籍雜誌都處理、

安排得非常好，受到了熱烈的稱謝。

反對派的報紙攻擊我，說我試圖用一種“社會共產主義的政綱”來使工人們墮落。我回答說，“社會主義者”和“社會主義”這兩個詞已經變得太平淡無奇了。工人們已經漸漸地發現，社會主義畢竟並不見得怎麼可怕；而必須用“共產主義”這個詞來嚇唬這些市儈了。

紐倫堡大會的決議造成了一種新形勢。施維澤爾再也不可能使我們被拉薩爾派的人懷疑或在他的“社會民主黨人”報上誣蔑我們是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了。現在已無可再爭論的就是薩克森的人民黨和工人會社聯盟是社會主義的政黨，和“國際”是站在相同的立場上的。

我們的可憐的經濟狀況依然是我們最嚴重的弱點。雖然我們已有上萬的會員，可是每一會員每年付一辨士的會費，效力是不大的。

我們的“民主周刊”需要相當多的津貼。我們開始辦這刊物時，口袋中大約有十泰勒(三十先令)左右的錢。好些黨派的報紙都是從差不多同樣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第一期報紙發行時，便真的破產了。可是為辦報紙而甘願犧牲的熱心和意願却是無窮的。當然，編輯們對於極少的報酬就得滿足。現在這一代的人已很難想像出我們那種窮困不堪的情形以及那種需要我們來做而又無報酬的工作有多少。因此，李卜克內西，作為“民主周刊”的編輯，每月才約得六鎊，後來他編三星期出一期的“人民國家”約得九鎊十五先令。我給上述前一種報刊投稿，撰述勞工專欄，從未得過任何酬報，只因推銷這種報紙每月得到三十六先令左右，

就靠這點兒錢，我却必須維持一個辦事處！當一八七〇年的戰爭爆發時，我甚至於自願把這一小筆錢也放棄了。至於增加薪水，那根本沒有想到過。因此當“前進報”——“人民國家”的後身——在一八七八年被迫停刊時，李卜克內西所得的薪額與九年前的一樣。就經濟情況而言，今日我們的黨，與那時的黨比起來，真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黨了。

不過，我們的黨常有出奇的好運道，我曾跟我的朋友說：“若真有一個上帝的話，那似乎他很喜歡社會民主黨的；因為我們的窮困，老是他行道的機會。”這是從我就要講到的一件事情上看到的。我正在向一個朋友說到我們金錢上的困難，一個郵差却送來一封信。拆開一看是沮利克的蘭登堡博士寄來的，他告訴我，由他和他的朋友所經管的一筆基金——所謂“革命基金”——中，我可以得到分三次付款的三千法郎（一百二十鎊），去請求這筆款子，還是由於他的力量。不止一次，這“革命基金”救我們度過難關。後來爲了在巴塞爾的國際勞工大會的決議中關於土地改革的事，我們不再與蘭登堡一致，並且後來我們對於一八七〇年的戰爭的看法又與他不同，這經濟來源便斷絕了。

第十章 工會運動

我所要寫的各工會運動只限於我襄助創立時的事。一八六八年似乎可認為德意志工會主義誕生的一年；雖然工人們類似同業工會的組織在這時期以前已存在了；例如一個雪茄工人工會和一個印刷工人工會。一八六五年是繁榮的一年，發生過好多次罷工，大都因工人缺乏有組織的反抗與基金而不得不讓步。事實教導了他們這兩者的必要性。

直到這時候，政治領袖們並沒有為工會主義出多少力。那是李卜克內西，以他的關於英國的工會主義的演講，對於開闢這個道路出了很大的力。我們執行委員會的人也曾考慮過這件事，可是工作的繁忙，逼得我們無從採取有力的步驟。

一八六八年的夏天麥克司·赫希到英國去研究英國的工會組織。他把他的經驗在柏林的“人民報”上發表了，而施維澤爾則在“社會民主黨人”報上發表意見，他認為赫希之要設立工會，不過是力求走在前面，以便將工人掌握在“進步(自由)黨”手中而已。他在“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的第一次集會上提議，為求達到組織工會的目的，主張召開德意志工人大會。然而他的提議被否決了。我們工人會社聯

合會的會員在紐倫堡大會上，並未辯論就通過了要組成工會。雖然這樣施維澤爾還是照樣動手工作。在柏林一次有代表十九萬工人的二百零六個代表出席的大會上決定組織所謂工人聯合會，上設中央執行委員會。這事的決定權全操諸施維澤爾之手，他對這運動的任何部分都不許有一些獨立性。¹³馬克思徹頭徹尾地反對、責難這個組織。施維澤爾却正期望他的支持，不久便試着變更這組織而將它與“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合併。拉薩爾派的人則一般地說來是與工會主義敵對的。他們認為它不過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目的不過是把工會拉進黨去然後便將它解散。

在萊比錫，常務委員會立刻動手制定各同業工會的標準章程的計劃表。我便是這些章程的擬定者。剛製備完成，便把它分送給各會社，並進而提出設立“國際各同業工會”，這原是我們擬定的名稱。我在許多次集會上都發言支持這個辦法。用“國際”這個字似乎口氣太大了些，因為我們很難希望我們這個組織能推廣到說德語以外的國家去。我們選用這字，無非是表明我們的目的。有若干與這相類似的團體真這樣組織起來了；例如國際各業聯合會的工廠工人和別的手工藝勞工，包括石匠、木匠、金屬工匠、伐木工人、裁縫、皮毛商、帽工、鞋匠、釘書工人、礦工與鐵匠。

這是無庸諱言的，意見分歧固然大大阻礙了政治運動，而在工會運動上損失則更大。在勞工黨中，沒有一個政治派別願意放棄組織自己的專門行業的，反而都希望藉此增加自己的權力。

我們在萊比錫竭力防止我們運動本身內部的分歧，為

達到這個目的，我們與“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的會員協商在一八六八年十月召開了一次會議。就在這次會議上決定努力促進工會的組成，並產生了一個委員會來採取必要步驟。李卜克內西和我與聯合大會的人都被選入這個委員會。我們邀請各業的會員到委員會來商討工會的組織。為求達到集思廣益的目的，決議召集一個聯席大會，而在合併組織之前，雙方必須同意互相協助，尤其在財政方面；不過，雙方無論在何種情形下，都不能與“赫希—鄧格聯合會”發生關係。這組織乃是“由勞工的敵人所創立的，目的專在防止勞工有適當的組織，並使勞工墮落成爲資產階級的工具”。

但是我們的建議從另一方面遭到了否決。施維澤爾和他的“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不同意我們的提議。極端的拉薩爾派甚至更對我們抱着敵意。他們認爲創立工會違反了神聖不可侵犯的拉薩爾的原則與組織。

這個工會的問題在一八六九年我們於愛森拿赫召開的大會上重新提出討論。請求人的政治信仰成爲入會條件這辦法，尤其遭人指責。葛留黎希表示爲使大衆加入協會起見，贊成國際組織。他說，資本家並不怕我們這幾個少得可憐的錢；勞工大衆才是他們所害怕的。

到一八七〇年，在斯圖加特，這調協問題重又討論過，可是仍沒有得到解決。從一八七一年以後，那繁榮的幾年，工會發展得很快，開始採取獨立的方向。這一段繁榮時期結果發生了好多次的罷工，由於工會深苦於罷工基金之不足，引起了很大的困難。早在一八七一年三月這種使人不滿的情狀已被萊比錫社會民主黨會社討論過了。他們刊印

了下列的議案：

“一、罷工僅是治標的辦法，並不是持久性的改善。

二、社會民主主義的目的不僅是在目前生產方式下求得較高的工資，而且連資本主義的生產一概剷除。

三、就目前的生產方法而言，工資繫於供給與需求，即使是最成功的罷工，也不能長久地把工資提高過於一般標準。

四、最近的幾次罷工實由製造商為求得他們加價的藉口而製造出來的，這種罷工對工人不利，而只利於僱主，他們所增加的價格遠超過所增加的工資。

五、這種失敗的罷工，鼓舞了製造商，而沮喪了工人——對勞工黨是一種雙重的打擊。

六、大製造商有時得了額外的利潤，小的僱主却發覺他們的舖子開不下去了，因此大的商店得以高價出售它們的存貨。

七、這就是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黨對於大團體的罷工者不可能給予經濟上的幫助的原因。

因此我們要力勸我們黨的朋友和支持者，若沒有急切的必要或充分的資助，勿輕易發動罷工；而且不要毫無顧忌地進行一件事，而應按照包括全德意志的組織計劃行事。做為籌供款項和成立組織的最好方法，提出了創立並發展組織工會的意見。”

這個勸告非常之好，却沒有照辦。

一八七二年六月中旬，工會第一次大會集會於法蘭克福。討論最多的中心問題是創立一中央集權的行政機構和

辦一張工會的報紙。我在報紙上的一篇專論中把這大會的綱領發揮了一下；我說道：“工人階級的將來在於工會主義；通過工會，大眾才有階級意識，學會跟資本家鬥爭，而自然地成爲社會主義者。”

長期地被監禁在要塞和監獄中，到一八七五年的春天，我又得到了自由。他們給我中央工會“工會報”的編輯職位，月薪七鎊十先令，我只得謝絕，因爲我的生意和政治工作已不容許我有時間來幹工會的事。不過，我當然仍繼續注意這運動並幫助它，尤其是在開會時的演說上。一八九〇年後，據我看來，社會民主黨的發展大大地超過了工會運動的發展，主要在保險法案方面，這種保險法大大地減少了工會運動的用處。在一八七三年聚集於科倫的我們黨的大會上，我把這意思也說了。不過，我的這種悲觀的看法並不對，事實證明我是錯的；而我最早所有關於工會主義的意見是很對的，我重又鼓勵起自己來促進這運動。

回說到一八七〇年。工會運動正在經過最艱難的一段時期。普魯士政府，或許更該說是俾斯麥，把工會主義連同社會民主黨一起認爲是國家與社會的死敵。他認爲必須對它們起訴。他將檢察官戴森道夫看成爲極有用的工具。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和若干工會被壓制了。接着一八七八年發生了謀刺國王的事，又實施了反社會主義法，這一下子就把我們化了多少年來的勞力和犧牲無數時間、金錢、精力以及健康而獲得的成就全摧毀了。但是這並不是永久地。即使是最強的力量也不能永久抗拒進化的壓力和時代的需要。即使俾斯麥也不得不詫異地學到這樣的教訓。

第十一章

我的第一次判罪·“國際”與 拉薩爾派的糾葛

西班牙女王伊薩伯拉的失政和她因之而聲名狼籍的寵嬖用事，驅使在野的各黨派最後公開地起來反叛。當成立臨時政府的各黨派對於建立永久政府的政體不能獲致協議時，別國的民主派主張應該以提議及宣言的方式向西班牙人民建議採取共和政體的政府。當然，我們認為更進一步則更要好些，並且勸告他們建立一個社會民主共和國。西班牙這時對於達到這一種嘗試所需要的一切條件，幾乎全都缺乏。照報紙上所宣稱的，參加“國際”的六萬黨員，至少有五萬並不存在，只是有趣的幻想之產物。當時言過其實正是一時的風尚，却大大有利於“國際”。依當時資產階級的報紙的說法，“國際”有幾百萬黨員，遍佈於全歐各處，並有相當多的基金。那些有財產的人民看到報紙上說“國際”的出納處只要把保險箱打開就可把上百萬的錢匯到罷工的地方可真嚇怕了。我自己就有一次，在“柏林報紙會社”的交際會上，聽到潑林斯—斯密司[⊖]很自信地告訴他的鄰座的

[⊖] 德意志自由貿易黨的領袖。

朋友說，“國際”的理事會剛交出一筆二百萬法郎(值八萬鎊)的款子以備比利時的礦工應用。我好不容易忍住了笑，那時理事會只要有二百萬生丁就很高興了。這種事對精神上的影響很大，可是錢却老苦不足。在巴黎公社起事後不久的一段時期內，甚至俾斯麥也被過分渲染“國際”的力量的報告所欺哄了。他甚至想召開一個國際會議來對付“國際”，但是英國政府不願意管這類令人愉快的計劃。

我們的“致西班牙人民書”，那是在一次公共集會上我做主席宣讀，而由李卜克內西附議付表決通過的，這事使我們觸犯了法律。最後我們兩人都被認為宣傳危險思想而判決三星期的監禁。我們在萊比錫的監獄中只服刑到一八六九年的年終，這案件便送到高等法院了。

在這宣傳危害國家的思想的罪名以外，我們還遭到一種誣謗拿破崙皇帝的起訴。這個罪名只得作罷，因為按法律要求，拿破崙應該親身到庭，而這回他却是由他在德累斯登的公使作代表的。

到一八六八年，我們與拉薩爾派的兩翼的爭執愈來愈趨激烈。一八六九年三月，我們與上述的這兩派召開薩克森工人大會於霍亨斯坦。我們本黨的集會則在前一天召集。我到達的時候——那是星期日的早晨——遇到了一羣面容污穢、看起來似乎一夜未睡的人跑向車站上來。我知道他們是拉薩爾派的(屬於哈茨費爾特—孟德派)，一共約有八十到一百人，前一晚從開姆尼斯來到這裏，決心來破壞我們的集會。擾亂甚至暴行全發生了；市長看到警察無能為力，把救火隊也調出來了。那一陣騷動很緊張，結果被

迫決定把大會放棄了。這樣做，我想是個大錯，可是也沒有辦法。人家都恭喜我當時不在場，有好多暴徒原打算專找我的，——別人這樣告訴我——用強暴來恐嚇我。六個月之後，在一次大示威運動上，我的演說獲得了極大的成功，有好些參加了這次鬧事的人，到我面前來賠罪；他們聲稱自己是被派了來的，現在深悔那次的錯誤。

有很久一段時期，李卜克內西和我兩人都很希望能安排好與施維澤爾當面會談一下，並公開討論一次。因此在某一次萊比錫的拉薩爾派集會時，有這樣一個提案，就是安排一次公共集會，讓李卜克內西與施維澤爾面對面地討論他們主張的異同與相互的指摘。李卜克內西立刻答應了，而且在他的“民主周刊”上說他能證明施維澤爾若不是爲了錢財便是爲了本來的意願，一直是有系統地故意阻撓“勞工黨”的成立，替俾斯麥的專制主義的利益而工作的。施維澤爾起先同意了，後來又翻悔撤回，最後說出願在不久將在巴門—易北菲爾舉行的“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的大會上與我們見面。這次大會我將在另一章內講到。

第十二章

施維澤爾與他所領導的 無產階級勞工運動

一 傳 記

自拉薩爾逝世後，在繼承“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領導權的那些著名人物中，施維澤爾是最能幹的一個。

施維澤爾充分具備了一個處於這種地位的人所應有的各種品質才幹。在理論方面，他有很好的根基，他的政治眼光很寬廣，他的判斷能力又冷靜。就一個新聞記者和宣傳鼓動家來說，他有這種本事，能把最難了解的問題講解得使最單純的工人也能了解。他最懂得怎樣掌握羣衆的心情和鼓動羣衆到狂熱的程度。他在自己編的報紙“社會民主黨人”報上發表了好些受人歡迎的科學性的文章，至今在社會主義的文章中還是最出色的——例如，他對於馬克思“資本論”的批評。就一個議會的雄辯家來說，他靈敏而圓滑，常常能很快地就抓住一個有利的機會或是利用一種新的情勢。最後，他是一個出色的演說家，他能估計得恰到好處，怎樣給羣衆和反對者同樣深刻的印象。

但是除了這些優良出衆的才能以外，他也有好些缺點，

使他成爲勞工黨還剛在發展初期中的一個危險的領袖。他是在經過了幾次失敗後才參加這次運動的。這運動對於他不過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而這目的便是他自己的升進。他來參加勞工運動，實在是因爲在他的早年已因自己的錯處被自己原來所屬的階級棄絕了，他看出了在本階級中已無希望。因此最後能滿足他的志向來做一下“名人”的希望，恰如他的才幹所企求的，就是參加勞工運動。他不僅要做這運動的領袖，而且要做這運動的獨裁者，並利用它來達到自私的目的。有好幾年，他在耶穌會教士所主持的學校內受教育；讀畢大學，學法律。他因此獲得了耶穌會教士那種鑑別人心是非和運用法律的技巧，再加上他本性的狡詐與敏銳，使他成了這樣一個政客，即能不顧一切以達到他的目的，那種目的就是不惜任何代價滿足他個人的野心，和沉醉於他的“高等游民”的生活，這種生活他本來是無力自給的。其實這已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民主運動中已有不少這種實例；好些個領導人物有着鋪張浪費的習慣，生活上是專講求奢侈逸樂淫靡之徒，却沒有財力來滿足他們的口味，遲早他們終會受不住引誘而墮落，特別是他們在表面上似乎達到某種程度的成就之後就更容易。

“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所給予他們的領袖的獨裁權非常有利於施維澤爾達到他所企求的目的。由於聯合會的唯一的一張報紙——他不能容許有第二張報紙存在——“社會民主黨人”報就在他手中，由他自己來編輯的，而他的統治地位就更加鞏固了。因此一切權力都操在他手中，他毫無顧忌地運用這種權力來造成對所有會員的思想上的絕對

的控制，並用力壓制任何反對以及對他不利的意見的發表。他却也有一套諂媚羣衆的秘訣，其實他是瞧不起羣衆的。我從未看見另一個人，能比他更完善地運用這一套的。他把他自己說成是他們的工具，只能按着人民的最高意志辦事。這些“至上的人民”却只能讀他的報紙，他把自己的意見用提示的方式硬加在他們的身上。誰竟敢螳臂擋車地反對他，便被叱爲起於最下流的動機，被歸於傻瓜一類；或稱之爲看不起勇敢誠實的工人而想剝削工人以謀自利的“知識分子”一流等等。

施維澤爾的這種逐漸得到權勢，只有在運動的初期才有可能。這就是他有那些發狂似的門徒的原因。今天若有任何人要學施維澤爾，那很快就會被壓制下去，不論他本事有多大。

施維澤爾是一個裝模作樣的民主主義者；假若他是一個國家的元首，那他真是馬基維利的門徒，這種主張正是他所欽慕的。他許多年來操縱這“聯合會”的那種專制力量只有與羅馬天主教會內的若干現象可以比擬一下。他在耶穌會教士門下的學習倒真不是白學的。

李卜克內西和我所譴責他的，乃是他竟按俾斯麥政策的利益來領導“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那當然是違反了大多數會員的意見和蒙蔽了他們的。我們認爲這種俾斯麥政策並不是爲德意志全部的利益而是一種大普魯士政策，它是爲了霍亨索倫王朝的利益而想出來的，目的乃在整個德意志之上建立普魯士的統治，並把普魯士的精神及政府的法則灌注入全德意志——這些都是民主政治的死敵。

照目前的情況以及考慮到那時俾斯麥正參加了反對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偉大的政治鬥爭，他竟用盡了無論多卑鄙的各種方法來達到他的目的。上一章中我已說到過他與拉薩爾的談判。對於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從俾斯麥那裏可以得到或者不可以得到些什麼；沒有一個聰明的、眼光清楚的人——拉薩爾與施維澤爾兩人都是這樣的人——會有任何的懷疑；若是俾斯麥與社會民主黨發生什麼關係，那也只是他設法利用它們來謀取自己的利益，以後他會一下就把它們丟掉，恰如丟掉一隻吮乾了的香橙一樣。當然，俾斯麥把民主黨的領袖們買過來，自可另有解釋；不過至少在拉薩爾那次的事上却不可能有解釋。

利用“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來達到俾斯麥的大普魯士政策的企圖是既迅速而又堅韌的。我現在就要證明施維澤爾實在是明白地懂得俾斯麥的這種計謀而竟積極地為它工作的。

施維澤爾在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二日出生於美因河上的法蘭克福。他的家庭是所謂的法蘭克福的舊貴族世家。

一八五〇年時，他到柏林來學法律，被介紹與普魯士“反動派”的主要人物都認識了，其中有一人便是弗萊特烈·裘利·施塔爾。但是他的家庭關係使他偏愛奧地利霸權下統一德意志的大德意志政策。在好幾本小冊子裏面，他都宣傳這種主張。後來，他又成了共和主義者，提出由革命來達到德意志的統一而以民主政治為基礎的意見。在他認識了拉薩爾以後，他趨向俾斯麥的“普魯士的德意志”的政策。到一八六三年為止，他所寫的和所說的，都是反對普魯士。

他甚至還說過，普魯士與奧地利都該毀掉，讓出地方來給一個統一的德意志共和國。環境突然發生了變化。有兩個很嚴重的傳聞，使他不能在原來所處的階級間容身。等到一八六三年他在法蘭克福與拉薩爾會面，他很快地認清這是一個有前途的機會而可滿足他的野心的。在他一八六三年十月演講的一篇演說詞內，題目是“進步的政黨”，他很猛烈地攻擊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各政黨，並主張社會民主黨的攻擊首先該指向自由黨人，而不該指向近代的專制主義及其教士與貴族階級。

按這種理論說起來，那些封建制度的支持者，就是討厭一切社會上與政治上的進步的那種人，倒並不是工人們的主要敵人，主要的敵人却反而是自由黨人。在自由黨人中，即使最不激進的也還相信近代的發展而主張要有某種程度的進步，若沒有了進步，一切資本主義的制度、秩序都不可能存在。唯其因有這樣的秩序支持着，至少使無產階級有可能起而取得自由的地位，並且有可能剷除人壓迫人的情況。施維澤爾知道他自己所宣傳的這套說法是過分反動的，並且是對工人的利益的一種叛賣，可是他依然努力推進這種工作以求得到自己的統治勢力。

俾斯麥這個容克分子，自然非常高興地接受極左派（激進派）的幫助的，甚至願意幫助這樣跟他合作的人。這樣地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力量敷衍敷衍——沒有一個明眼人看不出來這只不過是敷衍敷衍而已——豈不是最好的方法，可以嚇昏了素來就沒有胆量的自由黨的資產階級，一下子把他們套在俾斯麥的專制主義的羅網裏？社會主義愈激

烈，它愈可以嚇唬資產階級。這一政策與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正好背道而馳，此種事實幾乎已無須我多加強調。

二 “社會民主黨人”報

一八六四年七月，施維澤爾到柏林來主編一張黨報，即“社會民主黨人”報。辦報紙的錢是由他的一個娶了女伯爵斯脫勒歇費茲的朋友霍夫司丹頓那裏得到的。

這報紙的第一期上的最大的標題——全世界的民主大團結，建立以民主政治為基礎的統一而強大的德意志，廢止資本統治，國內由勞工掌握政權——使他得到了不少有力的投稿者，包括李卜克內西、馬克思、恩格斯、呂斯篤夫上校、喬格·海威、若望·腓利·培格及慕烈滋·赫斯，若他始終保持這樣的主張，他真可給這黨以莫大的助力，還可防止分裂。

但是“社會民主黨人”報的正確態度，並未保持多久。甚至在第六期上，便有一文講到俾斯麥內閣，其中有幾段尚算是很小心的，已露出了對俾斯麥政策表同情的態度。

在第十四期及以後的各期上，出現了連載的文章，講到“俾斯麥內閣”。在這裏，施維澤爾的民主假面具揭開了，結果失掉了許多上述的投稿者。在這些文章裏，他攻擊議會政治是平庸政治，極口稱讚弗萊特烈克大帝與普魯士以及霍亨索倫的忠君主義，也曾說普魯士邦當時的情形“尚不完全，需要繼續併吞”，而最主要的意思却在反對任何方式的議會政治。這一套連載文章的最後結論是：在德意志之內，

真正有力量的因子只有兩個，那是普魯士與德意志民族的全體——“普魯士的刺刀與德意志無產階級的拳頭！”這情形看起來似乎是不可信的，他竟會支持這樣一套政策，這豈不就是民主主義的全部失敗？不過，他很小心地避免明白地說出這一點，他讓讀者自己去求得這結論。他打算由他對普魯士的期望，吸引讀者趨向俾斯麥政策。在德意志的整個新聞界，俾斯麥再也找不出替自己政策辯護的更能幹的人了。

當施維澤爾的那些投稿者都已去職，而在報紙上攻擊他的時候，他申辯自己只是繼續拉薩爾的政策。也許他是這樣；不過，拉薩爾是一個有錢的人，他能與俾斯麥相持一下，而施維澤爾這正負着重債的人，却只不過成了俾斯麥的工具之一而已[⊖]。

“社會民主黨人”報的政策不久便得了預期的效果。早在一八六五年二月時，“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的一個會員就曾發表演說，說明他寧可要現在的普魯士反動內閣而不願進步派自由黨人主政。萊因—威斯特伐利亞的工人大會採納了這個決議，就是認可“社會民主黨人”報對普魯士政府所採取的態度，以為這個政府會答應設法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甚至還可能推行普選。這決議案不啻投票信任俾斯麥及普魯士政府。

不久反對施維澤爾獨裁態度的反對派被責罵為褻瀆了拉薩爾死後的名聲。這種對拉薩爾的崇拜心理當然正適合

[⊖] 倍倍爾先生在這裏詳細地描述了施維澤爾向雙方討好取巧的種種事實，還提出了證明文件。

施維澤爾的計劃，漸漸地拉薩爾竟偶像化而發展成爲一種宗教上的正統派的情形。“基督與拉薩爾”竟有好幾年成爲公共集會經常討論的題目。弗烈茲許(F. W. Fritsche)曾爲了一八六八年在柏林談到這個題目而被控犯褻瀆罪，後來卒因無法證明他有這種犯罪的意向而開釋了。

施維澤爾有時覺得自己的真意露得太明顯了，就寫些東西來表示自己是左傾的過激派。他也能儼然反動派般地寫文章，像慶賀國王的誕辰時，他代表“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發表的那篇長長的報告便是，他們甚至還打電報恭賀國王，稱他爲“工人們的朋友”。

這時候“社會民主黨人”報的銷數甚微：只有幾百個訂戶。因此，這報紙需要相當大的資助，而靠這報紙以維持生活的兩個編輯的薪水也無法付出。可是即使經濟情形如此窘迫，它自一八六五年七月一日起竟改爲日報發行。這樣，它所虧的款數增加了近一倍，而它的銷路可並未見得顯著地增加。那麼自然就會問到：誰供給這些錢呢？工人聯合會並不需要擴大這報紙；擴大了，對工人聯合會也並無利益；可是那些保守派的報紙却非常高興地轉載“社會民主黨人”報猛烈攻擊自由黨及其政策的文章。這種情形迫使自由黨不得不大大注意與其實際影響不相稱的“社會民主黨人”報，有一張自由黨的報紙公開控訴“社會民主黨人”報之所以與俾斯麥保持密切聯繫，乃是爲了要得到極端保守派的資助。施維澤爾要求他們撤回這種說法時，他們乾脆拒絕了，並且向他挑戰去訴諸法律。施維澤爾也恐嚇着說就要這樣做，當然，他到底却並不敢這樣做。

就在那時候，有一個叫普洛伊斯的，自稱是個工人，自己弄得聲名狼籍。大家疑心他是受政府僱用的，尤其懷疑他是那個樞密大臣華蓋納——俾斯麥的關於社會及政治事務的左右手——所僱用的。這個普洛伊斯是“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的經常演講者。這樣一來，這條綫索就清楚了——普洛伊斯，施維澤爾，華蓋納，俾斯麥。施維澤爾沒有親自與俾斯麥會見過。他與拉薩爾不同。我決不能忘記那一天的那種情景，當施維澤爾正走上講壇要向議會發表演說時，俾斯麥顯出好奇的樣子，拿起眼鏡來，把他從頭頂到腳底仔細地端詳，好像在說：“啊，這就是那個跟着我走的人！”

柏林的警察大概知道他跟政府的關係的，因為這位博士——他們很相熟地這樣稱呼他——是常受他們非常客氣的接待的。

根據女伯爵哈茨費爾特——拉薩爾的摯友——的意見，施維澤爾之替俾斯麥政策說話決非過分。在她一八六四年給海威的妻子的信中，她還以為他的支持俾斯麥的政策是正當的：

“在這兩件事之間是有非常大的差別的：把自己出賣給對方，替他秘密地或公開地工作；或是像一個大政客，能抓住機會，利用對方的錯誤，使自己的敵人彼此之間互相殘害，把反對者趕逼到不能立足的地步……那些只會老老實實地思想的頭腦，例如把一切事情都從未來的理想國家的立場來觀察，這種懸在半空中的立場的這種人，就一己而言，也許自有他們的好處，在行動上，他們可完全不中用。他們不能掌握事物的發

展；他們能夾在羣衆中跟他們的領袖走就算是够好的了，而做領袖的人却該比他們懂得多。”

這位嫺雅的女伯爵在這裏發揮出的這套辦法，可能把一個拉薩爾毀了，因為他後面沒有一股勁足以使他完成這套政策。我堅信若是拉薩爾早日果真與俾斯麥合作了，那他該早被擊敗了；企圖與俾斯麥玩一下俾斯麥自己所玩弄的手段，那結果一定慘敗無疑。相信俾斯麥在最緊要的關頭，他必須設法與資本主義的現代的各種勢力謀一諒解，並且爲達到這個目的，他甚至會利用社會民主主義的時候，真肯或者真會向資產階級社會的死敵社會民主主義讓步——若竟相信會有這種事，那就證明這人是盲目的，這種盲目對於一個參加實際政治的人將有莫大的損害。社會民主主義決不是一羣馴羊，它會盲目地隨着繫鈴羊走的，也不是一隻可以牽着鼻子走的豬。女伯爵哈茨費爾特在她當時所處的環境影響之下或許可以這樣想；可是在今天，若沒有羣衆自覺的合作及一種堅持誠實而公開的策略，要行民主政策是不可能的。羣衆決不容忍那種外交手段的好策；一個領袖若不相信這點，他不久便可受到教訓。

只要一有機會，施維澤爾又會變成極端激進派的。這是他常用來制止批評和塞住聯合會中的反對派的嘴的老辦法。有好些時候，他的“社會民主黨人”報被封了。最後，他因不敬王室的罪名以及其他的罪名被判監禁十六個月。但是這次的判罪並未阻礙他的報紙的編輯工作。他在監獄中主編報紙；他的通信並不受限制；還接見許多賓客。過去有人這樣說過，上述的被判監禁就是證明他並不是俾斯麥的

代理人。事實決不是如此；一個政府與它的政治代理人的關係決不會在法庭上露出來。一個政治代理人短期的監禁，反而是解除人家猜疑的一種很合用的手段。這種情形，就當拉薩爾正與俾斯麥不時舉行政治性的長談，宛如“一個融洽的鄉間鄰居”時，他却被柏林的法庭以嚴重的罪名判了好幾次的監禁。在一八六六年戰爭前的好幾個月，“社會民主黨人”報一直為俾斯麥的利益工作着。施維澤爾完全忘記了自己以前的信念，竟公開地宣傳推翻奧地利。他說：“奧地利應該減少到一千三百萬居民而屬於德意志聯邦。只有這樣，當普魯士佔有了這個領域的時候，才能組成一個統一的德意志。”

一八六六年五月九日，他因身體太壞而被釋放了。可是剛一被釋放，他在政治上却更加活躍起來，這不僅說明他的“健康狀態”僅是一種藉口，並且表明政府並不反對他的活動；因為，通常一個政治犯若得釋放，那是有條件的，他該不再繼續作他因此入獄的政治活動的。

上面那些話既已說過了，那麼就不必再來駁斥那最近又流行起來的一場爭辯，就是施維澤爾和他的聯合會在當時的事件的發展上——就是達到實行普選的這個目的的事——有着實際的影響。對俾斯麥說來，當然只要對他的改革有利，什麼幫助他都接受。早在一八六三年，那時工人聯合會還剛成立，他以作為一個反奧地利改革提案的對策者而要求一個由普選產生的德意志議會。在一八六六年一件公開流傳的文件中，他這樣寫道：

“直接投票及普選，我認為比某種旨在產生預想的

多數的‘空想的選舉權’還更容易保全(羣衆的)保守態度。根據我們的經驗,羣衆其實比那些按財產而有特權的階級的領袖們還要真誠地關心着保全社會秩序哩。”

同年,他還寫信給當時的普魯士駐英大使培恩斯鐸夫伯爵道:

“我可以把我的信念說一下,根據多年來的經驗,間接選舉和按階級而產生選舉人的那種人爲的辦法是更危險的,因爲它阻礙了主權與構成人民中堅的健全分子的接觸……革命的製造者就是選舉的團體,它供給了革命黨派以網布全國各地易於操縱的組織,一七九九年巴黎的選舉人的事就是一個前例。我毫不躊躇地斷言,間接選舉是革命的最重要助力,我相信自己對於這類事已積有很多實際經驗了。”

這種話很明顯地反映着普魯士三級選舉制度給予他的煩擾。按這種選舉制度行來,已有兩次使未可輕視的反對派重回議會佔了多數。再加在組成北德意志聯邦的各邦那種團結的方法之下,除了普選以外,實在沒有其他選舉基礎可以採用。早在一八六二年萊比錫的激進派勞工會社就已有這種要求,而一八六五年以後,這一項已在所有勞工組織的政綱之內了。

有一次俾斯麥只怕議員們重又否決支持戰爭(一八六六年)所需的款項而展延普魯士議會時,施維澤爾甚至爲俾斯麥辯護。

一八六六年四月一日,“社會民主黨人”報日報停刊,重又恢復它以前的一星期刊印三次。那時它有五百個經常訂

戶。後來，戰爭結束了，奧地利把威尼西亞割讓給法國，施維澤爾就乘這機會投向普魯士的陣營，“普魯士的出衆的組織能力已證明德意志的救星只能在那兒找到”。

但是當北德意志聯邦憲法草案最後公佈了的時候，即使施維澤爾，在一陣已嫌過晚了的悲觀情緒之下，也在他的文章裏承認德意志人民並未希望這種特別形式的統一。俾斯麥，那位徹頭徹尾的“實際政治家”真是“乘熱打鐵”，創制了這樣一部比普魯士憲法更缺乏自由的憲法。施維澤爾素來深知普魯士國家和俾斯麥的性質，一定早已預料到這種情形。我們本來就無幻想，當然不會失望。

三 施維澤爾——一個議會的雄辯家 與全勞工聯合會的獨裁者

在一八六七年二月，北德意志議會進行選舉代表時，施維澤爾在他的“社會民主黨人”報上顯得清清楚楚，表示保守派決不會發覺他是忘恩負義的。很明顯，他打算和保守派講一下價錢，一同對付自由黨，對於這種自由黨人，他已一再猛烈地攻擊過了。他是巴門—易北菲爾選舉區的一個候選人，同地與他競選的人有俾斯麥與另一個自由黨人。但是第一次投票就沒有把他留下；因此第二次投票時只剩俾斯麥與那自由黨人兩人競爭。施維澤爾在他的馬基維利式狡譎的演詞中，勸告擁護他的人去“按着良心的指使”投票，而差不多所有的社會民主黨的票數全歸了俾斯麥。結果當然俾斯麥當選了。施維澤爾還想爲他自己這種指示找藉

口，揚言他的目的在給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一個教訓。工人們投俾斯麥的票，並非因為他是一個保守派的候選人，而因為他是一位大臣而曾自動地給了人民一項權利——普選——這種權利，反對派的自由黨人一直忽略了未曾要求過。施維澤爾還反對我在格拉格—彌倫的競選，因為在一個純粹的拉薩爾派看起來，我實在是“他們的主義的叛徒”。後來由於俾斯麥已在另一區被選上而退出了，易北菲爾勢必舉行第二次競選，施維澤爾重出而為候選人，與那個著名的涅斯脫教授對抗到第二次投票，他又落選了，雖然他曾公開聲稱在社會改革這件事上，勞工黨儘可與保守黨合作，並認為保守黨的票自然成為他上次替俾斯麥効勞的交換物。

最後，在一八六七年八月，由於保守派的票數的助力，施維澤爾選上了，進入了第一次北德意志帝國議會。保守派的領袖甚至為了他的競選化掉了約六十鎊的運動費，施維澤爾當然感激他們的，他答應即使在涉及人民自由與福利的事上，他將始終與極左派一致，可是在一切外交政策上或有危險威脅祖國時，他不論在帝國議會內或帝國議會之外，都將盡其力之所及支持普魯士國王及其政府的。

施維澤爾的當選很自然地激起了擁護他的人的極大的熱誠，他利用這種情緒駕着四匹白馬拖的馬車耀武揚威地穿過巴門與易北菲爾兩個城市。施維澤爾自己也喜歡這種遊行的；今天的勞工領袖若也沉醉於這一套，那無疑地將斷送了他的事業。在其他場合，他還一再這樣做過；例如，當工人聯合會在加塞爾開會的整個時期內，那四匹白馬的做

車是非常觸目的。可是當他把賬單開出去時——決非一筆小數目——大會同意付款的是從車站到城裏那一段路，別的却不管！

在北德意志帝國議會的辯論中，李卜克內西和我有好幾次與施維澤爾面對面地起了爭辯，他狡猾地替俾斯麥政策辯護，攻擊我們，說我們是站在新形式的祖國立場以外。

至一八六七年五月時，施維澤爾到底達到了他的野心與目的，被選上了工人聯合會的會長。聯合會那時情形很壞，尤其在它的經濟方面。反對他當選的人認為一般地說起來，他並不被人信任，而把會長的職位與聯合會的機關報主編的職位併在他一人身上這事，尤其令人不滿。被選上以後，他嚴肅地與每一位代表握手，答應凡推進工人聯合會的事，他都將一一盡力做去，同時，那些代表也同樣嚴肅地表示願與聯合會及會長站在一起。這樣便成立了一場“網球場宣誓”，像法國一七八九年的國民大會那樣，所不同的是，這一次的主角知道他自己正演着一齣滑稽劇。

他的“社會民主黨人”報，這時約有一千二百份的銷路，新近他還與他的朋友馮·霍夫司丹頓決裂了，其原因却與他的信譽不大相稱，霍夫司丹頓用他的錢來投機，完全蝕本了，於是這問題又提起來，即他辦報和維持他頗為奢侈的錢是從哪兒來的？我們從柏林打聽得知他過着放蕩的生活。在議會開會期間，他僱用着穿制服的車夫的馬車，宴請他的心腹們時常飲香檳酒。像他以前有一回挪移一個來復槍俱樂部的基金那樣，這一回他做了聯合會的會長，竟擅用由工人們苦苦掙得一分一文集成的會費來滿足他的口腹之慾。

雖然這數目小，可是這不能怨施維澤爾，因為聯合會本身的錢就少。施維澤爾不止一次地被人公開指斥這種可恥的行爲，可是他終不敢爲自己辯護。一個能做這樣下流的事的人，當然能把自己的政治工作出賣的，在他這正是唯一的一種相當有利的買賣。這種事是無法證明的，却可從環境的證明去推斷。俾斯麥這時正掌握着一筆二百四十萬鎊的資金的利息，那是一八六六年扣押的漢諾威國王的私產，而交給俾斯麥代管的。由於俾斯麥運用這筆款子來達到他的政治目的的那種方式，這筆款子便得了這樣一個名稱“卑鄙的基金”。這件事實在是富有代表性的，所有的反對派的報紙都在貶責這種政治上的腐敗情形時，施維澤爾的“社會民主黨人”報對這事連提都不提一下。

另一件事也十足代表施維澤爾的，就是他從未在他的報上提過我們的報紙的名稱：“民主周刊”，而永遠稱之爲“李卜克內西先生的報紙”。他這樣做只是爲了怕他的讀者腦中印入了“民主周刊”這名稱。這是一個卑劣而又可笑的向我們作鬥爭的方法。

在下一次的聯合大會的會場上，施維澤爾發表了宣言，也可說是他非難自己。“這次將是我們的最後一次大會，”他說：“普魯士政府的敵對態度，不久便會表現出來，這聯合會會被解散的。”事實上，這聯合會真被解散了，那是三星期後給萊比錫的警察解散了的，那時聯合會正以萊比錫爲常駐所。這種情形能否懷疑聯合會的解散乃是施維澤爾與柏林警察方面協議一致的結果？很自然地，施維澤爾並未提出抗議，聯合會便到此爲止了。現在，若聯合會的解散

真由於普魯士政府的敵意，那施維澤爾豈不早該把該會盡快地撤離那懷敵意政府的勢力範圍，而在普魯士以外的城市中找一個——例如漢堡——作為常駐會所？因為漢堡並無限制結社的法律。不，他却不如是，而偏偏選擇了柏林，這完全證明他與柏林警察的關係。

新的聯合會是按“秘密會議”的形式成立的，新的法規賦與會長的權力幾乎是絕對的。這時候，施維澤爾又一次要服監禁三個月的刑期，可是不到一個月便給放出來了，說是“因為家事”。可是他立刻便參加了繁忙的政治工作，他早早地把下次聯合會的集會日期定在三月二十七日。預定的地點是巴門—易北菲爾。按預計，到那時他的刑期該尚未滿，可是他竟預先知道當局會開釋他。

他對我們的態度竟顯得從未有過的那麼激烈起來。他指控我們自覺或不自覺地爲了奧地利政策而工作。我得承認，李卜克內西新近在“民主周刊”中所取的對奧態度我也曾反對過，施維澤爾則趁此機會盡量利用我們這一弱點而大施攻擊。

在巴門—易北菲爾聚會前六個星期，施維澤爾以五千票對五十四票被舉爲會長。但是在道義上，這却是一次失敗：聯合會那時約有一萬二千名會員，可見那時的大多數會員根本就沒有投票。

在帝國議會的會場中，有一次我無意地看到了施維澤爾與阿爾勃蘭希脫親王的會面，他是國王的兄弟，也是一個議員。當那親王看見施維澤爾走近來時，就招呼他，很熱烈地跟他握手，還用着最親切的口氣跟他談話：

“你好嗎？我的親愛的施維澤爾！”

施維澤爾：“謝謝你，親王殿下。”

親王：“開會時，你爲什麼沒有到會？”

施維澤爾：“我到會的，親王殿下。”

親王：“那麼你爲什麼不講話？大家都想你會講些話的……”

我不願被人家認爲是偷聽談話便走開了。不過就這幾句我聽到的話，已可十足證明施維澤爾素爲親王所熟知，而他的最激烈的演說詞的真正意義究竟是指什麼也會爲議會中的右派所深知的。

四 巴門—易北菲爾大會·全勞工 聯合會內部對施維澤爾的反對

我們在三月二十七日抵達巴門—易北菲爾時受到好些“國際”的友人們的歡迎。

施維澤爾已在“社會民主黨人”報上宣稱過：敵人已有兩次胆敢抬起頭來反對會長（會長是聯合會中最顯著、最重要的人物），在全體大會中一切對組織的攻擊都必須排除。

在預備會議時，與施維澤爾的勸告正相反，決定立刻就允許我們參加大會。第二天下午，李卜克內西和我在施維澤爾的狂熱徒衆虎視眈眈的目光中走進擁滿羣衆的會場。李卜克內西先演講了一小時半，接着我講，演說詞比他短得多。我們的演說詞包括了歷來我們對施維澤爾各種攻擊的提要。在演講時，起了幾次激烈的騷動，尤其在我們攻擊他

受政府僱用的時候；但是我拒絕撤回任何一點。“社會民主黨人”報把我們的演說詞大大地縮短了，又含糊地刊印出來。李卜克內西由於過分的老實，在他的“民主周刊”上僅把事實刊載了一下，還加了一句，說他不再攻擊施維澤爾，他依然希望能與那一派別達到一種諒解。

施維澤爾在我們演說時就坐在我們後排，一句話都不回答。我們接着立刻就離開了會場，有幾個代表保護着我們，以防施維澤爾的狂熱徒衆的毆打。他們一陣高聲大罵：“惡棍！奸賊！流氓！”等等。到門口，我們的朋友迎着我們，保護我們安返旅館。

施維澤爾以六千五百票的數目獲得了信任的多數，代表四千五百票的代表們却放棄表決。可是爲了這次勝利，他付的代價可大啦。聯合會自被萊比錫警察解散後，是施維澤爾獨自加以組織的，並使他有着獨裁的權力，現在却改組了。大會採取了完全民主的組織，大大地限制了會長的權力。

被取消了專制的權力，施維澤爾便試圖跟我們在柏林求得一個諒解。他請我們吃飯，還請我們坐他的雙馬馬車去看戲。我們磋商得一個休戰的局面，大家同意不再互相攻擊，在帝國議會中大家合作。爲宣告這協議，雙方的報紙上都登出了相同的宣言。

這一切情形看起來很好了；可是施維澤爾却被在巴門一易北菲爾通過的聯合會的民主組織法所加在他身上的限制激怒了。這民主組織法及種種限制，有效地防止了他以後的奸計取巧，對他來說，不啻斷送了政治生命。他決意

要逃避這種情形。像晴天霹靂一樣，“社會民主黨人”報突然刊出了一篇宣言，題目是“拉薩爾派的統一的恢復”。用着誇張性的詞句，宣稱恢復舊時的拉薩爾派組織，把施維澤爾的羣衆與拉薩爾的密友女伯爵哈茨費爾特所創立的一派聯合起來。在極度匆忙的情形下，這兩個聯合會被解散了，而拉薩爾的組織又重新建立起來。這次政變是爲了重建昔日施維澤爾的佔優勢的權力而佈置好了的。同時，還宣告跟我們這團體的休戰告終，因爲我們先不守約，而把我指爲禍首；我的罪過是下面這件事實：我侵入了由聯合會會員主持的集會這個禁區來演說，主張社會民主的原則是改善工人生活情況的唯一途徑而勞工方面的各黨派應該協同進行工作。

我可以加一句，作爲一個宣傳家，雖然我獲得了成功，並且得到了喝采，可是當時我寫信給我的妻子說我已厭煩了這種工作。然而，我必須繼續把這件事做下去的時間是多麼長啊！不過這是我的責任，這就用不着再說什麼了。

這次事變在施維澤爾方面是大大地激怒了聯合會中的相當大的一部分會員。有些較聰明的已認清施維澤爾是不能令人忍耐的，他是團結一致的主要障礙。一位從漢堡來的會員勃勒克要李卜克內西和我召開一次會議。我們就和其他的會員在麥格德堡的一所三等旅館中開了一次會。有些人贊成立刻行動，有些人則主張由內部改革做起。我們回答，巴門—易北菲爾的會議足已證明，只要施維澤爾在做會長，任何事都不可能做的。我們討論了一整夜，末了，勃勒克就伏在台球案子上，寫了一張宣言。我們到清晨三

時才去睡覺。這宣言是給本黨所有的朋友的；指斥施維澤爾是一個僞君子，他侮辱了主權所在的人民，他不但不設法聯合所有社會民主黨的工人以求團結一致，反而意圖加深各派間的分歧。這宣言要求全體工人起來反抗一個人的統治，爲求在民主基礎上組織一個加入“國際”的社會民主黨，決意立即召集全德意志的社會民主工人大會。這宣言由這時正宣告脫離聯合會的十二個會員署名，而在六月二十六日的“民主周刊”上發表了。我們爲針對施維澤爾不誠實的措施，特別強調我們目的的眞誠，不久我們便得了“老實人”的綽號。

我們工人會社聯合會的常務委員會一致決議（由於我的動議）承認這宣言，通告我們的各會社，促使他們取一致行動，要求召集全德意志社會民主勞工大會。我還寫信給日內瓦的勞工國際中央理事會的德意志部，請他們認可我們的統一工作。

施維澤爾當然又用他的老辦法，在“社會民主黨人”報上反對我們。他說我們的黨並不是工人的黨，乃文人、教師和別的“資產階級”的黨派。他還主張已恢復了的拉薩爾的組織必須保持團結。在我們這一方面，“民主周刊”上登出了每天脫離聯合會的人的名單，其中有很多工會的領袖。

施維澤爾重以絕大多數被選爲會長；可是詳細數字却沒有發表。他說工人聯合會將派代表到社會民主勞工大會上來，還印出了些準備提出的議案。同時他却說，在我們這大會後面實在站着各種色調的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我們回答他，不要派他的傀儡來，請他自己來。但是他却寧願再

進監獄去。

我願提出下列事實，供讀者們思考：在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底，施維澤爾又入獄三個月。到十二月底，他才被放出來——一星期——讓他去處理因父喪而起的家庭事務。直到二月十八日他再進監獄時為止，他自由了七星期，却當着警察的面前進行着最緊張的政治活動。到三月四日，他又被放出來了，因為帝國議會的會期到了。議會會期到六月二十二日結束了，可是直到七月十九日他却一直自由着，並且在這整個期間非常活動。只有當他方便的時候才回監獄裏去。

在別的事情上，普魯士的警察當局却決不會如此考慮犯人的。相反的，這是他們的殘忍的習慣，就是在清晨六點鐘時，把判決監禁的人從被窩中拖出來關起來。施維澤爾却從來沒有看見警察的這一面。我們對他的懷疑豈不是很合理的麼？

就在愛森拿赫大會開會之前，有一個拉薩爾派的人想設法破壞我的政治名譽。他在“社會民主黨人”報上說我每年從已退位的漢諾威國王那裏得津貼六百泰勒（約合九十鎊）。這誣讒是很蠢笨的，可是聯合會中竟有人相信。因此我決定訴諸法律，要以惡意誹謗罪來懲處這個誣捏的人。我就去與當時柏林的第一位律師叫漢薛門粹耳的商量。可是他却辭却了這案件。他說，法庭上看來我從一位君主那裏接受些錢的爭端並無什麼毀損名譽之處，因此，誹謗我的人只有誹謗罪。這情形自不能令我滿意。而且，若是法庭要召這遜位的國王的管家來作證人，那他一定拒絕出庭，這

情形於我又是不利的。末了，我寫信給那個指責我的人，要他把證據公開出來。他竟不但不撤回他的指責，反而藐視我，並且再次地說要我去控訴他。我就罵他是下流的造謠者，要他在萊比錫的法庭上控告我，因為我不信任柏林的法庭。結果，都等於零。指責我的人說他自己並沒有證據，可是有一個政府的高級官員說這種指責是真的；而他只有在法庭上才肯把證據拿出來。

五 愛森拿赫大會·社會民主勞工黨的 成立及工人會社聯盟的解散

我們中間既已同意在八月七日於愛森拿赫召開大會，便在七月十七日的“民主周刊”上登了一篇宣言，簽名的有：六十六位工人聯合會的從前的會員，一百一十四位德意志工人會社聯合會的會員和拉薩爾(哈茨費爾特)聯合會，在瑞士的德意志勞工聯合會中央委員會，沮利克的德意志共和社等各團體的若干人以及奧地利的勞工代表，“國際”的德意志支會則由若望·腓利·培格代表。

這宣言是對德意志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而發的。首先追述過去由於對付某些個人自私和惡意的手段的必要，造成了勞工黨派內部的分裂，希望由這一次健全的革命措施中產生一個黨的組織，在原則上比以前純潔，在組織上更加團結；在同“國際”一樣的基礎上，宣言號召於八月七日至九日在愛森拿赫舉行一個全德意志社會民主勞工大會。會議程序包括有：(一)黨的組織；(二)黨的綱領；(三)黨與“國際”

的關係；(四)黨的機關報；(五)工會的聯合。各代表務請準在七日抵達，俾便推選出委員會及協議事務程序。

同時，就在八月九日，我還召集德意志工人會社聯合會，也在愛森拿赫舉行，討論我們這工人會社聯合會對新組織的社會民主黨的態度，和最後它本身的解散。預先集會籌備愛森拿赫大會的人授權與我作開會時必要的準備，並詳細起草開會程序及組織方案，以備討論。

到今天，我翻開這些舊信，還不免高興，這是皇家薩克森鐵道局——那時還是私家的土林吉亞鐵道局——的覆信，答允我的請求給社會民主黨大會會員以減價乘車的優待，這種優待本來只限於議會議員的。今天却不易獲得這種優待了！

開頭的時候，若望·腓利·培格投在他的“先驅者”報上論及這新黨的組織的那篇文章，頗使我竊了一下。却說這位若望·腓利是一個傑出的老伙伴，獻身於主義，準備着任何的犧牲，日夜不知疲倦地工作，早就是一個老有經驗者，在一八四八年巴登革命的時候是非正規軍的上校，沒有別的事比使他重新上馬帶兵更高興的了。他常常講他的多變而又豐富的生活有趣的事；一次我就聽他講了好幾小時。可是他對於黨的組織的事懂得不太多，又由於他離開德意志已久，對於當時德意志的情形已陌生了。這位培格，他不主張一個嚴密、中央集權、按民主原則組織起來而又能進行有力的行動的黨組織；却提出一種鬆懈的合併的社團來推行民主的原則，而不必要黨的組織，它是由一種性質可能隨時改變的機構來管理。它可能向各方面發展，而依附

於日內瓦。這篇文章的後果是：國際的總會從倫敦寫信給我說，他們對於這事簡直是聞所未聞的，並且不允許這樣做。我便回答我很高興聽到他們這樣的意見，並且在大會中我將反對這種說法，因為它是不切合實際情況的。

大會出席的人數很多，到會代表二百六十二人，代表了一百九十三區；別的人有培格（日內瓦），葛留黎希和蘭登道夫博士（沮利克），奧勃溫特和許恩（維也納）與霍夫司丹頓（柏林）。宋納曼（法蘭克福）也在，不過這是他出席勞工大會的最後一次：他所希望的勞工黨和人民黨（激進派）間成立諒解，到底未能實現。我們的黨的階級特性，他覺得討厭。施維澤爾的人——我們以後就那樣稱工人聯合會的人——却很少，不及我們人數的一半。他們聚集在“船舶”裏，我們則聚集在“金熊”裏。我們從好幾處聽到說，施維澤爾派的人想用暴力手段來破壞我們的大會，我便到市長與警察那裏去，問他們若遇到這種事情，他們預備怎樣。他們向我保證我們可以任意去做；在薩克司—魏瑪，結社與集會的自由並無限制；不過，倘若有別的黨派意欲用暴力來試行破壞我們所安排好的集會，那警察會站在我們這一邊來干涉的。

晚上約七點鐘的時候，施維澤爾派的壯漢約有一百多，進入了“金熊”。他們走到樓梯口——我們早就堅強地佈置了我們的人在那裏——却願意拿出他們的卡片來以和平的態度請求入場。我們先已佈置好，若有什麼騷動情形發生，主席便把大會延期一日，改到星期日，那時再把施維澤爾派的人排除出去。

事實恰如我們所預料的：剛開始推選大會職員的時候，

劇烈的爭辯便開始了。我們坐在委員桌上的人，因為光綫不足，點了些洋燭插在空瓶口上，又怕空瓶傾倒，還得兩手捧着瓶兒。末了，會場中大吼大鬧，主席便宣佈延期到明晨上午十時在“原野”再開會，僅限持有黃色卡片的人才能入場。

我們這種改變果然奏效。連夜我們理出施維澤爾派的人的卡片，送還給他們。以後，大會的進行便再未受到什麼滋擾了。

那些警備人員所提出的綱領草案與組織法，只略加修改就通過了。這新黨的名稱是社會民主勞工黨。採取的綱領如下：

“(一)社會民主勞工黨的目的在于建立一個自由的民主國。

(二)每一個黨員都誓為達到下列的原則而努力：

1. 目前的政治、社會情形是極度不公平的，因此要竭力反對它。
2. 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並不是為一階級的特權或優先權而鬥爭，而是為求得一切平等的權利與義務，並廢除一切的階級統治。
3. 工人在經濟上依賴於資本家是各種被役使的形式的根源。社會民主黨的目的是要廢除現在的生產方法（工資制度），憑藉合作勞動以確保每一工人可得到他的工作的全部生產。
4. 政治自由為工人階級求經濟上解放的必需基礎。因此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是不可分的；

其解決有賴於政治問題的解決，亦唯有在民主國家之下才有可能。

5. 鑒於工人階級之政治與經濟的解放全靠這一階級的一致團結、奮鬥才可能實現，社會民主勞工黨採取一種團結一致的組織，使本黨每一黨員的努力都能有利於全體的利益。
6. 考慮到勞工之解放不僅是一地的或一國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包括現代社會的所有國家，社會民主勞工黨就集會法所允准之範圍內，自認為是‘國際’的一支，並採取其目的為目的。

(三)下列各項認為是急須宣傳的問題：

1. 所有二十歲以上的人以秘密投票的方式舉行平等的直接的普選，選舉帝國議會議員，各聯邦議員，各省、各地議會及其他代議團體的代表。各代表均為薪給制。
2. 提倡人民的直接立法權（創制權和複決權）。
3. 廢除一切階級、財產、出身及宗教教派上的特權。
4. 以民兵制來代替常備軍。
5. 使教會與國家分離，學校脫離教會的管轄。
6. 初等學校內推行強迫教育，一切公共教育機構推行義務教育。
7. 司法獨立，推行陪審制度，工業事務的法庭，採取公開、口頭的審判程序及不付報酬的司

法行政制度。

8. 廢除一切有關出版、結社、集會的權利之法律上的限制。實行正常的工作日，限制女工，廢止童工。
9. 廢除一切間接稅，實行一種簡單、直接、累進的所得稅及一種遺產稅。
10. 國家輔助一切合作事業，國家貸款與自由生產合作組織，並保證民主管理。”[⊖]

在會務進行中，我得以發表蘭登道夫博士所允許的從革命基金(沮利克的)中資助我們九百泰勒(約合四十五鎊)供宣傳之用。這是我們用錢的來源，而不是漢諾威國王的賜與。黨的機關報“人民國家”則規定每週出版兩次。

黨的執行委員會設在不倫瑞克的烏爾芬褒太爾，監理委員會則設在維也納。我反對選擇萊比錫，因為我們在萊比錫一定與執行委員會的人員相處得非常好的，而不倫瑞克的會員過去許多都是屬於工人聯合會的，正需要照顧。斯圖加特被選為下次大會的開會地點。李卜克內西則在下次“國際”在巴塞爾開會時，代表我們出席。

⊖ 愛森拿赫綱領的其他部分規定了黨的組織規程。會費定每月一辨士，黨的機關報的經常訂戶便可免繳。大會每年聚會一次；會務執行人員每年改選，計有主席、副主席、秘書、出納(須有存款担保)以及助理。另選十一人的監理委員會，職責是監督執行委員會的財政措施及聽取對執行事務有所不滿的報告。它有權可將執行人員停職，或執行委員會全部停職。“民主周刊”定為黨的機關報，改稱“人民國家”；歸執行委員會管理，但可向監理委員會提出申訴，最後可訴諸大會。

我們的大會的成功使施維澤爾派的人大為沮喪。他們既被我們排除了，就在他們自己的集會上通過了好些決議案，可是後來並無什麼結果。

在緊接着大會之後的我們的工人會社聯合會的會議上，關於本會的解散及其與社會民主黨的合併問題一致通過了。各會社聯合會成立了六年，有了一百一十九個支會（聯合會社）和一萬名會員。會中的一切書籍、信件、宣言及其他文件都交給我妥為保藏。

六 愛森拿赫會議以後·施維澤爾的結局

愛森拿赫會議以後，兩個社會民主派間的鬥爭比以前更激烈了。甚至拉薩爾派的兩派，就是施維澤爾領導的一派與孟德—哈茨費爾特派，重又相互爭吵起來了。在我們自己的陣營中，因為在涉及土地問題的一個決議上也稍微有些麻煩，而這問題是曾為在巴塞爾的國際勞工大會所採納的。李卜克內西是我們赴會代表之一，他所支持的兩個議案是：一、“社會有權可廢止土地私有權，並使土地國有。”二、“土地國有是必須的。”這些決議案在德意志引起了很大的騷動，尤其在進步民主黨中間，他們認為這真是無法無天。李卜克內西欲緩和這樣的情勢，便在他的“民主周刊”上聲稱：這並不是一個黨的原則，每一個黨員對這事可以保持他自己的看法。這樣做當然不會使當時的情勢好轉，反而授拉薩爾派以口實，他們便稱我們是半生不熟的社會主義者和為政治目的而與別人暫時結合的人。後來，當

李卜克內西徹底地改變了他的意見，並且在他的報紙——自愛森拿赫會議以後這報紙已改稱“人民國家”——上說巴塞爾決議案是黨的原則，這可以說他是對的，可是他正是在徹底否認自己以前的意見了。有一次我周遊南德意志為鼓動的目的旅行演講時，我有機會為巴塞爾決議案辯護。二十天內，我在十八個城市作了十八次演講。在斯圖加特那次，進步民主黨的全部負責人都在場，他們的領袖問我們對於巴塞爾決議的態度。我回答在我們下次的大會中便將確定我們黨的立場，而且無疑地將接受這些決議的。不過，為了安慰他起見，我又加一句，他不必把這種情形看得太困難，因為這些原則的實行勢必等到輿論都已改變過來後才有可能。這就把這件事敷衍過去了。

一八七〇年年初，第四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產生了，不過這組織壽命不長。那時本來已有了我們這個組織和兩個拉薩爾派的黨派。施維澤爾用盡了他所有的方法來壓迫在巴伐利亞地方一個獨立的組織。它的機關報是在奧格斯堡出版的“無產者”。當這個黨派為謀求成立一個獨立組織而在奧格斯堡召開全體大會時，我被派為代表去勸止他們，並消除他們的疑慮——因為他們把我們看為進步黨的附庸——還要說服他們來參加我們的組織。雖然我已盡我的全力做去，可是當時並未成功；不過，到後來的斯圖加特大會時，我們互相有了諒解。那巴伐利亞的派別，便加入了我們的黨派。這是後來我有一次在慕尼黑演講時聽眾中的一位喬格·馮·伏爾瑪——那時他還只是一個二十歲的青年——事後告訴我的。

社會民主勞工黨的第二次大會於一八七〇年六月四日至七日在斯圖加特舉行。按照北德意志聯邦的憲法，帝國議會的大選——事實上，由於普法戰爭爆發而延期了——應在八月底舉行。因此，在這次競選中我們所該採取和遵行的策略是這次大會討論的主要項目。李卜克內西和我對於實際議會的活動的範圍有着不同的看法，末了，我們同意下列的決議：

“社會民主勞工黨將完全從鼓動宣傳的戰略觀點參加競選。在帝國議會中本黨的代表應盡其可能為工人階級的利益而活動，不過就一般而言，將完全採取消極態度，並利用每一次可利用的機會來證明這種辯論是完全無意義而又可笑的。

本黨將不加入任何聯盟或與任何黨派妥協，不過本大會提出忠告，就是在若干本黨並無候選人的選舉區內，本黨黨員應投票選舉與本黨政治立場最接近之友黨候選人，尤其是那候選人是真正的勞工代表。”

雖然我們這個議案遭人反對，以為應當完全不參加競選，最後我們的議案還是被採納了。

至於對巴塞爾的決議案，我以報告者的地位提出下列議案：

“鑒於生產的必需以及農業經濟（科學的農業）上的法則需要大規模的勞動，並且，恰似近代工業中一樣，需要引用機器以及農村勞動的組織，這是很明顯的；整個近代農業的經濟發展正趨向大規模的土地經營；又鑒於在農業上小農及中農正逐漸為大量田莊土

地的所有者所吞併，而大多數農村人民的困苦和奴役正逐漸地爲少數人的利益而增加着，這種情形是違反人道和正義的；更鑒於土地本身的生產能力——並不全賴於勞力——實爲一切生產品及有用物品的原料。

本大會因此這樣主張：近代社會的經濟發展使一切農業財產轉變而成集體的財產實爲整個社會之所必需。國家應將土地貸與農業合作社，強使它們用科學方法耕種土地，並在契約的基礎上將勞力所獲分配給共同合作的分子。爲求得合理的與科學的耕種方法之可能，國家應設立技術學校及研究機關，並將這種必要的知識傳播給從事農業的居民。”

那時，奧地利政府既已採取行動對付工人俄勃溫特，指控他叛國；同時，約翰·慕斯脫和“社會民主黨人”報仍繼續不斷地指斥李卜克內西是奧地利政府的工具，而我們却在掌聲雷動中通過了下面的決議案：

“本大會宣稱，奧地利政府對於勞工運動的態度及其給與被監禁工人的待遇簡直是輕視整個人類，已引起全世界工人的憎恨與鄙視。”

下一次的大會定於一八七一年在德累斯登舉行。

一八七〇年帝國議會大選期近的時候，施維澤爾的口號是“打倒‘老實人’！”——那就是社會民主勞工黨。在我們的候選人與反動派間競爭第二次投票時，他勸告大家棄權。可是在我們與自由黨人競爭第二次投票時，他勸告他的羣衆投自由黨的票。他這種無恥的行爲大大地激怒了我們。我們便確實相信他是奉政府的命令行事的，因爲我們

這一黨是所有的黨派中最激烈反對俾斯麥政策的。可是我們仍然不願這種狡詐的手段，一致決定支持各個勞工黨派中任何一黨的任何候選人，却專反對施維澤爾一個人。在巴門一易北菲爾他就要遭到我們的反對，我們是爲了把在勞工運動中這樣的一個人清除出去：他在激進主義的掩飾下，却盡其所能地在破壞勞工運動。

到七月的時候，“社會民主黨人”報和我們的報紙“人民國家”都被迫宣佈縮小篇幅；普法戰爭突然爆發了；我們的許多讀者都得去從軍，還有許多都失業了。

至於戰爭的原因與經過，我以後還要講到。李卜克內西和我都以爲戰爭的爆發，拿破崙與俾斯麥同樣應該負責。當戰費公債付表決時，我們棄權了，這種態度我們在帝國議會公報中發表宣言說明了。對於施維澤爾說來，這戰爭不但是對德意志人民的戰爭，而且是對社會主義的戰爭；每一個日耳曼人若向這種和平破壞者作戰，同時就是在向將來的思想與觀念的最大敵人作戰，就是爲着自由、平等、博愛而戰。在當時這樣衝動的狀態盛行的時候，最震驚人的誇大話都能引人相信，這自然足夠鼓起人們對我的歧視了。

正在戰爭的狂熱之下，從維也納傳來了奧地利工人被判罪的消息。參加愛森拿赫大會的人都被判處長時期的勞役與流放。被判罪的工人中之一就有約翰·慕斯脫。

所有的報紙都攻擊李卜克內西和我在帝國議會中的態度。“社會民主黨人”報當然更不會後人，罵我們爲賣國賊以及其他一些更壞的話。施維澤爾甚至專派人到萊比錫來煽動羣衆反對我們。可是他們未能成功。有一次我們正在

開會的時候，得到通知說施維澤爾的人，已走向李卜克內西的住所，要想打毀他的門窗。我們兩步併一步地趕去，可是到那邊已太遲了。好幾扇窗戶都已被打得粉碎了，李卜克內西的太太當時正在餵孩子，大大地吃了苦頭。我們大怒地追去，趕上了那批暴徒，把他們狠狠地打了一頓。隔了幾天，有一羣學生，也想這樣對付我，還組織了滑稽嘲笑的啦啦隊來助勢，却給我的房東把我住的內院的院門關了起來，阻擋回去了。

這種種企圖，還有多次不值一提的，大大地激怒了那些投票選我的人，他們雖然窮，却湊集了款項送給我一個銀質的桂冠，還附了一首烏蘭的詩。我若早知有這樣的事，我不會讓他們這樣做的。

忽然“社會民主黨人”報改變了態度，施維澤爾與那些地位高的人的聯系顯然已經斷絕了。這戰爭，因為不斷地打勝仗，把南德意志和北德意志的中產階級差不多全部都帶到了俾斯麥的腳下。甚至在南德意志的民主派中，沙文主義也在抬頭了。這真是狂醉於愛國主義的時候，俾斯麥現在可以用不到施維澤爾這類人了。

因此“社會民主黨人”報也就不贊同“強迫合併亞爾薩斯—洛林以及拿破崙的復位了”。恰似我們的“人民國家”一樣。

當我們不倫瑞克黨支部的負責人被捕而鐐鑼地送入魯鎮要塞時，“社會民主黨人”報惡意地批評道：“那兩個大煽動家，李卜克內西與倍倍爾把人家送上火綫去，而自己倒安然無事。”可是，他們沒等多久，便得遂了心願。

帝國議會在十一月二十四日重又集會。“社會民主黨人”報宣稱他們的代表對以後的公債將投反對票；原來這次戰爭本是抵抗的性質，現在却已變成征服的戰爭了。這裏施維澤爾又一次趨向我們的立場；可是在李卜克內西與我屢次提出的一切關於這問題的辯論中，施維澤爾與他的朋友却始終保持了緘默。

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李卜克內西與“人民國家”的另一位編輯和我，突然各在自己的家中被捕了，家中的房間全被搜查了，我們還被看管了起來。這樣，我們就在競選期中，被軟禁起來；可是，施維澤爾却毫不躊躇地提醒他的聯合會會員，關於他們的誓言即擊敗“老實人”。他這樣做的時候，我們正在監獄中受着最嚴酷的待遇，而檢察官和法官正在捏造我們的罪名，叛國罪！無論怎樣，聯合會的萊比錫會員們在決定自己的事情上，到底有着大家共有的正直和階級意識，他們與我們的會員採取一致行動，推選我兼做他們的萊比錫候選人。

一八七一年三月三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登載了一篇社論，滿是非常自負的話；可是，到第二次投票時，施維澤爾便被保守派擊敗了，就是一八六七年拿出六十鎊錢來支持施維澤爾競選的那個人！這次失敗促進了施維澤爾退休的傾向。他宣稱決意自聯合會會長任上退休。他的朋友與敵人同樣覺得驚異。也許他想到退休，不過他的真正的動機恐怕在這件事上：就是過去他做出的這許多不正當的行爲和疏忽已使聯合會對他失去了信任，現在他終於對重獲他們的充分信任這點也已感到絕望；而這時，他又感到自己對

社會民主勞工黨的競爭也未見得能有恆久的成就。我們的黨，雖有組織上的弱點和缺乏一致性，却每天有着進展。施維澤爾不得不尋求與我們的聯合，那也就意味着拋棄他以前的一切策略。他是寧可乘他自己的意願做去；他早已有了安排，已鋪好了他回到資產階級羣中去的路，那就是他在一八七一年一月寫來的一部三幕劇“喀拿薩”，這幕劇很有吸引人的力量。

早在四月三十日的時候，已有一派哈茨費爾特組織內的派別決議與我們聯合起來。在五月十九日舉行的勞工聯合大會的大會上，施維澤爾宣佈“社會民主黨人”報已停止出版。他說這報從未自給自足過；甚至編輯人的薪給也從未付過。這聯合會當時便決議在“新社會民主黨人”報的名稱下恢復出版。雖然就在這次集會中，施維澤爾遭受了激烈的攻擊，到底大會還是一致通過向他申謝過去他有力的領導，並且對於他的退休表示惋惜。可是這次表示謝意的一致表決，恰可陪襯出下一次一八七二年舉行的大會議程與這次的強烈對比。那次大會上，就有一個他以前的親信控述他以前怎樣地私自挪用公款，又做柏林警察局的密探。最後施維澤爾——他當時也在場——被請退出會場，而以五千五百九十五票對一千一百七十七票決議把他永遠從聯合會開除。

這就是施維澤爾的政治生涯的結局。他甚至被好多年來一向絕對信任他的人所唾棄、所責罵。他這個人，除他別的品格以外若再能有這幾種作為一個勞工領袖不可或缺的優點，那就好了，這些優點該是：不自私、誠實以及全心全力

只知爲主義。他若能這樣做到，那才真是人事兩宜，那麼許多年來劇烈的內部衝突，爲親者所痛、爲仇者所快的如此巨大的時間、金錢、健康與精力的消耗都可避免了。有些事却也得歸功於他，就是他有這種才幹能把社會主義的觀念散播給大眾，而他又能非常生動、流利地表達給別人；可是他在政治上的雙方討好，種下了工人中間齟齬與狂信的根由，因而使他們長久地分裂着。

我有這樣的信念，這正是他的真正意向：他的各種活動的真正目的——在俾斯麥眼中是唯一的目的地——就是造成一種勞工運動，却附屬於政府之下。至於這一點却決無可疑，就是施維澤爾是給俾斯麥服務的。

施維澤爾常訴苦說工人階級忘恩負義。這是與事實完全相反的。他來參加這運動時，對於自己所盡力的事就抱着一種錯誤的觀念。一黨的領袖只有盡其所能，就如一個誠實人那樣，完全貢獻給黨，才能成爲真正的領袖；而一個人之盡其全力正是任何參加民主運動的人的責任與本分。由於他的服務，他獲得羣衆的信任，羣衆乃接受他做領袖。不過這只是作爲他們最信任的一個人，而並非作爲他們必須盲目地服從的一個主人。他是羣衆的要求的代言人，是他們的企願、希望和志向的說明人。只要他一直這樣保持與黨一致，黨就一直信任他。不過若一旦人民發覺他們是被作弄和被欺騙了，那不但是他們的權利，也是他們的義務來剝奪這個人的領袖地位和所給予他的信任。原來並不是黨爲領袖而存在，而是領袖爲黨而存在的。既然任何權威的地位都有被誤用的可能，黨便有責任來管制領袖的活動，

並監督他的一切活動。

施維澤爾的看法却不同——好像是上下顛倒的。他看他自己倒像是個施惠者。黨是塊踏脚石，給他踏着升到高處去的，是他滿足自己志向和求得他自己沉浸於浪費嗜好的一種手段。他不能做到這樣時，就抱怨說人家忘恩負義。其實，只要羣衆對領袖的誠實保有信任時，他們是決不會不感謝的；並且一旦他們對他有了信任，便很不容易再說得使他們相信他們自己是正被欺騙着的。歷史上正多着這種例子。無論誰要譴責羣衆忘恩負義，應該譴責他自己，因為做錯了的正是他自己。

施維澤爾既失敗了，忽然向他的聯合會的朋友提出，叫他們加入我們的黨；那就是他向人推荐這許多年來他所攻擊的團體。他還要求我們爲這事在“人民國家”上發表一篇宣言。我們疑心這又是他的狡計，便拒絕了。我想他這一行動的動機在於增加他的後任會長的困難。因爲正在他請求我們刊載他的宣言時，演出了一個關於他的笑劇，劇名是“我們的大國民”，把“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的主角們刻薄地挖苦、嘲諷了一番。甚至資產階級的報紙也斥責他太過分了。

施維澤爾在一八七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因肺結核死了。埋葬在法蘭克福他家的墓地上。生前恭維他、支持他的人沒有一個來送葬的。在社會民主黨人看來，他死以前就已不存在了。更沒有一篇哀啓來表示他尙未盡爲人忘。這就是德意志勞工運動中最出色的一個領袖的結局，這情形沒有別人可怨尤，只能怪他自己不好。

第十三章

在 議 會 中

一 北德意志立憲議會

當一接到選入帝國議會的正式通知，我便於一八六七年三月五日動身到柏林去，那時心中不免有些悸動。會議已在二月二十四日開幕。我這下就將進入一種幾乎是全新的政治活動；對於議會生活我是完全陌生的，也沒有人來引導我。我的同伴歐拉浦是一位律師，在這一方面也不見得比我強些。但是我必得毅然幹下去。當我走到下議院會場正要去開門時，門却突然地從裏面推開來，走出了那位弗萊特烈克·查爾斯王子，他也是議會議員——在社會階級上，這是最極端的兩個人的會面。我把文件交到了秘書處後，便拿了萊比錫一個朋友寫的介紹信去拜訪了幾個人。他們訴苦說他們的黨裏面的支持普魯士的分子——他們是屬於進步黨的——這些人中即使最優秀的也不能達到真正自由與民主的理想。

我被分入第一組——那就是下議院因事務上的需要而分成七組中的第一組的議員。因為這個緣故，大會下各委員會的人數都得用七來除得盡。

那時，我寫信給我的妻子說：“吳（我的同事）和我是議會中的極左派，我們的位置也這樣安排的。我們不能再往左移是因爲受牆壁的限制，我們當然不願把頭向牆撞去。”

這時期的下議院議員包括了北德意志政治家中的精華：馮·培涅格萊，前一年法蘭克福的代表會的主席；惠司巴敦的卡爾·勃朗恩博士，下議院中公認的滑稽家，同時又是著名的葡萄酒鑑賞家；那紅頭髮的培格我久已認識他了；以他的“獅鬃”自傲的麥克司·鄧格；馮·馥鏗培克，他繼辛姆孫之後擔任議長，是下議院中偏見最深的議長；還有那著名的小說家葛司太夫·弗拉泰格；羅多爾夫，馮·涅斯脫，他有一次曾被軍事部長馮·隆頗可懷疑地恭維過，說他能證明隨便什麼事或每一件事；還有那矮小的拉斯格，當他用着他短短的腿迅速地跑上講壇去時，看起來活像一隻鼯鼠；潑朗克博士，後來“德意志民法法典”的主要起草人；尤勤·烈希脫，仍舊像一八六三年我在法蘭克福議會初次見他時那樣的陰沉；辛姆孫博士，曾任法蘭克福議會的議長，現任帝國議會的第一屆議長，因他站在上面那種莊重的態度和搖鈴時的姿態，得了個“雷神”的綽號；馮·歇魏令，曾在一次普魯士自由內閣中出任過部長，“Schwerinstage”這一名詞就是因他得名的，那就是保留下某些日子，一般是在星期三，備個別議員提出議案的；還有以支持合作事業著名的叔爾茨·德里奇；脫威司登，因他與馮·曼杜泛爾決鬥而聞名的；馮·恩魯，一位自由思想的普魯士貴族大地主；華爾但克，進步派的真正領袖；溫特騷司脫和馬林克魯特脫，未來的中央黨的領袖；和樞密大臣華蓋納，保守派的真正領

袖，又是俾斯麥的親信。

帝國議會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卡爾·麥耶·馮·羅滋却爾特，法蘭克福的代表（法蘭克福在一八六六年後已併入進來了）。他是一個矮胖而肩膀很寬的人，烏黑的頭髮和鬍子修飾得很好；在他的大肚子前面掛着粗重的金錶鍊，衣飾永遠穿得很講究。我雖然以前從未看見過他的照片，可是剛一看見，就知道是他了。在代表之中還有兩位將軍——伏格爾·馮·馥爾根斯坦和馮·斯坦因曼滋，他們是因一八六六年對奧戰役的勝利而聞名被選的。

但是超乎這一切，我最感興趣的還是我以前從未見過的俾斯麥。他到帝國議會裏來差不多總是穿了黑色的禮服、黑色的背心，圍巾繫得很高，只有極窄的一綫白色硬領露出來。他的頭髮，那就是說脫落得剩下來的，是黑色的，鬍子也是黑色的。可是我始終未能找到在所有漫畫裏都畫出來的在禿頭上的有名的三根頭髮，像大平原上的三棵白楊似的。我急切地希望聽到他的演說，結果却很失望，雖然他身軀高大，却並不作獅吼或像斯坦多那樣演說；他的聲音反而是很高很尖的。他演說時用着長而包含子句的句子，有時顯得有些躊躇，可是所說的都能引人興趣並切合要點。

俾斯麥雖與自由黨人講了和，却仍怕他們在議會中的不穩定性，憲法便是按照這種想法而制定的。他向他們作了若干小的讓步，有兩點却始終堅持不變：那就是議員無薪金和軍事預算建立在統一基金上。他維護憲法所規定的普選而反對國家自由黨的攻擊。薛培爾，那位歷史學家，說普選就是民主的暴政。俾斯麥却相反，他說，他不知道還有別

的更好的選舉制度。這是德意志民族的傳家寶，亦即德意志一向奮鬥求統一的遺產；這是帝國在法蘭克福採用的憲法的要素；這是普魯士爲反對奧地利一八六三年的提案而提出的。在這個二十一邦的聯盟中，除此以外別無其他共同的基礎可得。他認爲三級選舉法是在一切可以想像的選舉制度中最不幸和最不合邏輯的選舉制度。

我在議會中做的第一件事竟是使下議院做一件不合法的事，原來在我所屬的一組（委員會）的最初會期中要處理一件事，就是確認萊比錫代表的選舉。原來負責籌備選舉和管理登記簿的萊比錫市議會在辦事上犯了不盡按規則的錯誤，這情形可能使選舉無效的。我便發表演說，說出即使沒有這些犯規的事發生，這候選人仍會被選上的（那只不過是在選舉區分配選舉人的問題）。由於我六年來對該城的政治情況的經驗使我可以這樣說。我的看法實在是絕對不合法的，却被接受了，這選舉便被認爲有效。自然這種情形，只有在不穩定的平衡狀態之下，就如這新構成的下議院第一次議會期間，才可能發生。

當然，我非常熱望能在正式辯論時發表演說，從我的選舉區中也來了好多要求，要我這樣做。雖然由於討論已宣告終結，我已無法在憲法議案初讀的辯論中發表意見，可是到底在第十四條，就是關於北德意志聯邦與南德意志各邦的關係的一條上，我得有機會發表演說。我的演詞攻擊普魯士的政策，在屢次被打斷的情形之下，我指出德意志的統一，若按普魯士所計劃的那種統一，並不利於整個德意志，而只利於一個大普魯士和霍亨索倫王朝。普魯士並不願南

德意志各邦加入聯邦，因為怕普魯士政府在表決的票數上會被壓倒。這種政策，我再加一句，並不是德意志政策；其結果不是德意志的統一而是德意志的分裂。這將使德意志成爲一個大兵營，而把最後殘存的自由與人民權利都加以破壞的。

在以後的辯論中，我們因為支持南德意志而被指斥爲擁護教皇黨，即新中央黨的同盟，這種指斥一直持續到今天。

我第一次的演說在議會內外都引起了大的騷動。這就使我的選民大爲高興。那時“園亭”報正連續登載“帝國議會中的著名人物”；我竟有這樣的榮譽給他們特別提起，那作者提到我的演說詞說：“正像革命的海燕振翼的聲音使全議會都聽到了。”這種稱讚給主編看來覺得不够審慎或者有些過分；這期的報紙便被收了回來，把字句也改了。

我的第一次的演說還得到另一後果。幾星期後，我正在自己的工場中做工，來了兩個貴族樣子的先生。他們要找鐵工倍倍爾。當我回答了我就是倍倍爾時，他們顯得有些詫異地看着我，其中一個就說：“我說的是議會代表倍倍爾。”我又重說一遍，未免有些着惱，我就是倍倍爾；他把我從頭到腳仔細端詳了一番，告訴我他的名字是弗里蓀男爵。他是薩克森大臣的弟兄。他已讀過我的演說詞，很喜歡其中的幾段；我就謝謝他的稱讚。那時這些州權獨立主義者之恨惡俾斯麥竟到了不可抑制的程度；爲了擊敗他，他們跟惡魔聯盟都肯的。

到議會快要閉幕的時候，國王邀請帝國議會全體代表

到王宮中去赴宴。李卜克內西與我還有別的幾個人沒有去。第二天早晨，我碰到了我的好朋友紅頭髮的培格，就問他：“喂，培格，昨天威廉的宴會不錯罷？”

他兩手抓住我的肩膀——我想他還有些醉意哩——回答道：“好極了，我親愛的倍倍爾！那樣的美酒，你後面站着個人，只等你杯子一空，他便替你酌滿了！”

我笑着問他：“那麼我想他邀請你到王宮去你也要接受了吧！”

“對，我的朋友，我一定去！”

這培格與米開爾在少年時都是共產主義同盟的一員。這同盟中有幾個人後來都有了很著名的經歷；米開爾成了法蘭克福的行政長官，後來又任普魯士的財政大臣，最後被封為貴族。培格則任了科倫的行政長官和普魯士貴族院中的一員。還有別人也得到同樣的成功。

我們和激進派（進步派）一樣投票反對這憲法議案，可是它到底因二百三十票對五十三票的多數通過成為法律。我們採取這種態度是因為這個法案並未給人民代表以他們應得的權利。這法案中並不包括根本法或組織法，並無管制財政權，並無內閣責任制，議員亦無薪金。在另一方面却把軍事預算置於統一基金上，賦與聯邦的宰相權柄也太大了。一八七一年以後，這聯邦的宰相就成了帝國的首相。

議會閉幕時，爲了在各種集會上演說，並向我的選民報告會議期間的工作及我所參加的那一份工作，我在自己的選舉區內周遊了一次。到會的人數很多，我很感興趣的就是從一開頭起，在我的聽衆之間，婦女佔了頗可觀的成分。

這些婦女後來成爲最熱心的鼓動者。那時我們並無報紙可供應用，因此這類集會實在是完全必要的。以後每次議會會期結束後，我都這樣做，這樣便漸漸鞏固了我的選民與我之間互相信任的關係，使我立在不敗之地，我的政敵終也不能奪去我的議席。直到十年以後，爲了策略關係，我不得不改換我的選舉區時，我感到非常惋惜。

二 北德意志帝國議會與關稅議會

第一屆北德意志帝國議會的第一次會程是在一八六七年九月十日開幕的。新代表中有馮·霍佛培克男爵與馮·葛區曼男爵。他們兩人過去都有民主的事蹟，都屬於激進派。馮·葛區曼曾任普魯士的法官，有着很高的地位，却因一次“不道德”的演講而去職了，原來他在那次演講中主張節制生育以求文明的更高發展。馮·毛奇元帥也是一個代表；還有那有名的斯脫魯斯堡，那個聲名狼籍的股份公司的發起人，他總是想法把那些最大的貴族的姓名寫在他的計劃書上。他是一個典型的暴發戶。他的黨派以豪華震動一時，報紙上以整欄的地位描寫他們，這種事在柏林是聞所未聞的。斯脫魯斯堡的出台宣告了資本主義全盛時期貴族與財閥的邪惡的結合。

我的第一篇演說是關於名稱的。我反對說帝國議會無權自稱爲德意志民族的代表。因爲德意志人在奧地利的有一千萬，在南德意志的有八百萬，還不要說在盧森堡的那些，是被犧牲了。俾斯麥就打斷了我的話問我是否願意爲

了盧森堡的緣故跟法國作戰。我的回答當然是否定的，不過，盧森堡已犧牲給拿破崙了；若那時留下了，那它對德意志的政治上的價值非常大，因為盧森堡大公也就是荷蘭國王，後者將因此而肯堅定地與德意志在一起，這情形在一切國際錯綜的關係上是很有利的。

我的第二次演說是有關普遍兵役法的。按當時延長服役期限為三年，而要召集所有的健壯男子都來受訓，這筆費用實在太大了，要實施是不可能的。我提議還是依舊採用尚霍斯脫和奈塞腦所創的辦法，服役期限改為九個月。我們的提議自然被拒絕了，不過我收到了不少從德意志各處來的祝賀的信。我們在萊比錫的朋友送給我們一塊九磅重的火腿來表示他們稱讚我們的意思，這在我們當時這些沒有薪金的議會議員真是很可歡迎的。

一八六八年的春天議會暫時延會，因為要抽出時間來開關稅議會，它的會期是在四月二十七日。這還是第一次在柏林開會。那些負責編排座位的人多少有些卑鄙並帶惡意地故意把羅滋却爾特的座位和李卜克內西的座位排在一起。全場都為之哄然大笑；但是羅滋却爾特不久便離開了這個危險的鄰居而設法另排了一個座位。

大多數的南德意志的代表都覺得很難安於這種新秩序。這關稅議會是一八六六年自相殘殺的戰爭的後果，南德意志創痍未復，那種被屈抑壓服的情感尚未全泯。加之，這關稅議會實在是一個非驢非馬的權宜之計。那些自由主義者，資本主義發展下的代表人，要把它造成為一個真正的德意志議會；這辦法遭到兩重反對，俾斯麥以法國要妬忌和

南方的情感狀態爲理由而反對，南德意志的別的黨派也反對，他們在這北德意志聯邦及其憲法與關稅稅則上面看不見自己的理想。北方與南方敵對的情形仍如此鮮明，南方的人民對於維也納與巴黎遠較對柏林爲熟悉，因爲後者是他們很少去的。在辯論的時候，這敵對的情形常常引起激烈的紛爭。在這裏，跟別處也一樣，看得出南德意志在堅韌性和決斷性上遠不能和北德意志相比。李卜克內西與我盡我們的力量爲南德意志的代表撐腰，他們的政策與我們的政策遠比與北德意志的爲接近。大多數的南德意志的代表經過這四星期無報酬的開會，都樂於對柏林方面冷淡一下了（在南德意志大多數的邦中，議會代表都有薪金的）。開會時，到會的人數大致總是很少。

一八六九年北德意志帝國議會的第二次會程主要是討論管理商業與工業的新法典。我說了幾次話，攻擊樞密大臣華蓋納是普魯士朝廷的御用社會主義者，並針對馮·司多姆男爵[⊖]的攻擊，而爲我們的宣傳及組織辯護，主張資本主義的組織既是國際性的，那勞工組織也一樣必須是國際性的。

說到這裏，我得說一說我們因爲參加了帝國議會與關稅議會的辯論所受到的犧牲。我們的選民——我們實在應該說到他們——真是盡了一切努力在經濟方面幫助我們，而我們又知道他們是選民中最窮苦的，接受他們的幫助實在痛苦得很。我們的黨無可資助我們；在一八七八年以前，

⊖ 以其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猛烈攻擊而著名的大鐵商。

我們的黨無這能力，就是到了這時以後，也只能資助極少量的款項。到柏林去和回來的路費，還得由我們自己掏腰包。我們因此缺席了好多次，甚至在我們到場與否於黨有重要關係的時候都不能免。別的黨也有這種相同的情形。通過了的議案中有大多數是在兩院不足法定人數時通過的。這種情形一直繼續到議員終於有了薪金的一九〇六年。

就在這次會期內通過了選舉法。拉薩爾派的人提出了一條修改，把年齡限制自二十五歲改爲二十一歲，並規定星期日爲選舉日。我提議選舉應規定全聯邦一致在同一天舉行，這天應該是星期日或其他放假日，並且不應把乞丐除外。當然，我們的修改是不會被接受的。然而，由於國家自由黨人的動議，通過了所有選舉人當選舉時正在服兵役的，都無選舉權。

在辯論預算案時，馮·霍佛倍克男爵主張廢除軍備。我反對，說處於今日歐洲情形之下而想廢除軍備真是傻瓜，現在國內外正都激盪着愷撒主義，一個愷撒正待機而動、只要有機會就會撲上去把另一個愷撒吞滅的。這情形正像寓言裏的兩隻獅子互相吞噬直到雙方都只剩下尾巴。等那個階段到來時，我們的機會便輪到了。

在一八七〇年的帝國議會中，我演說反對死刑。在薩克森尼和巴登，死刑已經廢除了；可是俾斯麥堅持不改，結果就由二十七票（一百三十七票對一百一十票）的多數把死刑仍留在新刑法法典裏面。

一八七〇年的關稅議會只開了三星期的會。一個巴伐利亞的代表——一個進步派——退出了，他表明他的動機

說，這會議乃是一個騙局，只爲了增加普魯士的權力而存在的。可注意的是這資產階級的黨——民主黨——的鬥爭方式變得那麼馴良和怯懦，竟完全忘了這事實，就是一個黨派只有在鬥爭中才能生存和發展。那些比較聰明的人看到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而開始明白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是沒有前途的。那一直在滋長的階級對立，使雙方的分別愈來愈清楚了。

一八七〇年的關稅議會的春季會期是它的最後的一次；幾個月後開始了一個大悲劇，這個悲劇使德意志的政治情形整個改觀，並使關稅議會成爲多餘的了。

在李卜克內西與我之間，存在着關於我們的黨在帝國議會所應採取的策略的一些歧見；李卜克內西認爲北德意志聯邦是我們該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來打擊的東西，直到把它徹底摧毀爲止。參加其議會而不採取反對或完全否定的態度，在他眼中便是背叛了革命理想。因此便不用想去妥協與和解；更不要設法試使立法有利於我們！

我並不同意這種革命理想的觀念。我主張必要時才採取反對及否定的態度，尤其是要反對一切從我們的觀點看來是有害的事；不過我也主張積極的行動，例如提出含有宣傳性質的修正案。那麼我們的演說詞勢必傳及千百萬的讀者，無論這種報導會給報紙刪改到何等程度，用以傳播並解釋我們的原則。

在議會集會期間，這種策略上的歧見終於顯示出來了，末了，李卜克內西覺得他得說明他的立場。在柏林民主勞工會社之前，他以一篇演說說明了，後來還印了小冊子。他

聲明他的信念，社會主義不是一種理論學說的事而是講力量的事，這問題不能在議會中解決而得公開地在戰場上解決，就如一切關於力量的問題的解決方式一樣。在帝國議會中演說是沒有用處的；而作無用的演說是傻瓜做的事。他說：“在此刻存在的國家中是沒有和平的。”

這種完全否定的態度從來不是整個黨的態度。後來，當直接反對社會主義法律實施，而無政府主義在德國的幾處地方得了勢的時候，無政府主義者自然就利用李卜克內西的小冊子來攻擊我們，稱我們為“議會黨”。這是不能忍受的；李卜克內西忠誠地同意把這小冊子重出新版，在導言中說明他的接語只限用於德意志帝國建立（一八七一年）前的政治情況。後來，於一八八七年在聖·高爾舉行的大會上，他公開坦白地聲稱他已改取我的觀點，他認為一個黨派實際參加議會生活是必要的，並且對於這個黨派有極大的好處。

第十四章

普法戰爭

一 宣戰之前

從戰爭爆發起一直繼續到末了，李卜克內西與我對於戰爭所取的態度，不論在帝國議會之內及帝國議會之外，久已是人家議論的題目，並且成爲激烈攻擊我們的藉口。有一個時期，甚至在我們的黨的內部也是如此，雖然並不久，因爲很快的便看得出我們是對的。我可以這樣說，我們對自己所取的態度始終沒有感到後悔過，同時，若是我們在戰爭爆發時就知道了後來從官方的或其他方面的出版物中知道的種種內幕，那我們在戰爭剛剛開始時就會對戰爭抱着更敵對的態度的。我們不但會拒不投票，我們甚至會投票反對第一次的撥付款項。

今日，已毫無懷疑地知道，一八七〇年的戰爭實在是俾斯麥所熱望的，他早已計劃妥當來引起這戰爭。雖然在一八六四年及一八六六年兩次戰爭中，他那佯作無辜的犧牲者和被攻擊的一方的姿態未見成功，但一八七〇年的這次戰爭却不可同日而語，他的那種姿態始終裝得非常出色。除了極少數的圈內親近人物知道俾斯麥曾經用盡一切努力

來製造戰爭外——連當時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也並不在那一小圈子內——俾斯麥把全世界都欺瞞過了，他使大家都相信，激起戰爭的是拿破崙，而可憐的愛好和平的俾斯麥是受壓迫的一方。那些半官方與官方的歷史家在人民大眾間培養了一種信念；照這樣說來德意志是自衛的一方，而法國則是進攻的一方。的確拿破崙是先宣戰的，但俾斯麥政策的可佩之處也就在他的手法玩弄得巧妙，逼得拿破崙宣戰，還像是由於他自己的主動並成了和平的破壞者似的。

甚至於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採取了一般的看法，並且更公開地表明這種看法，雖然按他們的地位，他們該知道得更清楚些。宣戰前的情形是這樣混亂而又出人意料，以致人民都忽略了這件事實：即宣戰的法國，竟是完全沒有準備的，而德意志却準備得妥妥貼貼，萬事俱備，動員她的全部力量時竟能一無疵誤。

我最早譴責俾斯麥的挑起戰爭，是刊載在一八七三年的“人民國家”的兩篇文章中，題目是“九月二日”[⊖]，我敘述了現在已為大眾周知的愛姆斯電報的事，這電報使戰爭成為無可避免的事了。

在這些事情上，李卜克內西與我的見解不盡相同。他的意見是拿破崙首先挑戰，可是俾斯麥却無此勇氣來接受挑戰。因此他在七月十六日寫道：“有勇氣的一方在更強的人的面前退了下去。霍亨索倫王朝的候補國王[⊗]由於波那

⊖ 九月二日是色當投降的周年，那時拿破崙與他的十二萬人左右的軍隊都被俘了。

⊗ 西班牙政府請一位霍亨索倫家族的王子來接受王位。拿破崙憤憤不平，要求普魯士國王以霍亨索倫家族的家長地位拒絕這個建議。

帕特的威脅態度，結果放棄了王位；和平可以保全了，而有力的北德意志聯邦，本來要使德意志在國外都受到尊敬的，這次又悄悄地偃旗息鼓，像上次盧森堡事件一樣[⊖]。”

我却有不同的意見，因為我已相信拿破崙已經跌入了俾斯麥專為他預備好的圈套。我被李卜克內西激怒了，兩人爭論着，但是不久我們便講和了，從七月二十日起，“人民國家”採取了我的觀點。

我們一點也不知道戰爭的迫切，我們已定於七月十七日召開黨的會議。這樣，我們必須表明對戰爭的態度，這便表明在下列的決議中：

“我們這次集會反對任何戰爭——除非為自由與文明的利益而從事的戰爭——認為戰爭是違反現代文明的罪行。我們這個集會反對為一王朝的利益而發起的戰爭；這種戰爭只為了滿足幾個掌權的人的野心，而危及千千萬萬人的生命及幸福。我們這次集會向法國民衆的態度歡呼，尤其是社會主義的工人們；我們對他們阻止戰爭的努力表示完全的同情，還希望德意志的民衆與德意志的工人也為了同一目的而高揚他們的呼聲。”

巴黎的工人們在我們之前，已公開宣告反對戰爭。和這相類似的決議案也在許多城市的工人公共集會上通過了，例如：巴門、柏林、紐倫堡、奧格斯堡、慕尼黑、哥尼斯堡、

⊖ 一八六七年德意志聯邦解散後，拿破崙反對普魯士駐兵盧森堡。普魯士不肯讓步。但在倫敦會議上同意承認盧森堡的中立，撤退駐軍，並撤除要塞防備。

佛爾特及克魯斐爾等地。

我們的黨在不倫瑞克的執行委員會却抱不同的意見。它在七月十六日召開了一個公共集會，在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既然法國及其人民代表之大多數輕率地破壞了歐洲的和平，而德意志又是被侵害、被攻擊的一方，本會認為自衛的戰爭是一種無可避免的壞事情，只得籲求全民盡其全力引使德意志人民充分運用其主權來決定這一和戰問題。類似這樣的決議案，還在別的城市中通過了，尤其在北方。這樣，便顯見在黨的內部存在着的確不同的意見。

帝國議會將在七月十九日開會，李卜克內西認為我們的責任是反對任何戰爭公債。不過，我們又想到反對公債的一票就成了有利於拿破崙的一票。那我們唯一可取的辦法只有不投票。李卜克內西最後同意這樣作，為求證明我們這行為之正確起見，我們在帝國議會日誌中刊載了下列宣言：

“目前這戰爭是王朝的戰爭，其有利於波那帕特朝恰如一八六六年戰爭之有利於霍亨索倫朝。

我們不能投票贊成為進行這次戰爭所需用的款項，因為這將意味着對普魯士政府投信任票，而這個政府以其一八六六年的作為準備了這次戰爭。

但我們也不能投反對票，因為這樣做就等於讚許了波那帕特的狡猾和罪惡的政策。

我們既在原則上反對一切王朝的戰爭；並且以社會主義的共和主義者及國際勞工大會會員的地位，不論國籍，反對一切壓迫者並努力要團結一切被壓迫者

成爲互助友愛的聯合，我們決不能，不論直接或間接，宣告贊成目前這個戰爭。因此我們拒絕投票，並極誠希望歐洲的各國人民，經過這次生死存亡事件的教訓後，能用各種方法來獲得自己主動地決定一切的權利，和剷除現存的階級和武力的霸權；這些實在是一切國際間和社會上的罪惡的根源。”

這筆爲數約達一千八百萬鎊的公債，當然要付諸議會通過的。拉薩爾派投票贊成。可是德意志的資本家給全世界表演出來的却是很可惋惜的景象。雖然這公債的利率是百分之五，發行時的價值是票面價值的百分之八十八，却只銷掉了一千萬鎊左右；反過來在法國，二千八百萬鎊的戰時公債一下全給認購完了，關於德意志資本家的愛國心我們就說這些吧！

我們在帝國議會中的態度增加了黨委會與我們間的距離。李卜克內西拒絕依照黨委會的意見編輯“人民國家”，到後來他甚至發怒到表示要遷居國外了，因爲“這種驟發的民族主義的狂熱使他厭惡”得如此厲害。我也大大地反對黨委會的那種告諭，便寫信通知他們，若他們進行反對李卜克內西，我就不再給“人民國家”寫文章。對於他們因我們這種行爲而起的責難，說我們不過是按着薩克森地方獨立主義[⊖]的動機而行事，我們的答覆是我們這些薩克森人是很好的社會主義的共和主義者。

李卜克內西在九月一日寫信給一位通訊員說：“我所以

⊖ 這種地方獨立主義者是指堅主各邦主權完整的人，尤其重在反對普魯士的凌駕各邦。

放棄我的位置，倒不是爲了怕那些鑽營位置的人，而是因爲厭惡他們那種愛國的狂熱。這種病症總得發作完的，目前我在這裏實無補於實際，而在別處却會很有用的——例如在美國。可是我仍希望這種情形很快就能過去，那我可以不必要到別處去了。”

情勢的進展迫使他留了下來，而且站在戰鬥的最前列。

二 不倫瑞克黨委會之被捕

六月三十日，黨委會在“人民國家”上刊佈了一篇宣言，他們與我們歧異之點在此顯得很明白了。他們說：“這是我們的任務，在這新國家誕生時，去担任一份有決定性意義的工作。我們希望這新國家將包有德意志的全部，這樣它就能成爲一個社會民主共和國而並非一個王朝國家。若是這新國家在誕生時仍帶有王朝的色彩，那我們的任務就是把我們的理想，在尖銳與艱苦的鬥爭中，刻印在這新國家上。大家希望我們的武力勝過法國，可又希望勝利者不致於自以爲了不起。兩國間兄弟相殘的戰爭是可憾的，可是這並不是德意志的過錯。禍首自會受到應得的懲罰，這一點做到後，便是聯合各種力量爲全世界被壓迫的人們作光榮的共同鬥爭的問題。拿破崙被打敗以後，法國人民將重能自由地呼吸，而我們德意志人便要呼籲我們的統治者給予人民以應得的酬報，人民在戰爭中所作的巨大的犧牲與所忍受的苦痛，使他們有權利這樣要求。”

這黨委會的委員們在他們樂觀之下，決未想到他們自

己會成爲這“光榮的勝利”之下的第一批犧牲者。迅速的打擊，將法國軍隊徹底擊敗。被德意志整軍整軍地俘擄了過來，這些人的食宿成了可厭的負擔。接着來了色當之役，拿破崙在這種情形之下竟應戰了，顯得他是故意這樣做的；與其回法國去做一個失敗者，他寧可做德意志的俘虜。他投降的消息傳到德意志時，人人都歡慶着，大家都以爲這就意味着戰爭的結束。人們由於忍受了龐大的損失，都已厭棄這個戰爭了。甚至普魯士國王寫信給他妻子說：“至於各項損失，我真是怕問下去。”

可是戰爭還是繼續了下去。巴黎方面對拿破崙被俘的反應是宣佈共和，這一下政變是德軍司令部裏的人所厭聞的。這是明確可知的，所以進行這次戰爭決不是爲了要使法國變成一個共和國！這種情形，還怕成爲一個惡例——其實這是毫無根據的。當宣佈共和的消息傳到德意志時，李卜克內西異常激動地含着眼淚衝進了我的工場來宣佈這個消息。他因我聽到這消息的冷漠態度而大爲驚詫。但是在黨委會方面，這消息似一個晴天霹靂地引起了情緒方面的急遽改變。一切歧見立刻消失了。我們已完全取得一致；要求立刻講和，要求戰費賠款，却不要領土的兼併。可是過去所稱的自衛的戰爭已變成征伐的戰爭了。

在八月七日，“國際”的總會發表了一篇宣言，登載在“人民國家”上，宣稱這次戰爭在拿破崙一邊是王朝的戰爭，而在德意志一邊是自衛性的戰爭。這篇宣言再接下去說：“可是，若德意志的工人們竟讓這次戰爭失去它自衛的本質而墮落成爲反對法國人民的戰爭；那不論勝敗，結果將一樣

悲慘。只有單獨一個普魯士可獲得利益。”

黨委會按照這篇宣言行事，便發佈了一篇公告“致全德意志工人書”。內容是要工人幫助法國共和政府謀取光榮的和平而努力。還引用了一封馬克思——雖然並未提出他的名字——信中的話；那一段是講到一八七〇年的戰爭勢必繼以另一次德、俄間的戰爭，勞工運動的重心則將自法國轉移到德意志。德意志的工人們應當自覺他們重大的責任，以公共集會的手段鼓動反對合併亞爾薩斯—洛林，促進迅速與法蘭西共和國覓取光榮的和平。這公告的結語是：“當我們看見一大民族重又自己親手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同時共和政體不僅存在於瑞士與海外，而已實際存在於法蘭西與西班牙的時候，讓我們來齊聲高呼：若不是今天，也許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甚至在德意志也將歡迎自由的黎明：歡聲如雷地高呼——共和萬歲！”

這篇公告是在九月十一日發佈的。到十四日我們不得不宣佈那個負責指揮北德意志的伏格爾·馮·馥爾根斯坦因將軍，受命防止法軍在德海岸登陸的，遽已下令——不顧法律與正義，就像以後所表現的——拘捕了黨委會，在軍隊押送下運往東普魯士的一處要塞魯鎮，就把他們囚禁在那裏。他們非常粗暴地對待這些囚犯；到哥尼斯堡那段路竟化了三十六小時，一路上，人民把他們視為賣國賊，並且按照這種看法對待他們。

在我們的宣言中列名的另一位我黨的黨員也被捕了。其他遭到同樣命運的還有兩個自由民主黨人，約翰·約可培與海皮格。這兩人的被捕對自由黨的報紙造成了非常壞

的印象。一張激進派的報紙當時說道：“這種逮捕的事跟我們這樣巨大的勝利不相稱，這不禁使我們要懷疑是否德意志人民爲了對外方面獲得的光榮，不免要在內部失盡了自由。”

我們當然對此並不感到驚奇。我們毫無黨委會的那種幻想，他們竟期望就從俾斯麥那個人身上，得到一種新秩序的自由主義的發展，姑且不說俾斯麥怎樣對付民主主義的發展，他向來就是每一個自由主義者的最大敵人，而他現在作爲勝利者，已把他的帶刺的馬靴踩在這新帝國的頸子上了。

我們的其他黨員也有爲了分發宣言而被捕的。薩克森的政府預料着戰爭的最後結果，先已禁止一切公共集會。可是我們的黨在薩克森兩個城市的市議會選舉中仍獲得了成功——這件事給了我們一些安慰。

官方的“北德意志通報”很惋惜李卜克內西與我沒有跟黨委會一起捕了去。這事他們却不必久等了。

當時就成立了一個臨時委員會，總部設在德累斯登。鑒於黨委會被捕時許多信件都被劫去了，我就寫信警告我們的秘書，任何通訊都不要保存起來——但這警告很快地就被忽略了。以後，他的寓所被搜查時，連我的警告信也落到警察手裏去了，後來在我被控叛國罪的證件紀錄之中，這封信就在裏面。

到十月底的時候，李卜克內西與我碰到了一件奇遇。十月三十一日，在薩克森尼是一個節日——所謂宗教改革紀念日——就是馬丁·路德把他的九十五條貼在惠丁堡教

堂門上那天的紀念日。在這節期的前兩天，我接到一封掛號信，堅邀李卜克內西與我於三十一日到薩克森的一個小鎮密脫惠達去商量重要的事。我們接受了這個請求。在車站上，我們受到非常神秘的接待；然後被帶領着而繞道到了一個旅館。進去一看，我們大為驚奇，這一區域的一切機要的黨代表都已聚集在那裏了。我們便被問及這類問題：爲什麼我們還不行動？爲什麼軍隊已調走，而留下來的軍隊已很少，很容易勝過的時候，而不發動暴動？我們對於這樣簡單的想法，是不贊成的。我便向這集會演說，指出這要求的荒謬；李卜克內西當然也跟我一樣作。當時對在場的人說明我們觀點的正確也不是難事。他們到密脫惠達來，也是由兩位同志邀請來的，一點也沒有想到這會有什麼企圖。

三 德意志帝國併吞亞爾薩斯—洛林

色當投降以後，戰爭仍如火如荼地進行着。國王的軍隊已被擊破並被俘了，可是國防政府在甘必大和弗萊西奈領導下組成了新軍。對帝國的戰爭只有六星期，而對共和國的戰爭竟進行了六個月。我們的被囚禁的同志大多數被釋放了。我們的黨委會又被押回不倫瑞克來受叛國罪的審訊。

十一月二十四日北德意志帝國議會召集非常會議。會期很短，可是很激動人。議會要討論的議案有爲繼續維持戰爭所需的戰費公債，關於與南德意志各邦在凡爾賽締結的各個條約以及帝國的新憲法。

透露出來的有關這些條約的消息頗招致自由黨人的不滿。南德意志各邦——尤其是巴伐利亞——堅持保留若干條件，這使帝國的統一變得十分複雜。北德意志聯邦的憲法，經過若干修改，作為帝國的憲法。它裏面幾乎毫無自由主義和自由在內。甚至對於議會代表仍不給薪金。另外，更使人民感到沮喪的事實，就是這個已化了這樣巨大的犧牲的戰爭，仍見不到結束。

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天會議程序是值一千五百萬鎊的又一筆戰爭公債的議案。我表示反對；這次的演詞並不長，可是引起的風波之大在我所有的演詞中真是空前絕後的。我提出，拿破崙既已成為俘虜，戰爭的根由已不復存在。在大大的騷動和反對聲中，我為證明我的主張，引用了議會開幕時的勅詞和普魯士國王的宣言，他們論及這戰爭會說明它不是用來反對法國人民，只是用來反對拿破崙及其軍隊的。

迅即締結和約的阻礙在於兼併政策。當我說到德意志的資產階級對於戰爭公債所表演的那種可鄙的樣子時，更引起了軒然大波，議院中的大多數人都陷入狂亂狀態；我們遭受了最惡毒的痛詈和辱罵。當時有十幾個人握緊了拳頭，衝到我們面前，恐嚇着要驅逐我們出去。有好幾分鐘，我不能說完話。最後，我提出一個決議案，它體現出我反對戰爭公債的演說詞中的要點，還特別建議迅即締結和約和拒絕一切併吞法國土地的擬議。李卜克內西也演說，特別注重這件事實；就是土地的併吞所引致的必不是和平而是戰爭，並且將無窮地延長戰爭的危機。我們的議案，自然是遭到否決的，只有五票是贊成我們的。

幾天以後，在普魯士議會中自由黨人爲了自由黨人約可培被囚禁的事提出質問。在凡爾賽，約可培已直接向俾斯麥訴苦。俾斯麥間接承認約可培有理，可是他並不採取行動。按我們從他的常務秘書慕理·蒲希的紀錄中所知道的，他害怕總司令部內的軍人派，他爲了作戰部門的人把他的政治計劃打破了大爲生氣。

十二月三日那次議會會期內，我陳訴了黨委會所受到的虐待。米開爾恰巧相反，他來證明這些逮捕實在是罪有應得；按他的意見，我們的態度鼓勵了法國人的繼續抵抗——我立刻就證明了他的這種主張的毫無道理。

以後的某一次會期內討論到與南德意志各邦分別訂立的那些條約。我演說反對這種條約，同樣地還反對整個新憲法，因爲這與德意志人民對自由與統一的所有期望不一致。過去十年之內的三次戰爭，從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立場看來，是使德意志退步的。但是人民將會維護自己的獨立，而會得到唯一值得擁有的憲法——即共和政體。

接在我後面的，就是樞密大臣華蓋納的演說，大出李卜克內西與我意料之外，他竟從一張他剛接到的報紙上引讀一封信中的一段，那是法國駐維也納的領事寫給我們的；他以法蘭西共和國的名義，爲我們在帝國議會中所持的態度向我們道謝。在議場中四處高罵“羞恥！”聲中，我只能聲明我們從未收到過這樣一封信，而更不可解的是怎麼這封信會刊登在“北德意志通報”上。我說出我的意見，認爲這封信是一個卑劣的圖謀；可能是新聞局爲了陷害我們捏造出來的。在第二次集會時，華蓋納堅持這封信是真的。我仍按

着上次的聲明說我從未收到過這樣一封信。不過，到末了，我真的收到了；這信是寫給李卜克內西與我的，日期是十二月二日；那麼這封信經過了六天才到我手中。這信的內容如下：

“先生們：我認爲這是我的責任——作爲法蘭西共和國政府派往德意志民主黨的特別代表，爲了你們在柏林議會中，一個正狂迷在戰勝情緒和沉醉於軍國主義的空氣的會場中所發的高貴的言辭，以法蘭西共和國的名義向你們道謝。你們在這種場合中所表現的勇氣已引起全歐洲的注意，並爲你們在自由戰士的行列中贏得了一個光榮地位。德意志的自由精神與人道主義精神正暫時忍受着，恰如你們先生們雄辯地指出的，一種浮雲蔽日的晦蝕，就像我們在第一帝國時所遭遇的一樣，而且將會同樣地得到覺醒。野蠻的專斷的狂熱正襲上最開明的頭腦。那些不久以前曾向全世界放出光明的大思想家，受了俾斯麥的影響，目前竟成了主張謀殺、毀滅整個民族的思想的宣傳者。你們，先生們，與你們的黨，在大家都已捨棄了的時候，仍保持着德意志的偉大傳統。在我們的眼中看來，你們是德意志民族的偉大的代表，這個民族是我們以真誠的手足之情擁抱着並從未停止過對它的友愛的。法蘭西向你們敬禮，先生們，並爲了在你們裏面看到德意志的將來及兩大民族的和好的希望而感謝你們。”

這信可能原是出自善意，不過，在當時，却是非常不得時宜的。我們不知道誰把這封信送到報紙上去發表的。

我疑心建議那領事寫這信的人是懷着惡意存心傷害我們的。

十二月十日，帝國議會指定一個代表團，去向當時在凡爾賽的國王呈遞他加皇帝尊號的賀辭。進步黨，他們中間的大多數曾和我們一同投票反對憲法的，拒絕參加這篇賀辭。這代表團的人選由抽籤來決定。我們不表示意見，不過碰碰機會看。若是我們抽到了，我們當然會拒絕不去的。可是我們逃過了。當羅滋却爾特的名字讀了出來，溫特騷司脫（後來的中央黨的領袖）很莊嚴地走到他的面前去，跟他使勁地握手並向他道賀時，全議會都哄堂大笑了。

議程結束後，我們回到萊比錫，在十二月十五日社會民主勞工黨的公共集會上，我們報告了議會辯論的經過。聽衆多極了，真是一個真正的人民的集會。在聽衆中間有許多穿着便服的法國軍官，他們是派住在萊比錫的法軍俘虜。大會通過決議熱切地稱許我們在帝國議會中的態度。這是我們要隔許久許久以後才能再有的最後一次的公共集會。到十七日，我們久已預料到的打擊來到了。

四 被 捕

九月七日，我們就已在“人民國家”上聲稱：據最可靠方面的消息，薩克森政府依照德意志總司令部內人士，尤其是俾斯麥的倡議，預備採取有力的手段來反對我們的黨。接着全部新聞界，尤其是自由主義派的報紙更兇，開始有系統地攻擊我們。他們甚至橫霸到罵我們爲叛逆，給我們擬定的

罪名是爲法國的利益而賣國。爲使我們所受的嫌疑更深，他們甚至把搜捕黨委會時搶去的我們給黨委會的信經過竄改地刊印出一部分來。當然，只因保存這些信件的人的重大疏忽或僞證，才使這些信件被刊印出來。

十二月十七日那天，我正在自己的店舖裏作工，我的妻子突然衝了進來，臉如死灰地告訴我，一個警官要跟我說話。我立刻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那警官告訴我，他奉命逮捕我，並搜取我的一切信件。後一任務他很容易地便做好了，因爲大部分信件都已被我毀掉了。我很快地穿好衣服，與我的妻子和小孩告別，安慰他們我很快就會回來。一輛馬車先送我們到警察局，再到監獄裏。我被禁入一間小屋，我不想隱瞞這件事實，就是那囚室的門剛門上落鎖，我就狂怒地在室中奔來奔去，咒罵我的敵人。第二天早晨——那是星期日——檢察官與典獄長來問我是否有什麼請求。我便問他要書籍和要求晚上用燈火到十點鐘。典獄長答應了，不過燈火只可用到八點鐘。檢察官知照我，我作爲一個政治鼓動者的全部事業，都要經過調查，因爲這種行爲被認爲是危害國家並且有叛國性的。調查需要經過一段很長的時期，因爲要從國外去搜集證據。次日，我第一次去見調查這事的法官。我心裏頗爲忐忑不安。法官阿南脫對我的態度很嚴肅，並且非常沉默謹慎。他告訴我，我們（我已知李卜克內西與我們的副編輯海潑納也已被捕了）將以叛國未遂罪起訴。當他告訴我，目前他尚不能繼續對我進行審問，因爲構成起訴材料的主要文件尚在不倫瑞克時，我不免大爲驚詫，更大爲失望。不過，他希望在年底以前可以

收到這些文件。那麼，嚴格說來，我們是被非法逮捕的，因為檢察官與法官都還不知道起訴的材料。顯然是總司令部中的人物急切要除掉我們，使我們愈早不能起作用愈好。

回到囚室時，我非常憤怒。現在我有空閒的時間來詳看我的住所了。房間倒還顯得寬敞，因為差不多是空的。在一角上是一隻有蓋的大木桶，那用處我不必詳述了。一邊牆上有一塊小木板，上面放着一把水壺、一本讚美詩和一本“新約”。囚室的另一端，靠牆釘了一隻木長凳，約有三呎長，它面前有一張非常小的桌子（這已是一種優待），小到一本打開的“園亭”畫報[⊖]便可把這桌面全遮滿了。室內並沒有牀；只有一條墊褥。夜間打開攤在地上，白天收起。窗子非常高，當然是鐵格子作的。我得站在桌子上才能觸及到它；窗下面日日夜夜都有一種奇怪的聲音傳進來。我後來看到下面的院子裏正有着六架大的烘咖啡機器在作工，烘來供給在法國作戰的兵士用的。

我的囚室是異乎尋常的冷，那年的冬天又是很嚴寒的。那老式的爐子並不熱；早上五時就生起了，只有幾把煤。我得有些新鮮空氣；可是稍開一下窗子，室內僅有的一點兒暖氣便都跑光了。為保持暖熱起見，我只能坐在桌上，把腳放在木凳上，用他們給我的毛毯裹着兩腿；即使如此，到底我還得了膀胱炎。李卜克內西的年紀比我們大，關的囚室較為好些。那是我從妻子那裏知道的。她被允許每週當着法

⊖ 一種家庭閱讀的通俗雜誌，約與“笨拙”畫報一樣大小。

官的面來探望我一次；她也可與我通訊，當然也得經過法官的監督。

不久我便發現囚室內滿是蝨子，這使我非常地憎厭，全靠我十二分的努力，才把它們除乾淨了。差不多我剛做完這件工作，由於醫生的命令，我又得移入監獄西端一間較暖的囚室裏去，據獄卒很和氣地告訴我，這房間以前是由一個被控殺嬰的女犯住的。這遷居的結果使我又得把清除工作從頭作起。

像我們這種情形的不經審判或審判未決的囚禁，是各種囚禁中最可恨的一種。被禁在嚴格的單人囚室之內，不知到底要關多久，也不知究竟算犯了什麼罪，實在是格外地煩人，並使人精神衰弱的。最後，在一月初的時候，我又被帶到法官的面前。我一走進屋子，就看到窗台上一大捆藍色的紙——我給黨委會的信函，是那個秘書不顧我的警告，十二分小心地保存下來的。當時若他在我旁邊並在我手中，我真不知自己會怎樣地來對付他。不久我便知道毋庸發怒，因為法官告訴我，他收到這些信還沒有幾天。不過他將盡快地查閱這些信。他是說話算話的，在以後的新的詢問中，他的態度日趨和婉。當然他首先檢查我們的信函，而這些信函大都是很秘密的；我們寫的不僅限於黨的事務，還寫及我們私人的困難，不論巨細；這樣一來，這些信恰可證明我們過的並不是舒服的日子。我想這法官一定很驚異，當他發覺我們並不是賣國賊或謀殺國王的人，而是基於最好的動機而行事的普通的人，同時我們的血管中流的血是溫暖的血。到二月底的時候，法官已查過這一大堆文件

——大約二千封信——結束了初步審查。這位法官——後來我們從我們的辯護律師鄂圖·弗拉泰格那裏知道他是一個非常聰明而又有良心的人——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就是我們既無叛國的企圖，更無準備叛國的行爲，因此他提出釋放我們的主張，這一點，檢察官反對。

我却仍相信我們要被判罪的，這並不是因爲我們有罪，而是因爲報紙上對我們的不斷攻擊使我對於陪審官不能相信得過。再加政府對這事威信有關，一定要用盡方法入人於罪的。我準備着接受在某處要塞的二年監禁。我猜對了。

在三月三日那天，帝國議會又要有新的選舉了。我是我以前的選舉區的候選人——薩克森尼的格拉格—彌倫區。我們的黨與拉薩爾派的人推舉我爲萊比錫的聯合候選人，雖然我曾勸他們不要這樣做。

我們的經濟力量實在太小了，沒有一處選舉區能化二十五鎊到三十鎊以上的錢。今天我們的黨的擁護者一定很難想像我們那時不得不用多麼少的錢來辦事。

這次選舉於我們不利，因爲這次選舉是由慶祝“凡爾賽和約”草約的敲鐘、鳴砲伴隨着進行的。除我以外，我們黨的人只有一個被選上了，其餘四個都落選了。在薩克森尼，我們共得了三萬九千票；勞工聯合大會一共得了約六萬三千票。

我一得到被選上的消息，馬上從監獄中寫一封信給我的選民，熱烈地爲他們對我的再一度信任表示謝意。

我已屢次體驗到自己成爲詩章、讚詞的題目的樂趣。

這次選舉時，下面這一首就流傳在我的選舉區裏：

拿破崙與倍倍爾

他們一人坐在威廉海姆休，

一人坐在監牢裏的牀鋪上；

一個痛風痛在大腳趾，

一個正苦頭痛哩。

在萊比錫，這種諷刺文字甚至在我們被囚的期間也流行着。在某處音樂院中上演着滑稽劇，名叫“耐倍爾與畢卜克內西”；另一齣名叫“倍倍爾：一名開明皮匠和他的小廝”。就用這種方法，那些“愛國者”想來發洩他們對我們的怒氣。

有一部分自由黨的報紙，爲了我的重又當選竟發怒到用盡他們的一切力量來阻止我於帝國議會會期自監獄暫釋外出。但是薩克森尼政府，爲免得辯論，在三月二十八日就釋放了我們。下午四點鐘的時候，獄卒突然走進我的囚室，帶來了釋放我們的消息。我走出囚室，就看見李卜克內西與海潑納在走廊裏。我們一個字都沒有說，便互相擁抱了。我們被帶到了調查這事的法官的面前，他通知我們釋放的事；不過我們得答應，不得他的許可，不能離開萊比錫區他去。

兩天以後，不倫瑞克黨委會的各委員也被釋放了。高等法院已拒絕以叛國罪控訴他們。黨委會的各委員在監獄裏共度過二百天；我們則是一百零一天。黨委會的各委員後來因各種不同情形以違反集會法的名義被判處了十四個月至十六個月的徒刑，但經上訴後減爲二個月至三個月。

附註：帝國議會議員若未經判決，可從監獄暫行釋放，就如倍倍爾的情形。普通情形由帝國議會通過提議，把審判延遲到議會會期以後進行。若帝國議會不通過這提議（就像後來些年倍倍爾的情形），那麼被囚禁的人通常是不能暫釋的。

第十五章

議會的活動·叛國罪的審判

一 德意志帝國議會第一次會議

四月二日，我到柏林去出席帝國議會。這議會在所有的德意志諸侯與自由市[⊖]的代表出席之下已由皇帝很莊嚴地宣佈開幕。

首先，我到以前的女房東那裏去，問她能否再讓我寄住。她異常抱憾地不得不回絕了我，因為前一月十二月間我們離開柏林以後，警察會到她家去，責備她留宿了我們。在整個議會期中，我們處處受着秘密警察的監視，就如罪犯一般。

在帝國議會會場內，因為左方已沒有空位，我只能在極右方找我的座位。位置在右方的那些可尊敬的議員們當然不會歡迎我；不過我得承認，他們仍保持紳士的態度，並無使我難堪之處。

帝國憲法提付通過初讀時的辯論，全被文化鬥爭[⊖]的

⊖ 三個舊日的漢薩城市——漢堡、不來梅及盧卑克——有着共和政體性質的憲法的。

⊖ 以俾斯麥爲首的，反對在德意志的羅馬天主教會的鬥爭稱作文化鬥爭。

演說詞佔盡了。羅馬梵蒂岡會議(一八七〇年)所宣稱的教皇永無謬誤的教條引起了反對。自由主義者們急切地想以滔滔不絕的關於文化鬥爭的誇大的話,來掩飾他們犧牲了公民自由權理想的羞恥。文化鬥爭這名詞是富却教授[⊖]發明的。天主教的黨派在溫特騷司脫[⊖]領導下成了中央黨。我發表演說,對於辯論之轉向宗教問題表示驚異。我更加上一句說,對於一個像我這樣早與一切宗教信條斷絕關係的人,要他來繼續出席,真要有不少自我犧牲精神才行。演詞結束時,我說出了一個希望——在滿堂騷動中——就是在十九世紀結束之前,社會民主黨的要求將會實現。後來時間似乎證明我所期望的不免太樂觀了些。

我又與米開爾交手了一次。可是在我指出他以前曾屬於他今日所攻擊的政黨,即共產黨這事實以後,整個議會都窘惑了,米開爾自己則沉默不出聲。從此以後,這位米開爾議員對我似不無敬意了。

激進派又提議要付議員薪金。我嘲笑我們的對手所以反對這提案,就是因為害怕社會民主黨。俾斯麥很坦白地把這提案看成玩笑。他說,若議員給薪這辦法實行了,那此刻在場的議員中有大多數將永遠不會再選出來!而這將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因為他素來對這次議會懷有特殊的深情。不過,他還得加一句,就是普魯士的上議院是不給薪金

⊖ 柏林著名的病理科學教授,終身是個激進分子,是俾斯麥政敵最不屈不撓的反對者。

⊖ 漢諾威前國王(一八六六年被廢)的一個大臣,俾斯麥的又一個死敵。

的，有減少會議次數的傾向，而有薪金的下議院則有相反的趨勢！

另一個提案，要求議會再撥款項來結束戰爭時，我再說明我們的立場。無論何種性質的法國政府，都決不會忘記吞併亞爾薩斯—洛林這事的。法國一定要尋覓盟友，並且會試圖與俄國接近。德意志便得維持一支更龐大的軍隊。演詞末了，我稱讚巴黎公社（它在三月十八日宣佈成立）的緩和態度。我並不是對公社所為的一切都表同情，不過，我們在德國處於類似的情況下，就未必以這樣的寬大對待大金融資本家。

我在帝國議會中是單槍匹馬的——我的同事不算在內——因此我必得時常在柏林。可是我的營業非得要我親自在萊比錫不可。那些為我在帝國議會中的行動而歡呼的人，該不會想到有些時候我覺得多麼苦惱！

五月二十五日，我又陷入酣戰之中。我發表演說反對威逼亞爾薩斯—洛林。演說結束時，我乘機為巴黎公社辯護。我說：全歐洲的無產階級正滿懷着熱望，注視着巴黎。在巴黎的戰鬥不過是前哨的小接觸，不到幾年，法國無產階級的戰鬥號召：“對皇宮作戰，把和平帶給平民，使貧困與寄生消滅！”就會成為全歐洲無產階級的口號的。那時候，無產階級贏得自治權利的時機該到了，這只有在共和政體的政府下才可能。俾斯麥親王後來在一八七八年的秋天，當他提出反社會主義的法律時，說就是我這一篇演說，開了他的眼界，使他看到了社會主義的危險性。若事實真是如此，那麼當時他毫沒有顯得這樣。他完全漠視我說的

話，就像不值回答一下似的；其他演說的人也一樣，不過各報紙却攻擊得我更激烈了。雖然“柏林交易報”刊出了一頁大概是斯坦頓漢姆寫的星期日小品（斯坦頓漢姆那時是諷刺性的周刊“黃蜂”的編輯），他向當時資產階級的驚惶開玩笑，想顯出到底我並不是一個怎樣太危險的放火人物。

這時候，我認識了約翰·慕斯脫。由於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並曾參加愛森拿赫大會，因此在奧地利以叛國罪被判了一時期的苦役；後來遇大赦，被逐出奧地利而來到萊比錫。他的父親勸他改正錯誤，他信中回答說，他寧可從他的黨得乾麵包，而不願從那些資產階級黨派每月得一千盾。這話十足表現他的性格，也是他的真心的意見，因為他本來是一個性格純正堅貞的人。後來，在反社會主義法律之下，他走入了歧路，成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主張直接行動；末了，雖然他素來不習飲酒，竟在美國以一個酒徒終局。這都是反社會主義法律造成的，這法律把他和許多其他的人都趕出國去。若他能繼續留在能夠指導他和管束他的熱烈性格的人的影響之下，黨一定能得到一個最富熱誠、肯自我犧牲而又不知怠倦的戰士。在後來那幾年中，他曾在他的報紙“自由”上激烈地攻擊我，他先在倫敦編輯這報，後來在紐約編輯；我却衷心地爲他感到難受，有這樣可貴秉賦的一個人竟如此悲慘地毀了。

我們的黨不久便自戰爭的影響下恢復過來。接着而來的工業繁榮是有利於我們的運動的。“德意志問題”是解決了，雖然並不如我們所盼望的那樣，不過在目前總算是解決了。這使勞工黨分裂的種種因子也已除去了。戰鬥情況也

簡單化而容易看清楚了。我們的黨(我們現在被人稱作愛森拿赫派),不久就在好些城市中有若干種報紙,宣傳我們的思想。

二 德累斯登大會·帝國議會第二次會議

黨的第二次大會在德累斯登舉行,日期是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二日、十三日和十四日;到會代表五十六人,代表了七十五個地區和黨員六千二百二十人。我是主席。議程很有意義,討論得很熱烈。慕斯脫代替未能出席的李卜克內西,報告社會民主黨應採取的政治觀點。這辯論引起了很激烈的場面。當時在場的警局檢查官,以他的長官的名義主張不准提起巴黎公社。我們拒絕了,而慕斯脫的報告反而更富於鬥爭性。我提議,既然現在的情況已經不值得我們討論,決議案可不經過討論就通過;另外還說“關於巴黎公社的官方文件刊印以後,顯見數月來反對巴黎公社的各種說法全是惡意誹謗的謊言”。這決議案很明白地贊成“人民國家”的態度——那就是我們對於上一年發生的各種事件的態度,當然也包括我們對戰爭的態度——尤其贊成德意志社會民主黨與“國際”在思想上的團結一致,這一點是我們的報紙所推進的。最後,我們決定不經討論,而以大家站起來表示我們對於巴黎公社的感謝。

漢堡成了黨委會的總部,柏林則為監察委員會的所在地。明年的大會定在梅因斯舉行。

在德累斯登大會後不久,第一次婦女大會在萊比錫和

開姆尼斯舉行了。在開姆尼斯成立了第一個“婦女聯盟”。

一八七一年的帝國議會期內，我發表演說反對預算案。我警告自由黨人說，現在帝國已經成立，希望有一個緊縮的預算案，那是幻想。單單階級對階級間正在增加的敵意，就足以阻止預算案有任何的緊縮。可是就是常備軍也不會在一切情況下都是支持現存秩序的。法國有一支頗為強大的常備軍，可是軍隊就未能防止公社。無產階級的增加比任何軍隊的增加更快；而且一支軍隊增加時，社會民主黨的分數也要增加，而且因為工業的無產階級佔的比例愈來愈大，增加得也就更快些。

在另一次辯論中，我與議長辛普生發生了激烈的衝突。議會方面接到一個自由黨人的動議，要求在聯邦的各邦中都成立選舉出來的議會，我不顧人家的訕笑說這是“紅”與“黑”[⊖]的聯盟，我仍在這件事上支持反對這一動議的保守派與中央黨。我發表演說反對這一動議，說它是幻想，又是圈套，並把帝國憲法說成是冒牌的立憲主義和赤裸裸的愷撒主義的東西。議長漸漸愈來愈暴跳了，他恐嚇着說，要請全體決定是否再讓我說下去。我抗議這種恐嚇，指出這是不合法的，違反帝國議會的規則的；但是，在我仍繼續說下去時，議長把這一問題付諸表決，竟得了多數。

第二天，我抗議議會破壞了它的規則。一個議員之被中止發言，只限於議長已兩次呼召注意規則以後；而這次議長從未一次正式通知注意規則。末了，議長同意把這事提

⊖ 中央黨因它的傾向教會而有着“黑”的一派的綽號。

付會議程序委員會。

這件事在議會之外引起了很大的騷動，許多報紙都站在我的一方面，主張言論自由的權利。會議程序委員會巧妙地避免直接的問題；只說他們認為議長不一定要用特定的語句：“我呼召你注意規則。”我拒不同意這項決定。經那個老外交家溫特騷司脫的提議，這決定再送回程序委員會。議長認為這辦法等於對他投不信任票，便辭職了，當然他又被選為議長。議會中無恥的、蹣跚的情景激怒了好幾個自由黨人。其中有個謝格勒，他在這議案剛通過時，就走到我的座位旁邊，激怒得發抖，向我說：“你是對的，倍倍爾，我們不比一羣無賴好些；你該把我們這一羣都絞死！”我帶着笑回答說：若環境許可，我會遵照他這親切的勸告的。

我在過去的三次議會會期中的一般態度，在工人階級及民主的資產階級社會中，贏得相當的聲望。因為在中產階級的某些部分中，仍留存着些真正的民主主義；例如，柏林有一羣小康的公民跟隨着約翰·約可培的領導，他們（大家稱他們約可培派）有自己的報紙，即民主周刊“未來”，他們很為難地維持下去；雖然從一八六七年到一八七一年時，他們還算很有錢的。主編的人是葛度·華斯博士。屬於這一派的人還有大洗染廠的創始人的兒子威廉·斯派因特勒[⊖]，黎騰，弗拉特朗特博士，賈登·李凡，曼挨爾斯坦因博士，鮑愛斯，“伏斯報”的前任編輯斯坦法尼博士及其他等人[⊖]。當李卜克內西與我在柏林度週末的時候，我們常在

⊖ 斯派因特勒從英國學來這套行業，是德國的第一個乾洗商和染商。

一所酒店裏遇到這些人；有時保羅·辛葉也跟我們在一起。大家默契都喝同一種便宜的摩塞耳出產的酒（就是所謂“馬車夫”），六辨士一大杯。我們常常一同到啤酒店中去，喝起酒來，我可不是能手，有些人却真是海量。有幾次，我們日出後才回去。

我的能得衆望的另一後果，就是我們的好些朋友的家庭都看重我，請我到他們的家中去吃飯。我不大喜歡這種宴請，總是盡可能地避免，因為我常是急切地希望回到家中去跟妻子和小孩在一起。

奧格斯堡的“大衆報”曾寫道：“倍倍爾又一次證明他有出色的演說天才，並證明事實上的確他是一個男子漢。這是值得說明的，尤其因為大家還不甚知道，這位萊比錫年輕的鑛工能手，雖然他是單槍匹馬的，雖然他的極端的觀點每爲大家所指摘而爲他惋惜，他却已經在帝國議會中處於傑出的地位，並贏得大多數議員的尊敬和承認，尤其是那些極端保皇派的議員。他更值得尊敬之處是因為他在議會工作得空時，還在一個同行的工場中作工來維持他一家的生活。”

最後這句話當然不是真的。這種事情簡直是不可能的。可是我後來在一本關於社會民主主義的書中也看到這個故事。這個故事仍在流傳；歷史就是這樣造成的。

這個時期內，黨的發展很令人滿意。它正因受到迫害和反對而壯大起來。在聚會的時候，我不但得與一般反對我們的人鬥爭，一般說來，我還得與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的

② 很奇怪的，從這些人的名字看來，真正的民主主義者大多數是猶太人或是非德意志人。

一大羣演說者和煽動者鬥爭。雖然施維澤爾已辭職了，可是在他們的新會長哈仁克勒夫領導下，他們對我們的攻擊却比以前還要猛烈。在一次我們受到最猛烈不過的攻擊的集會以後，我招幾個演說的人到一邊來，責怪他們這種陰險的策略。他們幾乎立刻就回答我，說他們必須攻擊我們；因為若社會民主主義者團結一致起來，政府立刻就會進而對付這黨而壓制它的。後來發生的事情證明這是對未來事件的一個聰明的預測。

當時，有好些社會民主黨人都已入獄。一八七二年二月一日法爾泰西被拘入漢勃土斯堡要塞；不久，卡爾·喜爾士也隨他入獄。

三 在萊比錫進行的叛國罪審判

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帝國議會開始那天，俾斯麥親王走到議員馮·歇華滋[⊖]的跟前問他道：“檢察長先生，對倍倍爾和他的同伴起訴的結果怎樣？”

馮·歇華滋聳聳肩膀回答道：“什麼也沒有。”

俾斯麥回答：“在這種情形之下，這些人是不該關起來的；現在，當然，起訴這事的一切譴責都要落在我們身上了。”

歇華滋已經研究過所有的文件，回答這話的意思是他們以為不可能判罪。俾斯麥好像已經忘記了我們的被捕入獄

⊖ 薩克森尼的最高司法官。

(據人家告訴我，乃出於他自己的教唆)並非爲了叛國罪的嫌疑，而是把我們關入牢門，免得阻礙他們行事而已。

我們的審判[⊖]定於一八七二年春在萊比錫裁判所舉行。因爲一般情緒相當激昂，我們在“人民國家”上發表宣言，勸戒我們的朋友保持鎮靜，勿落入警察和偽裝革命的特務手中。萊比錫的資產階級的報紙竟以造成陪審員對我們的偏見爲他們的第一樁重要的工作，把煽動敵視我們的文章，專送給各個陪審員，甚至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去與陪審員作個人接觸。

審判繼續了十四天。在這裏，我勢不能不把審判的情形完全敘述出來。起訴狀是根據我們作爲煽動者的全部活動的，例如我們與工人會社的關係，我們在集會中的行爲，我們寫作的文件，不論是報紙上的文章、小冊子或信函等各種形式。還有一切社會民主主義的宣傳小冊子，只要是用德文出版的，都用來反對我們，而不管我們是否參加了共寫作和推銷。

法庭的庭長是一個馮·墨克先生。他與他的名字(墨克是“蚊子”的意思)恰相反，有着大力士的身材，可是眉宇生得極低，看起來沒處藏腦子。事實上他是一個智力很低的人。他不能運用數量頗巨的起訴材料，對社會主義更是一竅不通。他不懂我們的解釋。而他的反覆詰訊更使他自已顯得十分可笑。

鄂圖·弗拉泰格與般那·弗拉泰格是我們的律師。他

⊖ 倍倍爾是因出席帝國議會暫釋出獄的。

們很能幹，並且不只一次地以他們的反詰使庭長狼狽不堪。

陪審員是六個商人，一個貴族地主，一個森林管理員和幾個小地主。每天法庭上都擠滿了人。司法部長和檢察長有幾次也出席了。由於德國的主要報紙都對這次審訊有詳盡的報道，他們的讀者才第一次明白社會主義的意義及其目的。從宣傳者的觀點看來，這次審訊是很有用的；我們，尤其是李卜克內西，他是主要角色，更不厭煩地利用這個機會。可是我們的敵人，一天一天地努力找機會造成陪審員對我們的偏見，到飯店中去會見他們，利用他們討論當天事情的時候，造成對我們不利的情况。

到第十三天時，開始了替我們辯護和反對我們的“陳述”。檢察官以下面的話結束了他的演說：“你們若不判處被告以罪名，就是認可了一切未來的叛國罪。”

我們的律師答辯，把起訴的罪名駁得體無完膚；可是經過二小時半的討論後，陪審官仍裁決為有罪。檢察官提請給予在一處要塞內囚禁兩年的判決。法庭就按照這要求判決了。

我們的黨友聽到這裁決與判罪十分憤怒；但是我不管結果如何，提議一同到奧謁巴哈酒店——因歌德的“浮士德”而著名——去喝酒去。我們的妻子，含着眼淚迎上我們，並不因我們的輕鬆而高興；不過，到底她們是有胆量的女人，也就跟着我們去了。我的醫生以一種很奇怪的方式安慰我的妻子。他說：“倍倍爾夫人，若是你的丈夫能在監獄中住一年，你還該高興哩。因為他實在需要休息呀！”

三月二十七日我們收到判決書後，就發表了一篇短短

的宣言給我們的黨，勸告他們忠於理想，尤其要幫助推銷“人民國家”，它當時已有五千五百份的銷數。同一天，我們在“人民國家”印出一篇聲明，抗辯我們無辜而被判罪，並指摘陪審官的偏袒。我們說：“這次審訊很促進了我們的思想的傳播，以致於我們情願在監獄中住上幾年作為付出的代價。但社會民主主義却不是任何陪審員所能干涉的。我們的黨將繼續存在、成長並取得勝利。可是你們，陪審員大人們，由於你們的裁決，却把今日的陪審制度判處了死刑，因為由有產階級的成員所組成的陪審團只能是進行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工具。”

全部的民主派和激進派的報紙都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法庭庭長與檢察官都因他們這次“救國”的行爲而得到獎章。四月二日，約翰·約可培聲明他與資產階級破裂，而加入到社會民主勞工黨來。爲了這次判決，我們的黨報和公共集會都提出許多次的抗議，這更引起了別的起訴的事。

在審訊以後不久，我患了很危險的肋膜炎。爲了我在公私方面的工作與憂慮，我已精疲力盡。我忍受着非常劇烈的痛苦，並且不能成眠。夜間，當我醒着躺着時，我想到俾斯麥正是一個同病相憐者；因爲我從報上知道他正害着失眠症和神經痛。“憂患有人同担，就分去了一半。”

四 帝國議會的其他演說與 “不敬罪”的審判

一八七二年四月底，帝國議會第三次會期集會時，我身體剛好，便前往柏林。五月一日，我發表演說贊成取消鹽稅

的提案。我反對一切加於生活必需品上的稅收；因為有產階級之維持這種收稅制度純粹是從自私的階級利益的動機出發的；為的是要把公共負擔從他們自己的肩上移開。像這種情形，我說，當然不能使社會上的不同階級調和起來。

一八七二年是“文化鬥爭”發展的最高階段，這是俾斯麥在政治上的最大失策，使德國內部的發展發生了最有害的趨勢。擺在議會面前的議案是俾斯麥驅逐耶穌會教士的措施。我在第三次宣讀辯論時抨擊它，指它為一種強制辦法，結果只能增加耶穌會教士在德國的勢力，而打擊他們勢力的最好辦法，莫過於把現在化費在軍備上的千千萬萬錢財，移來作為人民的教育經費。

我的演說的要點大略如下：英國的歷史學家勃克爾衡量一個民族發展所及的階段，是按照宗教鬥爭在這個民族的事務上所佔的重要性的程度而定的。依這個標準衡量起來，德國實處在文化程度很低的階段上。因為在這裏宗教問題竟處於一切事務的中心。可是我們得承認宗教問題是很密切地與政治及社會問題聯系着的。若中央黨在議會中是陣容壯大的，這並不僅僅是由於它的宗教意見，而特別是由於它所代表的社會與政治利益。德意志人民中，信奉羅馬天主教而在經濟上落後的階層都依附中央黨，而資產階級的階層則參加自由黨。平易、簡單、質樸的新教——可以說是家常衣著、軟拖鞋式的宗教——是近代資產階級的宗教。這次的全部爭執，涉及宗教方面來說，只是一種假鬥爭；實際上它是為了在國家內部爭取優勢地位的鬥爭。若自由黨人真是熱切於追求進步的，他們就應該與教會破裂；

因為實際上，資產階級根本沒有宗教。宗教在他們只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其目的是保持權威，企圖使工人成為更順從的剝削對象。

教皇永無謬誤這一教條，據說對國家是一種危險。我却不能了解這種說法。一切教條，推究其極，都是反科學與反理性的；就只在這一點上教條對國家才是一種危險。一種教條愈是荒謬——教皇永無謬誤這一教條，當然應該說是荒謬的——就愈將受到一切有思想的人的反對。再者，耶穌會教義據說是不道德的；可是，這種所謂的國家以前却從未過問過張三李四的道德，宰相當然更不會來管這些事。只要耶穌會教士與中央黨支持了他的政策，那麼他們對宗教事務儘可要怎麼辦就怎麼辦了。俾斯麥想使教皇全權論派成為他的政策的工具。反對耶穌會教義而用緊急手段，只會增加它的信徒。實際上國家才是耶穌會教義的真正父母。國家應把千千萬萬每年化在殺人工具上的錢財，轉用於人民的教育上。這方法比世界上所有的強制性法律，更能打擊、損傷耶穌會。建立一套真正現代化的教育制度，使國家與教會分開，把教會勢力排出學校，這樣做起來，在十年之內，就可以肅清一切教會的陰謀。讓他們在教堂裏宣教，講個暢心如意——沒有人會去聽他們的。但是別的黨派却並不要如此，他們需要權威的幫助，而權威也是教會的主要支柱。若是權威在天上已失敗，它也會把地上的權威連帶拖倒。這就意味着，在政治方面的結果是一個共和政府，在社會制度方面的結果是社會主義，而在宗教方面則是無神論。

中央黨的議員拜爾斯脫萊姆伯爵，抓住了我末了這些話來糾纏。他說：“若人民一旦對天上的樂園失去了信仰，他們將會要求得到‘國際’許諾給他們的地上樂園。”對這些話，我用很着重的語氣回答：“對呀！”

這時候，在議員們中間傳講着一件很有趣的事件。有幾個中央黨的議員，在一處飯店中間談，說到杜林傑和他的對教皇永無謬誤這一教條的反對。身為教士的一個慕尼黑議員，據說曾這樣說過：“哎！若是這個老驢能夠相信這些胡言亂語，那他早該也能相信這教條了呀！”

我又因不敬罪而要受審，因為我批評了普魯士國王申謝意的詔書。那還是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的事；在這詔書中，國王說明他相信這次戰爭的結果將是自由和統一。我說我們已有了統一，可是自由却沒有，這是重彈舊調；當國王們感到危難時，他們便給予各種各樣漂亮的諾言，可是等人民犧牲了自己，救了他們，他們便把一切諾言都忘了。我自作辯護，檢察官要求除了我已判的罪刑外，再增加我監禁於要塞的刑期；可是法庭將他駁回，判我繫獄九個月。法庭還宣佈取消我出席帝國議會的資格。這是一個政治上的大失態；因為法律無權宣告我無被選舉的資格，我重又因黨的支持得為候選人，並勝利地當選。這是給法庭的一個耳光，關於這點，我下面接着再談。

第十六章

在 要 塞 中

一 漢勃土斯堡

在我出發到要塞去以前，一個朋友寫一封告別信來說：“若不是爲了你的家庭，我簡直要因你仇敵的愚笨而歡呼了。你一定會因這事而在健康方面大得益處，還可增進學識；而真要成爲一個危險分子了。你的那位好妻子，雖受着離別的痛苦，但只要你能受到一種使你就此強壯起來的治療，也就滿足了。”

我在受監禁的第一天便向我的選民發佈一篇宣言，請他們再選舉我，那便可使法院的判決作廢，他們選了我。後來當帝國議會於一八七三年年初重又聚會的時候，薩克森政府不得不命令我的選舉區重行選舉，我又以多數當選，並且票數比以前的選舉還多得了四千票。

我還向薩克森政府請求過一次，要求爲出席議會而將我釋出要塞，却未能成功。當時的解釋堅持憲法第四十一條所保證的議員特權並不能應用於囚犯。雖然我主張在一立憲國家之內，一個在監獄中的人民代表，當然需要出席議會，行使他代表人民的職責時，就應立即釋放出獄。可是我

對於這種拒絕並不懊惱。一段短時的釋放將會延遲我的監禁時期，更將有損我的營業了。

七月八日午後，我動身往漢勃土斯堡去。男男女女一大羣，在車站上給我送行。我的行李中有個裝着一隻雄金絲雀的大籠子，這是一位德累斯登的朋友送給我的禮物，“當作獄室中的朋友”。我替它找了一位妻子，它的多少兒女和孫兒女們都是在監獄中繁殖出來的。

到漢勃土斯堡，我見到李卜克內西已在那裏安插下來了。還有卡爾·喜爾士和幾個從開姆尼斯來的朋友。我們一共有五、六個人，當一個離去了，法院又會補一個進來。同時，經常有些學生，因決鬥而被送到這個要塞裏來。

這個漢勃土斯堡的要塞是相當多的一大堆奇形怪狀的房屋。我們的囚室有着鐵格子的窗戶，後面臨着廚房的大後院，我們就在那裏作規定的散步，牆外有樹林與田野，一直到穆茲興小鎮。

我們的囚室是由一個叫做“小火夫”的人來收拾的。我們得付清掃的工資和囚室的租金——這個國家連囚犯的房屋都不是無代價的——每月約需十五先令。我們的膳食是由附近一個村莊的飯店預備的。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情況如下：早晨七點鐘的時候我們便得衣著就緒，等室門打開，便來掃除。這時我們就在寬大的走廊中進早餐。我們的朋友喜爾士通常趁此機會與另一個民事犯下棋，他們兩人常常不斷地爲了下棋而爭吵。從八時至十時，我們就被關在囚室內；接着我們便在後院中散步。冬天從十二時至三時，夏天就從十二時到四時，我們又被關在室內。以後就是第

二次散步，到五時或六時，那也視季節而定，以後又被關起來直到第二天早晨。我們有權利使用燈火到夜間十時，在這段時間內，我專心學習。隔了幾個月後，我得到允許，早上八時到十時之間，讓李卜克內西關在我的屋子內，那他可以教我英文與法文。當然，我們常常討論到我們的黨的事務，我也答覆我妻子每天寄來的有關營業的信。

李卜克內西與我都是愛喝茶的；可是我們無法得到，也不許我們自己弄，因為怕引起火災。然而，規則原是定了出來給人破壞的，我設法偷弄了一盞酒精燈進來，還有一隻茶壺和一些茶葉。只等夜間門上了鎖，我便烹茶；爲了使李卜克內西能分享喝茶之樂，我在院中找了一根九呎長的竿子，一端繫了一個我自製的網。茶一煮好，我便在牆上敲敲——他的囚室就在我的隔壁——把一杯茶放在網裏，把竿子探出去，伸到他窗前。用這種同樣的方法，我們交換報紙看。

當我在獄中頗爲安定下來時，我便病倒了。過去幾年的興奮和工作使我忘掉自己陷入的完全精疲力竭的狀態。現在當緊張情形一放鬆，而我又被迫安靜下來時，我的體力就支持不住了。但是完全的休息與新鮮空氣不久便使我又能起牀了。這顯得那位醫生是很對的，他告訴我妻子說在要塞內關一年對我是最好的治療法。後來經過一次身體檢查，發現我左肺上給結核菌吃成的一個大洞，竟在監禁期內長好了。我真是幸運的；原來可能成爲損害的反倒給了我好處。

當時既知我將監禁三十一個月後，我便決定要充分利

用這時期在某種程度上來補足我所受教育的不足。我主要的是學習歷史與政治經濟學。我重讀馬克思的“資本論”，那時出版的還只有第一卷，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拉薩爾的“獲得權制度”，密爾的“政治經濟學”，杜林與卡萊的作品，勒浮勒埃的“原始財產”，斯坦因的“法國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史”，柏拉圖的“理想國”，亞理士多德的“政治”；馬基維利的“霸術”，湯姆斯·摩爾的“烏托邦”，馮·透能的“孤立的國家”和別的書。至於那時我讀的歷史作品中最吸引我的是勃克爾的“文化史”和威廉·席未門的“日耳曼農民戰爭史”。後者鼓舞我寫一篇通俗性的論文，題目是“德意志農民戰爭”，這篇文章特別注意中世紀的主要社會運動。這篇短文印成書冊發行，後來在反社會主義法律下被沒收了。我並不忽略自然科學。我讀達爾文的“物種原始”，海凱兒的“創造的故事”，布歇奈的“力與物質”和“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拉皮格的“化學書簡”；還有一部分時間我用來讀古典的傑作。我給學習的真情抓住了。

我從法文中譯出了葉浮·季育與席吉思孟·拉克爾華的“基督教社會教義之研究”，這譯本現在以“基督教的真義”為書名出版的。我還寫了一篇批評這本書的文章，以小冊子的形式發行，題目是“對葉浮·季育與席吉思孟·拉克爾華所著基督教的真義的註釋”，另加附錄講到婦女在目前與將來的地位。這一本小冊子，就我所知，是我們黨中第一本從社會主義觀點來講到婦女地位的作品。這是由於我研習法國的社會主義的與共產主義的理想國而啓發我寫這本書的。

我還做了準備寫作“婦女”的工作，這本書最早是在一八七九年出現的，書名是“婦女在過去、現在與將來”；雖然這本書在反社會主義法律之下是本禁書，可是很快地就出了八版。在一九一〇年出版了第五十版與第五十一版。

每過三個星期或四個星期，我們家裏的人便來深望我們一次。她們住個三天，寄寓在附近的村莊裏。她們來時還帶着小孩子。她們被允許從上午九時半到下午七時，就呆在我們的囚室裏，在我們規定的散步時間內也可以跟我們在一起。這真是一大慰藉。

我覺得急切需要體力勞動，於是我想起可以做些園藝工作。我們無法分得院中的好的地段，可是我們可以盡量利用沿牆腳的空地。我們起勁地動手做工。李卜克內西那時正在寫作關於土地問題的論文，他已自視為農學家，有把握地向我們說這些空地是最肥沃的土地。可是我們動手一掘，却只掘到石塊。李卜克內西把臉拉得很長，我們却大笑起來。接着我們施肥——這工作可不大舒服，政府當局若要強迫我們做這件事，我們定會大怒地加以反對的。

我們種了蘿蔔，便等待着收穫。它們長得很好——至少，葉子是如此的——却没有長出蘿蔔來。每晨出去散步時，大家趕着奔過去，要看誰能拔出第一個蘿蔔。可是總是白跑的，總是沒有蘿蔔。後來獄卒把理由告訴了我們：施肥太多，土地過分肥了。我們顯得很傻。

十月二十九日，薩克森尼的國王約翰死了，他的兒子阿爾勃脫做了國王。新君即位，便行大赦，已成了慣例，我們的妻子都希望着我們的釋放。可是我們却無這種幻想。這

位新君，他寧可釋放薩克森尼的所有罪犯，也不肯釋放我們中間的一個。我們倒也寧願他這樣，因為議會普選期已近了，我們指望着當時已四處蔓延的這種激憤的情緒，而一次大赦是會降低這種情緒的。

我決定利用我被迫的閒暇和不參加競選的時間來寫一本備候選人用的小冊子，書名是“議會與各種集會的活動及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三年的社會民主主義”。在附錄裏面，我收集了那些對於參加實際政治的人知道了很有用的關於選舉法、選舉條例、刑法、集會法及關於黨的宣傳的章節條文。我很高興，因為我後來從尤勤·烈希脫本人那裏知道，我還本小冊子啓發他寫那本著名的“政治入門”，後來別的黨派都照我的榜樣做了。

選舉在一八七四年一月十日舉行。我們的黨所得的結果很令人滿意。我們有六個候選人被選上了，德意志勞工聯合大會則有三人。這情形就是社會民主派的兩派共有九個議員選進帝國議會，總計共有三十五萬八千六百七十票。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得十八萬零三百十九票，我們得十七萬八千三百五十一票。這總數比一八七一年的總數多了二十三萬六千票，或是說多了百分之二百的票數。

當然，這樣輝煌的結果使得資產階級各黨派大為憤怒。我們的黨儘管遭到了告發和欺瞞，它却仍逐漸穩步地發展，於是用特別的立法來破壞我們的這種想法（原來在政府方面早有此想法）便漸漸開始形成了。

二 哥尼斯坦

三月間，我們正式得到通知，從一八七四年四月一日起，我們要遷移到哥尼斯坦的要塞去。但是後來遷移的事延了期，因此李卜克內西還是在漢勃土斯堡服滿了監禁期，而在四月十五日到萊比錫去了。我自己則由一個便衣警官伴着，在四月二十三日動身到哥尼斯坦去。當我們向監獄官告別並爲他給我們的許多照顧和便利道謝時，他顯然是受到了感動；他跟我們握手，向我們祝福，托上帝保佑我們，從他的眼光看來，這是他能給我們的最好的旅行食糧了。

四月二十三日是一個美麗的春日。我們往要塞攀登上，途中遇到了長官馮·雷翁哈地將軍，監送我的人把我介紹了給他。我們便與他一同繼續走去，這位將軍便問起我們在漢勃土斯堡的待遇，並答應我在這裏的一切食宿待遇不會比那邊壞。我住的房間在一所以前作爲火藥庫的建築裏面，牆壁是防炸的，有着鐵格子的好像船艙圓窗的窗子。室中有一隻大的磚砌的火爐，這火爐就是在這春光燦爛的天氣裏吞下了五磅煤塊（每天的很少的配給量）後也還是沒有一些暖氣。我爲了保暖，就得自己化錢另外買煤。

在要塞範圍內，可散步的地方是很小的；一個哨兵守着，制止許多遊客走近來。可是，從軍隊膳食處領來的食物，量既豐富，味亦可口。

三 士 維 考

五月十四日，我被釋放了。在我服九個月監獄的刑期以前，我有六星期的暫釋。在萊比錫有愛德華·伯恩施坦來接我，他是專為這事從柏林趕來的。那時正是降靈節，我與家人及朋友們到“薩克森·瑞士”去作小遊；當我們來到那我才離開沒有多久的哥尼斯坦時，却有一件事使我們覺得非常有趣，就是我曾在裏面住了三星期的囚室的小窗戶，是被人家作為當地的名勝古蹟之一而指點着的。

在我到士維考去服刑期之前，我去詢問監獄官一個政治犯所能得到的特權。我每月可在獄卒監視下會見一次妻子。可是第一次會面以後，那是在我入獄的第三個月中間，我們決計放棄以後的會面；因為為這種要忍受一個官方人員旁聽着我們說出的每一個字的會面，這筆旅費實在不值得花費。

我為了營業上的操心非常煩惱。那時工業危機正發展到頂點，只有經過很大的困難，我才能與一個已經開始用機器大規模生產的敵手競爭。

我的主要工作是著述德意志農民戰爭的歷史——現在已絕版了——這書從來就不是一本傑作，因為我缺少必要的參考資料。我寫這本書是因為一五二五年的戰爭及以前的農民起義，據我看來，是近代德意志歷史上最重要的階段之一，同時又是官方歷史家可恥地忽略了的一段時期。

最後到一八七五年四月一日——俾斯麥的六十歲生日

那天——我被釋放了。我與監獄當局的關係極好，與監獄官道別時也是很熱誠的。因為我總是想法使無法改善的事盡可能地變得更好一點。在一點也不屈辱我自己的範圍內，我總是盡量嚴守獄規以使監獄當局困難的管理工作變得容易一點。

我在士維考的伙伴們，在我得自由的那天舉行了一次歡送會，送給我妻子與我兩隻精美的咖啡杯，上面刻着相應的詞句，並希望我們從此以後能在平靜與安謐中享用薩克森名產的飲料；一個願望！啊！可是終不能實現的。

我的朋友宋納曼，“法蘭克福報”的主要股東，發表了一篇社論，不祝頌俾斯麥的壽辰而恭賀我的釋放。我在監獄中時，他曾送給我幾瓶酒，我送回家去，與我的妻子和朋友們喝，因為獄規不允許犯人飲用這種奢侈品。

我釋放後不久，接到了一封歌弗爾教授的來信，這位社會學家以前是奧地利自由黨政府中的一員，還是那本著名的小冊子“社會主義的精義”的作者。這本小冊子因它無偏見地說明了社會主義的目的，曾引起過很大的騷動。他還送給我一部他的巨著“社會機體的構造與生命”的第一冊。他寫信給我說，雖然在許多點上，我們持有不同的意見，可是我們對於社會問題有着相同的興趣，因此請我接受這本書作為共同興趣的紀念物。

後來，在一八七七年我們相遇於萊比錫。我們談話的主要題材是社會主義黨的發展，和社會主義何時可以成為主要的力量。我，既是一個樂觀者，認為這時機已經不遠，他却認為至少要兩百年以後。

但是歇弗爾教授以後完全轉變了。當俾斯麥開始實行社會改革的時候，歇弗爾急欲在他手中得一官職，便寫了一本小冊子“社會民主政治不可實行論”，這與他以前的信念是絕對相反的。從他這次行動以後，我便不再與他有任何關係了。

第十七章

由一八七一年至哥達大會

一 各國政府與社會民主黨

巴黎公社使歐洲所有的政府都懷着極度的焦慮來注視社會主義運動。這種焦慮更因巴黎公社顯然得到所有已經發生社會主義運動的國家內的工人的同情而更為增長。政府與資產階級集團關於“國際”的力量，製造出種種誇張（不消說是可笑的誇張）的觀念。德國便有好些人提出，要求對這種運動採取嚴厲的手段對付，這要求在警察與法庭方面是極樂於接受的。

俾斯麥邀請了他的多年宿敵奧地利首相馮·布斯脫到加次坦因來商量關於“國際”的事；結果除了達到“對這問題加以研究”外，並沒有得到其他的協議。

但是到了一八七二年的二月，西班牙政府（意大利的阿瑪底烏親王剛被選為西班牙國王）發表了一件給歐洲各國的通知照會，提議列強之一應該來過問此事，並提出措施來反對“國際”，因為該組織的目的在攻擊人類的傳統，廢除上帝、家庭和世襲財產制度，復因它的可畏的組織，實已構成一種難以罄述的威脅。可是英國的外交大臣葛蘭維爾勳爵

打消了這個建議。他宣稱說，這“國際”雖是工人與工會的一種“國際”聯合的中心，在大不列顛却只限於在罷工事件時給以勸告，而其財力又極微薄。依照英國法律，任何外國人均有權到英國居住，並受當地法律之保護，與英國臣民並無二致。他們只有違反了法律，才能按照一般的法律程度，經由正規的法庭，給予懲罰。這樣的外國人誰也不够被逐出境，除非他是原已與英國訂約，協議引渡刑事犯的各國臣民。他到現在並未看出英國有何種理由來修改關於外國人居留英國的法律。

不列顛政府這種態度使得國際協議已不可能；而一八七二年的海牙大會，那時馬克思領導下的社會主義者與巴枯寧領導下的無政府主義者起了分裂，告訴那些太胆小的政府危險並沒有那樣臨近。後來“國際”的總評議會從倫敦遷到紐約，證實有改組的需要。

俾斯麥却依舊十分注意。一八七三年四月，他在普魯士的上議院中陳說，需要採取嚴厲的法律來對付“國際”的黨派和教會操縱的黨派——中央黨。同年六月，他提出法案，以限制報紙言論的自由，要點是：任何人在印刷品上以一種損害道德、公平或愛國心的態度來攻擊家庭、財產、全民兵役，或其他現存秩序之基本支柱者，或詐稱應受這條法律懲罰之行動為可稱讚的、合乎職責及值得模倣的行動者，或討論社會現狀而其態度足以破壞和平秩序者，均處以二年以下之要塞監禁或拘留。在公共報紙上以攻擊形式觸犯宗教者，得處以三個月至四年的監禁，而對於該事應負責的編輯應和罪犯同樣受到懲罰。

這種兇惡橫暴的建議連帝國議會中的大多數人都覺得太過分了。這法案被否決了。俾斯麥乃進而謀修改契約法，即修改有關僱主及僱工的法律等等來對付社會民主黨。他的這類企圖，我以後再講。從一八七四年以後，接連不斷地一直發生用法律來制裁的事，卒致在一八七八年的春天，謀刺威廉皇帝以後，達成了反社會主義法律。

二 社會民主黨的兩派

從一八七二年以後，我們的黨所遇到的種種迫害的特性，按說應能促使所有的社會主義團體進入於較密切的聯合或更完全的合作。可是從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三年間，互拚死活的爭執却比任何時候都兇，尤其在拉薩爾派那一方面——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最使他們感覺不安的人就是我們的在柏林的主要宣傳鼓動員。

合併問題最初是在一八七二年柏林的拉薩爾派同盟大會上討論的；可是這動議又因提出以前的問題而被否決了。這問題又於一八七二年在梅因斯舉行的社會民主勞工黨第四次大會上提出討論。該會通過了一個冗長的決議案，勸告互相容忍，尤其要停止報紙上的爭論。可是，雖然李卜克內西與我在我們的“人民國家”上守着信用，不攻擊任何別派的社會主義者，甚至還提出更和解性的提議；建議若是不可能合併，那至少在選舉時應有共同採取一致行動的協議。可是爭執却仍氣勢不稍減退地激烈進行着。我們還因為未經委任而求和解遭到監察委員會的叱責。

一八七三年萊比錫的警察局長對我們的黨的迫害特別起勁，似乎他想向全國其他各處的同僚顯顯自己出衆的本領似的。他發佈一條法令，禁止出席“國際”在海牙集會的大會，犯者監禁四月。我們的編輯同事海潑納破壞這條法令，關了四個月，後來被逐出了萊比錫。更進一步，這警察局長更禁止人加入“國際”，不准招收新黨員及收取黨費。

海潑納，由於他與黨的執行委員會不和，寫信給馬克思與恩格斯說黨的現況由於拉薩爾派而非常消沉。這封信，還因馬克思與恩格斯對任何有關拉薩爾的事都深感不可信任，使得恩格斯寫一封譴責的信給李卜克內西。這信的內容給我知道了，我就寫信給馬克思與恩格斯要他們放心。給恩格斯的信上我說在當時的情況下，要採取積極行動對付拉薩爾派而不難以挽回地損及我們的事業是不可能的。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製造出的對拉薩爾派的崇拜，必須連根拔掉。可是我們需得十分小心地進行，因為拉薩爾死後的影響仍是相當大的。給這種崇拜以決定性的打擊的最好方法是由馬克思——他已是當時公認的政治經濟學學術上的權威——從科學及客觀的觀點，在“人民國家”上發表一系列的論文，來揭發出拉薩爾學說中的許多瑕疵及錯誤。我寫給馬克思的信也一樣，請他再印一版新的“共產黨宣言”，把末尾一段暫行刪去，不然這將使得發行者可能受到叛逆罪的公訴。這宣言，若在社會上極力介紹和出售，自可打開許多人的眼睛而把拉薩爾主張中的許多弱點都暴露出來的。

在那段時間裏，向“人民國家”提起公訴的案件實在太

多了；通常總有二個、有時有三個編輯在監獄裏。別的黨的機關報（不把“人民國家”算在內也有八九種）的編輯也遭受着同樣的命運。在薩克森尼，執政者不但把觸犯法律的人監禁起來，還把他們驅逐出城鎮或區。萊比錫警察當局還不准我們參加我們的黨在愛森拿赫召開的第五次大會——原來該在紐倫堡舉行的，但遭巴伐利亞政府禁止了——犯者罰一個月的監禁。萊比錫因此在大會上並無代表。這次大會出席者有代表七十一人，代表二百七十四個單位。兩派合併的事又談起了，但無具體的結果；因為“勞工聯合會”不久以前正通過了一條決議，以詈罵的言詞拒絕與社會民主勞工黨有任何交往。

我已提起過一八七四年選舉的結果。也許有些人對於我們的黨在這幾次選舉中所化的費用感覺到興趣。我們的黨所擔負的在全德意志境內的費用約值一千九百五十鎊；在薩克森的黨委會爲了九萬一千票化費了約有一百一十二鎊；萊比錫選舉，包括城鎮與區，連一次補缺選舉，化了一百零九鎊；在開姆尼斯化了六十五鎊；在其他選舉區化了二十二鎊和五十二鎊。這些數目與現在我們所化的比起來真是少得不合理了。但是現在黨員出錢，作選舉工作又都是有酬勞的。那時黨員是不出錢的，他們也極少有錢可給，人數也少；做選舉工作，並無酬勞。每一個黨員都得比今日作更大的犧牲，才能爭得些結果。此外，我們不應忘記，今日，尤其是在德國，我們的對手們進行着比我們過去任何次所必須與之競爭的更大規模和化費更大的競選運動，因此現在我們必須用更大的努力和更多的費用來對付它。

三 一八七四年的會期

這次會期是在二月開始的。我們向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的代表們提出的說我們在議會中的派別應該聯合的建議被拒絕了；不過我們同意至少要互相支持。過去雙方互相非難得也够了，這只便宜了我們的敵人；雙方正宜急切求得諒解，即使聯盟是不可能的。

我們的黨對於我們議會中的代表完全不滿意（我當時仍在監獄中，李卜克內西也沒有出席，他在休會前不多久才被釋出）。大家嫌他們在議會中發言太少，而且發言時也嫌說得太溫和了。這次競選得到的輝煌結果會引起了很大的期望。我們的代表痛切地陳述帝國議會議長不指名叫他們發言，同時却顯出偏袒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的代表。這是確實的。那時的議長是馥鏗培克，他正像我以前說過的，是所有的帝國議會議長中最不公平的一個。他爲了要箝制社會主義者們，廢除了預先安排發言人名單的辦法。要說話的議員們因此就得先引起議長的注意，就如小學生要引起先生的注意一樣。這樣，就只得隨他的意，他喜歡叫誰，就叫誰說話，馥鏗培克無恥地廣泛地利用他這種任意選擇的權力。結果，我們的代表極少得到發言的機會。另一個濫用辯論規則的是：有一個叫作凡侖丁的國家自由黨的代表，他隨時都準備着動議討論終結；他說了這樣多次的“討論終結”，以致後來一個正準備要說話的代表被阻於“討論終結”而未能來得及說話，便稱爲“被凡侖丁了”——那就是比

喻作被中止了說話。據說凡侖丁甚至於是專提“討論終結”的。

提給帝國議會的法案中有一個新的軍事法案，規定現役兵員四十萬零一千人，役限七年。自由黨人與國家自由黨人起先覺得事關憲法而有所躊躇，可是後來俾斯麥恐嚇着要辭職時，國家自由黨人便讓了步。就在那時候，毛奇說出了常被人家引用的那句話：“我們用兵力在半年之內所獲得的，必得用兵力防衛半個世紀；讓我們不要欺騙自己：我們戰爭的成功贏得了各方面的尊敬，可是得不到任何一方面的愛戴。”

對我們把常備軍改成民兵制度的提議，毛奇回答道：“先生，槍枝是很容易散發出去的，可是收回來却不很容易。”

另一件對於工人階級極為重要的事，便是一個關於工業法規的修正案，規定對破壞契約的懲罰罰金不得超過七鎊十先令，也不得予以監禁。原來在繁榮期間及衰落以後，罷工往往不顧契約就發生了，這使僱主們十分恐慌，他們請求政府及帝國議會將這種破壞契約的情形定為刑事案。政府便採取了這種辦法，可是帝國議會把這辦法否決了；因為議會那時尚沒有打算認可強制性的立法。另外議會還拒絕了一件限制言論自由的法案，雖然這件法案的性質比我前一節中所提起的還溫和些。

我們黨內兩派的聯合或合併的問題，在一八七四年的大會中重又提出，可是仍沒有明確的結果。但是這件不能以友誼商量得結果的事，最後却由迫害來促成了。這特別

是因為檢察官戴森道夫在一八七三年從麥格德堡調到柏林法庭來了，憑着他所提出的公訴案件，他成了檢察官中的前導者。他的努力要作“國家救主”是得到了柏林法院第七庭強有力的煽動的，這個法庭所提出的無數次對付我們的黨員的案件，表明它是一個“血腥的審判所”。

戴森道夫在麥格德堡已以其專門中傷社會主義者而出名。他是那個時代大量產生的求名圖利的人中間最壞的一個。他要造成自己的地位，想以嚴酷手段對待社會主義者以圖贏得執政者的青睞。他成功了，到底成了德國最高法院萊比錫皇家法院的檢察長。可是我們的黨在他的控訴之下却日益壯大，日益團結了。他所動手想摧毀的，反而是最後的勝利者。在柏林法庭上他果然不負他上司的期望，尤其是俾斯麥所期望於他的。提出公訴的案件愈來愈多，懲罰愈來愈嚴苛和殘酷。許多人的一生都被毀了，許多家庭的快樂都被破壞了。其中絕大多數的案件實在都是小事，若在任何別的法庭上，判處幾個星期的監禁或罰款就該覺得儘够了的。在社會上某些部分的人陷入了一種“神經過敏”狀態。全普魯士在一八七四年一年內，在一百零四件審判案中，有八十二個拉薩爾派的人被判徒刑，一共是二百十二個月的監禁。

薩克森尼的情形也相同。判決愈來愈嚴；以前只判幾個月的事，現在動輒判幾年。在薩克森尼，我們的黨受害最深。

除了這些司法處置以外，警察方面還用解散我們的聯合會及別的方法來迫害我們。六月末，全德意志勞工聯合

會被解散了，會長被判處監禁兩月。警察還解散了我們的黨的柏林支部、工作婦女同盟和長靴工人、傢具工人及石工等聯合會。同樣情形還發生於法蘭克福、漢諾威和哥尼斯堡。薩克森尼和巴伐利亞也照着普魯士的榜樣做。

這許多迫害使得最堅決反對合併的人也了解我們只能在聯合陣綫中得到安全。

一八七四年十月十一日，李卜克內西寫信給我——那時我在土維考的監獄裏——信的內容大致是說拉薩爾派的人已與他接觸，提議和平相處以及合併的事；不過他囑我要謹慎。後來大家同意，我們的黨在漢堡的執行委員會應把合併所需考慮的條件和計劃付托給雙方的聯席委員會。雖然勞工聯合會內部有所反對，以後的磋商進行得頗為順利。在柏林有一次大集會，會中所有尚有自由的帝國議會代表（有二人在監獄中）都發表演說贊成重行合併。聯席委員會包括有雙方的代表各八人，在一八七五年二月十四和十五兩日集會於珂堡，以謀在雙方大相逕庭的綱領之間找到一個折衷調和的辦法。這工作是極端艱難的，可是最後這委員會竟能宣告它已經達到一個每個代表都感到滿意的綱領草案。不過就整個黨來說，却並不如此。當李卜克內西把綱領草案送到監獄裏來給我看，並說明已無可作更進一步的改善時，我感到非常紊亂。有好幾星期，我一直在懸揣不安及脾氣極壞的情況之中，因為李卜克內西既沒有照他答應的來看我，也不覺得應該使我徹底知悉事情進展的情形。我覺得我應該得到較多的重視。我寫給他一封很長又很憤怒的信，信中對這草案作了很嚴格的批評，並另制訂了一個

長的包括最細微末節的對案。我的情形又一次證明久與外界隔絕能使一個人完全沉浸入自己的潛思默想之中。李卜克內西則竭力辯說工作的急迫，並且處於獄官在旁監視的情形下，不可能談到黨中的內幕和秘密的事務。他是對的；可是在一個被囚的人，知道在外面進行的磋商會影響整個佔據他思想和感情的事情的，他自然急切要求能交換交換意見，雖然限制得很嚴密。黨的執行委員會當然拒絕我的提議，雖然最後我也就放棄己見，我却是始終不贊成這個綱領草案的。

在一封我給恩格斯的私人信中，我問到他對於合併的事的意見。他的回答是取斷然否定意見的。可是我因各方的壓力與李卜克內西的請求，我禁口不作公開的批評；人家說我的反對將使合併成爲不可能，而我固衷心盼望合併，黨又急切需要合併，那麼就是只作形式上的反對的這種想法，也得丟開了。究竟，這個綱領以後還是很可以修改的。

一八七五年四月一日我從監獄釋出，在我釋出以後我的選民在格拉格安排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我全家赴會。當場的一篇演說中，我說到當時正在進行中的磋商合併的事，表示過去我們曾互相爭執，希望從今以後將用我們的勇氣、力量及堅忍向我們的共同敵人作戰。

第十八章

從哥達統一大會至反社會 主義法律的前夕

一 統一大會

統一大會於一八七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哥達召開。經過好些年的互相劇烈反對，從此以後敵對的雙方要當面來較量一番了。他們不能一見面就互相擁抱而彼此仍滿懷着猜疑，是一點不令人驚奇的。互相極度的容忍是必需的，因為兩派人事的與政治的歧異還是相當大的。我們的共同的敵人屏息地注視着哥達大會，他們極欲知道合併工作究竟能否完成。這合併工作，經過相當的摩擦，比預料完成得却還好些，並且有着良好的後果。

大會出席代表有一百二十七人，代表了二萬五千六百五十七名黨員；其中七十一個代表是全德意志勞工聯合大會的一萬六千五百三十八名會員的，其餘五十六個則代表了社會民主勞工黨的九千一百二十一名黨員。

李卜克內西報告了綱領的事。經過稍微的修改，一致採納了下面的綱領：

一、勞動是一切財富與一切文化的根源；並且因為

有效的勞動只有在社會裏和通過社會才是可能的，勞動所得的全部生產品應歸諸社會，那就是，在大家承認勞動是一般的責任這條件之下，按人人平等的權利，各人合理的需要，歸諸社會的全體成員。

在今天的社會裏生產工具是被資產階級獨佔的；工人階級由於上述結果而產生的依賴性，是各種形式的痛苦及奴役的根源。

爲求勞動得到解放，生產資料必須轉變成爲社會的公共財產，整個勞動的管理應基於合作的原則，勞動的生產品應爲公共福利而作公平的分配。

勞動的解放必須是工人階級的事業，除它以外，一切其他階級只是一個反動的集團。

二、從這些原則出發，德意志的社會主義勞工黨目的在以一切合法手段來建立一個自由的國家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廢除工資制度來打破工資的鐵律，任何形式的剝削的廢止和一切社會的及政治的不平等的消除。

德意志社會主義勞工黨，雖然在開始時，就一民族國家的範圍內努力，但仍意識到工人運動的國際性，爲求實現全人類博愛這一真理，決心把所有加在工人們身上的責任，全部擔負起來。

三、德意志社會主義勞工黨爲了社會問題的解決而開拓途徑起見，要求制定以國家爲輔助而在人民民主管理之下的社會主義生產合作制度。這種工業的與農業的生產組織，應達到如此的規模，就是以後全部勞動的社會主義的組織都將由此產生。

這以後便說到國家民主化的要求及當前的社會要求。

這個合併起來的黨的名字是社會主義勞工黨。至於它的組織，則由五人組織委員會主持一切，人選由大會選舉。這個常務委員會由七人組織的監察委員會監督；這七人由大會每年指定為該委員會所在地的該地黨員選舉產生。另外選舉一自德意志全境各地來的十八人委員會，他們主要是批評常務委員會的工作，遇重要事故則聽取常務委員會的報告。各地的黨委負責人由各地黨員提出交常務委員會委派。

依照我的提議，以漢堡為第一屆常務委員會的所在地。下列各項職務是付給薪金的：付主席每月薪金約九鎊十五先令，付主席的助理二鎊五先令，付秘書兩人每人七鎊十先令，付出納約五鎊五先令，以上各人均按月計薪。監察委員會的所在地在萊比錫，主席就是我。黨的正式機關報在柏林的是“新社會民主主義者”，在萊比錫的是“人民國家”。這兩種報紙都已為黨所獲得了。大會在為一切文明國家的工人歡呼和高唱工人的“馬賽曲”中散會。

在一封寫給恩格斯的信中，我辯明接受這綱領的正當。我承認這綱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對拉薩爾派讓步太多。可是，這已是當時盡力所能做到的一切了；若是我們要求得更多些，那合併勢必不可能，這不僅為敵人所快，還將有損於我們的黨。以後的事就是教育問題了。我的信並未被正確地瞭解。恩格斯嘆惜我們實際上被拉薩爾打敗了，還接受了他們的那些毫無意義的用語，如國家輔助、工資的鐵律等等。他指出我們這個綱領的特性是混亂、不合邏輯、首尾

不貫串，同時整個說來非常可笑。

這就可看得出來，要使在倫敦的兩位老先生滿意並不是容易的事。在我們雖認為是一個很聰明的策略，又是鄭重考慮估計後的結果，他們都只認為是軟弱的。無論如何，主要之點——兩黨合併——是達到了。合併就包含着將來進步發展的萌芽，而這我們以後就可以依靠我們最好的朋友，即我們的敵人了。

二 餘波·我對巴黎公社的態度

當然，即使在統一大會以後，一切也不都是一帆風順的。在黨員內部之間還有着分歧，尤其在漢堡。爲了使得新的統一成爲真正的現實，雙方同意以前分裂的雙方陣營中的著名人物，應到以前對方所獨佔的區域中去開會講演，李卜克內西因此就到北部和西部去周遊了一次，有幾個拉薩爾派的人到南方和薩克森尼來，我則到漢堡和柏林去，向大會演講。

就我個人講，當時的情形實在很難令人滿意。我很爲公共事務與私人生活兩者利益的衝突所苦。由於我適才找到一個商業上的合夥人，萊比錫就盛傳我意欲從政治上退休了。因此就有一個黨裏的朋友寫信來告訴我說，他聽說我就將從事大規模的營業，而逐漸從黨退休了。他要我公開闢謠，我認爲有損我的尊嚴而拒絕了。

一八七五年帝國議會的秋季會期是我缺席約已三年半後的第一次出席。同時，也是我們以一個統一的黨出席的

第一次會議。這種統一使我們更為有力、活躍和獨立。

一個修改刑法的法案提交給帝國議會了，有十四種新的罪名要列入刑事罪。俾斯麥一直是個橫暴的人，他總是急欲用壓制手段摧毀或除掉當時他認為不便或不合意的任何傾向。他用這種方法來對付羅馬天主教會、波蘭民族主義運動和社會民主主義。他從來沒有從他這種觀點改變過來，雖然到他生命的末期，他這樣作是一種錯誤是非常清楚的事。他是個被戰勝者，而不是勝利者。

由於法官、警察並不能壓制我們的運動，他就想用修正刑法中的所謂政治章節來壓制我們。第一百三節的文句修改成：“無論何人，其行為態度足以破壞和平，公開煽動人民各階級間彼此敵對，或以言詞或文字攻擊婚姻、家庭或財產制度者，都應處以徒刑。”其他章節也有類似的修改。我們，就策略着想，讓自由黨人首先攻擊這種修正條文。甚至國家自由黨人也表示反對。一八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在上述的修正條文的辯論時，我們是積極參加的。內政部長尤倫堡伯爵在他的演說詞開頭一段時，坦白地承認說：“先生們：這一節是針對社會民主黨而發的。”他的演說詞的其餘部分引用了許多我們的報紙上的話，想證明我們是國家的一種威脅。他敦促帝國議會通過修正案，不然，當時的法律既已顯見不足，隨時都有“槍發劍刺”的危險。可是，他的演說一點兒影響都未發生，並且使得替我們的黨說話的哈塞爾曼的工作很容易了。他說，我們的黨並未發起階級戰爭，却是我們的敵人開始的，而巴黎公社就可以證明到底他們是用多麼殘忍和血腥的手段來進行這種戰爭的。最後，他

聲明我們將以一切合法手段繼續作戰。這種辯論的結果是政府方面連一個支持法案的人都沒有。我們的報紙熱烈地向尤倫堡伯爵道謝，因為他的演說正可以作為一篇最好的宣傳品，並決定要把它印出來盡可能大量地分發。俾斯麥也並不放棄設法改變當時的情勢。他訴苦說，帝國議會竟然對一個社會主義代表的演說也並不給以嚴重注意。在帝國議會中，對於社會主義者那種烏托邦的無稽之談應當加以反駁，還該把反駁之詞盡可能地廣為宣傳。“巴黎公社那些暗殺者、縱火者，豈不已經在議會中公開地被讚揚過，而就沒有一個代表起來發表發表相反的意見！這種只有在誘惑者的遮光燈的幽暗之下受了蠱惑的人的面前才顯形的幽靈的幻影，應該把它拉到光天化日之下，讓我們指給大家看看他們的這種難於制馭的和充滿罪惡的愚蠢。”

俾斯麥的這種非難只可能是指我而言。他所指的是我在一八七一年開會期間所發表的關於巴黎公社的演說。於是我企圖說話，可是“凡侖丁了”，只許我作個人的解釋。我駁斥他們說我替暗殺者及縱火者辯護的非難，我認為這是一種侮辱。我過去所以替那些人辯護，正因為他們不是暗殺者和縱火者，而是深受冤屈的人。豈不是三個非常受人尊敬的國家，瑞士、比利時和大不列顛，正因基於他們並非罪犯的理由而拒絕引渡麼？說到這裏，我被議長打斷了，他不許我再說下去，因為我所說的已出乎我個人解釋範圍以外，而涉及見解的問題了。可是，後來我到底報復了，那是在萊比錫的一次大會上，我傾吐出了心中的一切。

一八七六年三月十二日在萊比錫安排好了一次國家自

由黨的萊比錫主要鼓動者布魯諾·斯拜力格與我之間的關於這個問題的辯論。這次會議由雙方聯合召開。兩黨各得相同數目的入場券，一方面的人在演講時，由對方的人擔任主席。對方攻擊我對巴黎公社所取的態度，理由還是以前說過的那些。我演說了大概有一小時半，並以下列結論結束：

“按當時的情勢，巴黎公社作的實在是它不得不作的，即使對它的行事不以爲然的人至少也應該覺得這些行爲是可以解釋並可以原諒的。至少這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巴黎公社決未做任何可恥的事，若是它會有任何激烈的行動，那麼歷來歐洲的帝王專制政府處在相同地位所做的事，會比它更厲害一百倍。”

在答辯時，對方說了好些與這事無關的按語，我便說：

“斯拜力格說，只要社會民主主義一天服從國際主義這種幻覺，他的黨決定一天不與它來往。好吧，我們沒有他的同情也可以。可是，國際主義究竟是否是一種幻覺呢？從家庭發展成部落，從部落到部族，更進而到民族國家，最後從國家之間的密切聯合發展而成國際主義。這是歷史演進的過程。社會民主主義採取了博愛的立場，反對國家間的戰爭和敵愾，努力謀求團結各個國家以促進和平與文明——由於這些，社會民主主義是代表了人類可能想像得到的文明的最高理想。

當今日我們的黨由於我們反對一種狹隘的民族立場，由於我們決心反對種族仇恨，並高舉民族博愛的理想而遭受侮辱時，我們的黨所遭受的正是一切先驅者所遭受的命運。諸位先生，這裏就是一個例子。在羅

馬天主教統治的國家內，當然關於馬丁路德是一無所知的。

世界上所有代表進步的黨派都曾忍受過這種相同的命運。過去，自由主義者的命運是這樣的。可是，今天，自由黨是上升了；它認為現在的世界已無可再好了，而它對待我們這些與它持着不同目的的人的態度，就好像不到二十年前，封建黨派對待他們自己的態度一樣。這也是很自然的。

對於這種指責，我們並不介意。我們知道我們的時代正在來到了，環境正向着於我們有利的方面發展，隨着階級敵意的消失，隨着中產階級的下層之淪為工資階級，社會民主主義者將更見壯大，最後必獲得最高的權力。”

我的演說結束時，還說到別的黨派對我們的態度。“保守黨與國家自由黨之間的不和恰似夫妻的吵架，只要第三者一插入，他們便和好了。幾星期以前，一張保守黨的報紙有一篇社論警告一切反對社會民主主義的人都該一致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組成一個大黨。好，我恭賀你們，你們須得這樣做才成。在開姆尼斯，保守黨和國家自由黨也吵過架；兩黨各推出了自己的候選人。可是，後來一聽說還有一個社會主義者的候選人時，吵架立刻調解了，大家傳言‘一致對付倍倍爾！’”這次莫大的成功的聚會，就以我這些話作為結束。

附註：倍倍爾為巴黎公社辯護的演說詞是很長的，德文本中載其全文。簡言之，他的論點是：所有許多暴行之發生，都

在公社正式政府成立以前或解散以後。進一步說，若有暴行，也是出於自衛，迫於需要，並且實際上已入戰爭狀態，那時，它本身的存在已受凡爾賽的軍隊的威脅了。

雷孔旦將軍及克萊芒·安瑪將軍之槍斃，並非出於公社政府的命令——那時尚未組成——而是叛變的軍隊作的。再者，槍斃人質及焚燬財政部，亦非出於公社政府的命令。倍倍爾特別為范瑞及勞爾·黎高辯護。另一方面，他盛讚公社倡導的許多措施，如廢止烤房的夜工，政教分離及減低官員薪金等事。

三 更多次的起訴

雖然遭受許多次的起訴，我們的黨還是處在非常良好的狀態，並活躍地準備着下次的帝國議會競選，它是在一八七七年一月就要召開的。我們在柏林的同志創立了一張自己的報紙“柏林自由報”，很快便贏得了友人與敵人一致的重視。不久便出現了德意志帝國一般政策改變的第一個跡象。首先是隨着政府中主張自由貿易的馮·寶爾勃呂克的免職，政府突然轉而採取保護政策了。接着另外一個部長馮·開恩潑好森不久也下野了，他在幾星期前還說減低工資作為克服工業危機的手段是正當的，並曾為激進主張自由貿易的尤勤·黎許脫稱譽為有胆量敢說不得人心的真理的人。

當時還有更多的起訴案件，尤其是誹謗首相案。俾斯麥通常有膠版印好的誹謗罪控訴案稿準備着（有一個時期簡直是成堆的），只要檢查官要告發某人，他就有一份立時

可以取用。他不斷地提出這種控訴，一直到他一八九〇年去職時爲止。起訴案的數目是可觀的——論千數的——這就大大增加了監獄中的人口。這些案件當然不是他寬宏大量的證明，就連他的最熱烈的崇拜者也都不贊成他這種作爲。

戴森道夫還繼續不斷地提出他的起訴書。他解散全德意志勞工聯合會時曾揚言：“讓我們來摧毀社會主義的組織，那麼社會黨就不能存在了！”他對這個運動的真正意義竟無知到如此程度。他的下一次的攻擊指向社會勞工黨。他得到了柏林法庭的一紙裁決書，就是限制這黨在柏林及普魯士全境的黨員名額。黨的執行委員會便勸告黨員不可灰心。這樣被摧毀的黨的部分可由地方的組織來代替（名義上是獨立的）這樣做，黨報的銷路和收得的款項反而比以前的組織得到的增加了不少。

這樣，正式的一黨的大會勢必不能舉行了，大家便同意召開一次社會主義者全體大會，爲了要使我們普魯士的同志們可以捐獻黨費而不觸犯法律起見，乃發行一種篇幅僅及手掌大小的月刊，名叫“選舉人”，以兩辨士一份的定價出售，這對於黨的經費有了良好的效果。

被囚了二十六個月，慕斯脫從柏林附近的普勞贊西監獄釋放出來了。他寫了一本小冊子，書名“普勞贊西地方的巴士的獄”，講述他的經歷，並敘述他如何與其他獄囚欺瞞監獄當局來設法使自己舒服些。這事做得很不慎重，結果是官方來了一次調查，因而使獄囚受的待遇更嚴厲了。政治犯是關在“蒙面區”的，所以叫作“蒙面區”是因爲在規定

散步的時候，犯人們都必須戴着黑色的面具，免得有人認出他們。這種種的磨難與懲罰實在太多了，以致後來它們簡直不能引起什麼激動；每一個社會主義黨報紙的編輯和鼓動者都明白，隨時關進監獄已是他的職業的組成要素了。那時候，我跟喬格·馮·伏爾瑪（後來是巴伐利亞社會黨的領袖）通了許多信。馮·伏爾瑪是一個退休軍官，他在普法戰爭中受了傷；他深感不安，只怕爲了好多把他牽涉在內的起訴案件會失去他的養老金，便來跟我商量。我的律師弗拉泰格（我在萊比錫受審時是由他辯護的）也不能肯定地回答這個問題，只能勸他以後寫文章要十分小心。

另一方面，我們對於迫害者之一却有了小小的報復。不倫瑞克最高法院判罰伏格爾·馮·馥爾根斯坦因將軍（他在一八七一年逮捕了我們的執行委員會，並把他們解往魯鎮）應當付相當多的數額的賠償：付給勃魯克一百零五鎊，付給其餘的人五鎊五先令，還付一個人每天七先令六辨士，並付給工人珂則每天三先令。

四 一八七六年哥達的黨大會

黨的第六次大會在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於哥達舉行。官方的“北德意志通報”大聲叫囂，恐嚇着要提出控訴，認爲大會是規避了法律的禁止。可是我們並不介意這些，只決定用種種方法使得對我們的打擊不能發生作用。

大會出席代表共九十八位，代表了二百九十一個地區
的三萬八千二百五十四名黨員。黨的預算案是五萬三千九

百七十三馬克(收入約二千六百九十八鎊,支出約二千七百二十一鎊),稍有赤字,由這一章前面提到的,銷售“選舉人”的贏餘來彌補了。這時候,黨有着二十三種報紙,其中八種是日刊。爲表示國際的團結,決定以適當的方法搜集款項來幫助在患難中的巴黎公社社員。從辯論上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來黨內在人事與黨的事務方面,仍有着顯然的歧見。以前是拉薩爾派的福祿姆,指責有幾張本黨報紙,還有李卜克內西與我自己,都從激進民主黨的“法蘭克福報”的主持人宋納曼那裏接受過金錢的幫助。我便向大會說明,在我被囚時期內,爲了商業上的需要,我向宋納曼借得一筆九十鎊的借款,利率五釐,分期付款。我說明這件事完全是私人性質的,我與宋納曼從一八六六年起就已經是朋友更足以說明這件事。一個認定我完全無過錯的動議也就通過了。就在這年內我把債款付清了。

還有另一件關於黨機關報的討論;末了,由少數黨決定,萊比錫的“人民國家”應成爲黨的機關報,名稱應改爲“前進”。李卜克內西任主筆。

這是大會第一次從事於當時經濟問題的討論。從一八七四年開始的工業危機,竟一年比一年嚴重,引起了工業界自由貿易與保護貿易政策的徹底改變。最後,連數十年來一直是自由貿易政策的主要辯護者的地主們也改變過來了。起先,主要的是鋼鐵工業方面,反對廢除自一八七七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鐵的進口稅。別的工業,尤其是紡織業,與它聯合了。另外還由於美國穀類的競爭愈來愈可觀,穀類的價格竟不能維持了。東普魯士的大地主們,他們本來因美

國產品的競爭，失掉了出口市場，現在竟連國內的市場都遭受到同樣的競爭，就也倒到保護貿易主義者那邊去了。這種主張上的劇變自然侵入到黨內來的，有些黨員——如奧藹爾及其他的人——主張完全的保護貿易政策。大會不得不表示它的意見，對這件事便發表了這樣一個頗不健全又不能使人滿意的決議案：“德意志的社會主義者對有產階級間發生的自由貿易政策與保護貿易政策的爭執並不發生興趣。這問題只是一個對策的問題，是按每一件事上的利害得失而決定的對策問題：工人階級的痛苦，其根源乃在整個的一般經濟情況中。可是目前的商業條約既不利於德意志的工業，便須修改。黨的報紙一定要預先警告工人們，勿去為資產階級火中取栗，他們在保護貿易政策的外衣之下，却想攫取政權以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

當時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俾斯麥計劃的鐵路國有問題。大會贊成國有，可是反對由帝國拿去，因為它得去後，鐵路便將專為那些貴族和軍國主義者國家的利益而服務了；這筆財政收入就將浪費在不生產的消費上，因此帝國就會得到更多的力量——一種反民主的力量；屬於全民族的大量金錢將落入證券市場投機者手中去了。

附註：按大會的意見鐵道應歸屬聯邦各國，而不歸屬帝國。

五 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七年的競選運動

爲了備競選運動之用，我又像以前那樣寫了一本小冊

子，由合作的印刷工人排印，在柏林就當戴森道夫的面發行；他是不肯放過這機會來得到好處，這是他以後使我們知道的。

我非常活躍地參加了競選，從萊比錫到科倫，再從科倫到東部邊境的哥尼斯堡，並且到布勒斯勞，到處向聽衆擁擠的大會演說。在萊比錫的一次集會中我講到“在今日國家中的婦女地位與社會主義”。雖然我們用的是最大的會場，可是仍有許多人因沒有地方而不能參加。聽衆中有許多婦女，我解釋給她們聽，她們應當以最大的興趣注意這次選舉，雖然至今她們還沒有選舉權，她們却可做宣傳工作，敦促她們的丈夫及男性的親屬去投票，還要使他們投社會主義者的票，因為這是唯一主張男女在政治、社會各方面完全平等的政黨。這次聚會是一大成功；這是第一次請婦女參加競選運動。

我仍是我的老選區格拉格—彌倫的候選人，同時也是德累斯登的候選人。在我從前的選區內，我正像大家所預料地一選便選上了。在德累斯登却進入了第二次投票，與一個自由黨人競爭。這一次我以一萬零八百三十七票對九千九百七十票勝利了，我選擇作德累斯登的代表。當時，我寫了一封信給一個朋友道：“這情形使我想起，就在十四年前的今天，我是一個覓工作的職工，出發到各處流浪；現在，我是代表王室居地德累斯登的議員。改一下拿破崙的一句話來說：‘現在，每個在路上來去的工匠在他的背包裏都會有議員的委任書。’我們是在進步，謝謝我們的敵人朋友。”

這次競選對我們非常有利。一共有十二個社會主義者

當選。我們的黨所得的票數自一八七四年的三十五萬一千六百七十票到一八七六年的四十九萬三千四百四十七票，那就是說增加了十四萬一千七百七十七票，或是說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的票數。

在薩克森尼，我們的黨得了最大部分的票數——三十一萬八千七百四十票中得了十二萬四千六百票。

“戴森道夫制度”成爲徹底的失敗。雖然對我們的黨與報紙提出的起訴愈來愈猛烈，法庭對我們的判決也愈來愈嚴酷，可是他們什麼效果也沒得到。而俾斯麥乘環境有利於他的時候，勸誘帝國議會所通過的最嚴酷的壓制措施（這些措施是他謀劃已久要用來對付他又怕又恨的政黨的武器），也不見得更爲成功。

一八七七年的帝國議會用了大部分時間在社會問題上。中央黨[⊙]對於社會民主黨的票數這樣一直增加感到恐慌，便開始作社會改革的提議，在這段過程中，它就像一個人不得不蒙上了眼睛而在一排排雞蛋間跳舞一樣。在我們有這些成就以前，中央黨對社會問題的態度是頗爲否定的。現在，中央黨提出的措施是意圖改進小商人與工人的狀況。一位黨內的朋友幫着我針對中央黨擬具出另一種措施。我提出了監獄中所做的工作應只限於替政府做的工作；工廠內禁止星期日作工；不然每星期必有一天休息日；通常工作限每天九小時，女工及十八歲以下男工限八小時；禁止夜工，若事實上不得不如此則必須八小時一換班；女工分娩前

⊙ 中央黨的票數有賴於下層中產階級及一部分工人。

後的休養期延長；每一工廠或手工廠內都有勞資雙方協訂的一份規則；取消礦工的“工作簿”，品行證明書只限於工人自己要求時才評給。解僱通知期勞資雙方一律相同，禁止實物工資制，加強防止意外事件，設立勞動局與勞工法院；由帝國衛生總署下設立帝國勞動視察局；最後，要求保障及進一步擴展工人集會的權利。中央黨提出的措施與我們所提的措施之間的辯論變成了關於社會主義的辯論。我得到機會有力地駁斥一向針對我們的責難，並且批評中央黨應當受批評的那一種所謂“基督教”的立場。我的演說造成一個深刻的印象，萊比錫的印刷業工會送給我一份裝訂得很精美的這篇演說辭。自然這些辯論並無實際的結果。關於鐵的進口稅問題，物雷克發表了一次很好的演說，其中他說到了自由貿易政策與保護貿易政策的問題；可是本黨投的票也分成兩派，有少數人要求有進口稅。

戴森道夫爲了我上面提到的競選時的小冊子又對我提出起訴。可是，帝國議會的大多數通過一件提案，在議會會期內停止控訴。警察到“柏林自由報”報館去搜查時，却見到只有十二本剩下了。

六 一八七七年的哥達大會·選進 薩克森議會·“未來”報

和去年一樣，社會主義者的帝國議會代表自五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哥達開了一次德意志社會主義者全體大會。由於集會結社法的限制，這大會不能稱爲黨的大會。

在奧邁爾對大會所作的報告中，說到本黨在三百九十七個選舉區中提出了一百七十五個候選人。黨的報紙有四十一種，有十四個黨的印刷機構。收入達二千七百鎊，支出為二千五百三十一鎊。大會採用了下面的決議案：

“由於普魯士執政當局以史無前例的厚顏，對社會主義的組織予以公然地不顧正義的待遇的結果，本大會已不再準備建立黨的組織，因為這會算成違反普魯士的結社法。不過大會建議黨員們組織合於當地情況的地方組織。”

我們得注意的是所有自由黨的報紙，甚至其中的激進派，對於為反對社會主義的組織而實施的種種干擾、瑣碎的起訴和暴力，連一個抗議的字都不提。當局便認為這種毫無批評的情形是一種贊同，並繼續共政策。

當時發生了幾件不愉快的爭執；一件是關於哈塞爾曼同志的，他創辦了一張與“前進”競爭的報紙“紅旗”，是他自己出資的，這報與我們以頗大的損害，並且它似乎是特意用來分裂我們的黨的。大會便要求把他這張報紙停刊。

另一件討論是關於弗利德里赫·恩格斯攻擊杜林教授的一系列的文。這些文章登在“前進”上。杜林教授曾劇烈地攻擊現狀而聲稱贊成共產主義。他對於柏林的我們的黨有很深的影響，我的意見認為他的作品是可以為了黨的利益而介紹出來並加以利用的。一八七四年，我在監獄中的時候，伯恩施坦曾把杜林的書送給我。我還曾發表了兩篇關於他和他的書的文章在“前進”上，題目是“一個新的共產黨員”。一八七七年六月，當杜林因他的學說受到大學當

局的非難，最後並被解聘的時候，他對我們的影響更大了。大會便採取決議禁止“前進”刊登恩格斯攻擊杜林的那種性質的文章。誠然，後來這位教授成爲這樣一個專制者而失盡了他對我們黨的影響；他是如此傲慢自大，以致擁護他的人都一個個地離開他了。

馮·伏爾瑪提議我們該派代表到根脫去出席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以表示世界各國社會主義者的團結一致。雖然李卜克內西已經警告過大會有一種很大的危險，就是那時在比利時正發展到頂點的巴枯寧無政府主義者運動定會企圖操縱這次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的，我們還是決定了派遣一個代表。但是沒有一個人去，因爲正當這時，黨正忙着別的更重要的內部事件。

一八七七年，我們第一次做到使我們的一個黨員選進了薩克森議會。李卜克內西代表了萊比錫區，本來這一席曾提出給我，我推却了；我不大能希望我的商業上的夥伴肯放我去出席薩克森議會，就如他不會願意放我去出席帝國議會一樣。選舉完畢後才發覺李卜克內西還缺少着必需在薩克森居住滿三年的條件，不能取得這議席，因此又第二次選舉，這次選上的就是曾做我辯護律師的那位鄂圖·弗拉泰格。

柏林又出了一種周刊“未來”。這是由法蘭克福一個銀行家的兒子卡爾·霍吉堡出資經營的。霍吉堡之參加這運動，我也許可以這樣說，他是出於情感主義的動機；愛德華·伯恩施坦辭掉了他在柏林銀行中的位置，來做他的秘書。這份刊物對於馬克思與恩格斯所闡明的科學的社會主義，頗

顯游移的態度——它滿欄紛陳了成爲我們的運動特色的各種不同意見的潮流——一開頭，就引起了“倫敦兩位老人”的疑心；到後來，事勢的進展及我們的黨的經濟方面的困難逼得我們去接受霍吉堡的經濟協助時，更加深了他們的懷疑。馬克思與恩格斯，因爲他們距我們太遠，因此對人與對事，勢很難有正確的看法，以致把霍吉堡方面這樣巨大的犧牲當作馬基維利式的權謀，以爲他要陷害我們的黨，並使它離開它真正的目的。他們是完全錯了的。霍吉堡從未提出過什麼條件；他毫無限制的撥款，因爲他衷心爲着我們主義的利益，也從來沒有事不跟我或別的朋友商量的。但是爲了祛除疑慮，伯恩施坦與我在一八八〇年歲暮取道到倫敦去，這事後來很著名，稱爲我們的“往喀拿薩的朝拜”[⊖]。這事我留到下一章再講。

我自己爲“未來”報寫了好幾篇文章，中間有一篇論“比例代表制”，這題目當時在我們黨內還很少談起。我對這個問題的論述，我們的老朋友卡爾·堡克里不贊同，他那時主張瑞士的那種制度。但是，後來我可安心的是一九〇一年在他死前不久我在沮利克碰到他時，聽見他親口說——那時他已七十九歲——他承認我是對的。

七 入獄時機又成熟了

一八七七年六月十二日，我出現在臭名遠揚的柏林第

⊖ 喀拿薩，意大利的一個城市，以神聖羅馬皇帝亨利四世於一〇七七年在此向教皇格利高瑞七世請罪事著名。——譯者

七法庭之前。戴森道夫在我的小冊子中除了找出對俾斯麥有不下於三次的誹謗外，還認為我觸犯了刑法的第一百三十一條——就是，我故意傳播虛構的和使人迷惑的事實，以使現行制度顯得很可憎惡。俾斯麥當然十分願意地向提起公訴的舉動表示同意。我當然在我的小冊子內對待首相的態度不是很好的。不過，我當時寫的時候是在非常憤怒中，因為帝國議會不讓我答辯俾斯麥極盡侮辱之能事的攻擊，半途截斷了我的演說。所謂觸犯了第一百三十一條刑法是指我攻擊軍國主義的態度。但是，說這種意見是虛構的或使人迷惑的，如第一百三十一條所指的，我却覺得是對我個人的侮辱。這些意見是我一向的主張；我所寫的是我的立場及信念的誠實的表明。

檢察官戴森道夫把這件事看得很簡單。他對法庭的情形很熟悉，他非常冷靜地在不過五分鐘的談話中，提出誹謗首相罪該判九個月的監禁，重犯該判五個月，合併起來可減為一年。

他的這種淡漠的態度更增加我的憤怒。我自己辯護，講了一小時半的話。我尤其反對的是引用第一百三十一條，因為，我明確地說明，法庭一定得清楚地知道我對軍國主義的攻擊決不是虛構和有意迷惑人的，而是符合於我們的黨的立場和我個人的信念的，並且有所引用的科學與軍事權威的話作證據。

我想我這次演說得很好。但如果沒有法庭外面的風暴（這風暴比我的雄辯更佔據他們的注意力），我的演說也未能給法官什麼印象。法庭判我九個月。我向高等法院上

訴。檢察官訴請認可地方法院的判決，尤其因為我已是重犯。這次我又由自己來辯護，演說長達一小時，猛烈地反對檢察官的抗辯說我是再犯罪犯，爲了這一點該從嚴處罰。我說：“政治犯不該與普通罪犯相提並論。一個政治犯，即使是再犯，乃是出於理想主義的動機而行動的，因此不該得加重的懲罰，反而該得嘉許，因爲他的行動乃是出於他的信念。”結果是關於第一百三十一條的起訴罪撤消，爲了誹謗俾斯麥判處六個月。

我要加上一句，就在幾個月後，那個保守派社會改革者魯道爾夫·梅耶博士也被這同一法庭爲誹謗罪判了一年的監禁，但是那個檢察官很虔誠地希望這是俾斯麥的最後一次訴訟。可是，這種訴訟在俾斯麥任首相的時候一直繼續了下去——那就是說還繼續了十三年。

爲求距我的家庭及營業可以近些，我請求當局允許我後五個月的日子能關在萊比錫監獄裏。當我到第七法庭庭長那邊去時，我非常驚詫，竟受到非常客氣的接待。我的請求很容易地就批准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我被送到普勞贊西去度過我第一個月的監禁，這是柏林附近的一所監獄，大多數的政治犯都關在那裏。他們允許我從事寫作，並可在囚室內用燈火到晚上十時。但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別的社會主義作品却被沒收了一一好像我還沒有完全受這些作品的腐化呢！檢察官規定我不能把全部時間都用在讀書上，而應該至少拿出東西來證明我確實是在竭誠用功的。於是我便寫一本小冊子，書名是“十八世紀的法國”。

我們不許從外面買食物進來，只能吃普通的囚糧。這食物之所以令人幾乎難於忍受，就是因為食物樣數非常有限。每星期的菜單，早餐、午餐、晚餐完全是一樣的，沒有一絲變化。我在普勞贊西二個月內體重大為減輕。我不懂監獄內的醫生怎能認可食物這樣無變化。後來那醫生因我自己的請求允許我吃所謂的“病號飯”。結果，我每星期有三次可以得到一碗頗好的肉湯和一小片串在木叉條上的肉片，因為囚犯是不准用刀與叉的。肉湯裏那一小片肉，綽號“麻雀”，因為大小和形狀像一隻去了毛的麻雀。

我原希望我在聖誕節前能移到萊比錫，並與我的家人一同度過這個節日。到現在為止，我的小女兒所過的八個聖誕節中，我倒有四個是在監獄中度過的。我的請求的回答是那邊監獄所有的地方都滿了。我得等着，直到一八七八年一月十八日我才到了萊比錫。

在普勞贊西監獄中時，監獄中的牧師來看了我幾次。我還從“伏斯報”（這種報紙是讓我看的，每週末六張一起送來）上知道，那時慕斯脫在柏林開始一種運動，贊成跟國教（福音教派）教會更進一步分裂。他的集會擠滿了人，都非常興奮。當宮廷牧師斯多格不久以前所創立的基督教社會黨召開反對的集會，或派演說的人到慕斯脫的集會上去時，興奮的情緒更高漲了，在那種場合，在聽眾的一致歡呼聲中，派去演說的人自然得到最壞的結果。這種鼓動宣傳大大地激起了正統派信徒的騷動，我們的牧師大為興奮。甚至老皇帝威廉在議會議長代表議會向他賀壽時，他的回答中也提及了這件事，他說：“人民的宗教是一定要保持的。”

八 內政·在萊比錫監獄中

我在監獄中的時候，有些非常重要的事顯露出來了。我們在柏林的同志，因為他們的組織被警察解散了，便另外組織了一個團體來保護工人階級的利益。那些基督教保守派國家社會主義者辦了一種周刊“國家社會主義者”，撰稿人有歌弗爾、馮·希爾、阿道爾夫·華蓋納、薩姆脫這些大學教授和其他的人。這些新教的社會改革者們急欲與羅馬天主教改革者並肩地努力，盡可能地把現在還可能拯救出來的工人們自社會民主主義那裏拯救出來。

已經臨近的帝國賦稅政策的革命，以更大的步伐前進了。各聯邦國家對帝國財政預算的直接賦稅愈來愈難徵收了。俾斯麥痛恨直接稅。在一八七六年他發表的一篇演說詞中，對於他所認為理想的稅收方法曾說了下列這些話：

“我要向議會確鑿地說一下，我對於間接稅（爲了帝國）有一種堅決的偏愛；我認爲直接稅是一種苛刻的和粗陋的權宜之計，唯一的例外恐怕只有——我試這樣稱呼一下——潔行稅（一種由於身分的自覺而使人願付的稅），這種稅我是要永遠維持的：我所指的就是那種加之於富人——那是指真正富裕的人——身上的所得稅。我是切望加重煙草稅的，雖然我並不以爲吸用煙草有什麼不對之處（俾斯麥本人煙癮極重）。同一的原則還可應用及啤酒、酒類、糖、石蠟及其他各種重要的消費品，這種東西，可以這樣說，是大部分人民的

奢侈品。”

或許可以這樣希望，俾斯麥可能靠着自由黨人的幫助，用這些稅收來供給帝國日見增長的需要。他那時正與保守派有着爭執，還沒有與中央黨重新和解。因此，他設法與國家自由黨去接近，並且提出在內閣給他們的領袖一個職位。但是，這個建議失敗了，國家自由黨要取得不推行反動政策的担保，而這是俾斯麥不能給的。他為這次的拒絕始終未肯饒恕他們。

大約就在這時候，柏林發生了兩件給人深刻印象的事件。柏林合作印刷所的經理奧古斯特·海恩希死了。他不是一個大演說家，却是一個最傑出的組織者，並得到柏林工人階級最大的信任。他的葬禮是以前柏林從未有過的盛大的社會民主示威運動。這次遊行有最完整的秩序與紀律，這給我們的敵人以很深的印象。“克拉特拉達希”報[⊖]甚至以一首詩稱讚這事。

幾星期以後，柏林又有一次葬禮，這次甚至比上次給人印象更深。“柏林自由報”的負責編輯保羅·賽脫勒因肺病死了。然而由於有關情勢竟引起一陣憤怒，如風暴般掃過我們在柏林的黨和全德意志。原來他因不敬罪和別的事被判監禁二十一個月，但已經提出上訴。他由於健康狀態請求釋放。經過幾個星期的拖延，直到他死前不久，才被送進柏林醫院的囚犯病室去。不久，他便死了，他的送葬行列便是對他所受的待遇的激烈的抗議。羣衆再度震驚了並且嚇倒

⊖ 即柏林“笨拙報”，是極富於政治性的，且更能痛下針砭。

了資產階級。“麥格德堡報”(一張國家自由黨的報紙)那時寫道：

“看見了這次送葬的行列，誰會再說勞工的‘隊伍’？這是許多團、旅、師，不，整個的軍團來向他致最後的敬禮，他爲了主義所作的努力確確實實該得到這種尊敬。”

從此以後，柏林又有許多次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葬禮，一次比一次有更廣大的羣衆參加，他們高呼着“彌尼，提客勒，烏法耳新”(Mene, Tekel, Upharsin)的口號，叫進了資產階級的耳朵裏。

帝國議會在一八七八年四月六日集會。我在獄中，請求釋放我，但未被允許。有一次辯論到社會主義者及他們的所作所爲的時候——這種辯論是時常有的——俾斯麥竟無聊到開玩笑地說，他很願意在普魯士所屬的波蘭區讓出些地方給我作社會主義的試驗。我很懊惱當時不在場，而不能適當地回答他這種玩笑。

我利用在監獄中的閒暇爲“前進”寫一篇文章，主張創立一所黨的圖書館；這計劃後來實行的，不過是很久以後了。我完成了我的那本“婦女與社會主義”，它的第一版於次年發行。我還寫了一本小冊子論及“帝國衛生總署”，裏面我討論到社會衛生問題，以爲衛生總署若欲名副其實便該解決這些問題。

我還得到機會能多少改善些我的監獄同伴的境遇。我從與我的獄卒的私人談話中，知道監獄監督竟因出賣食品與飲料給手上有錢的犯人而發了財；還有剋扣肥皂與手巾

並得其他非法贏利的事。我便立刻寫了一封信向法院院長申訴，他是有權管轄監獄的。我寫信的口氣就好像我是一個剛剛出獄的犯人。當然，這信是匿名的。下一次我的妻子來看我時，我便設法塞了一小張字條到她手中，叫她明天準九時半打我囚室的窗戶所面臨的街上走過。那時我要丟一封信給她，她該找人重抄一遍，送給監獄總管。一切都照我計劃的實行了。幾天以後，那個獄卒很興奮地告訴我，監獄總管突然地到監獄裏來視察，還非常激烈地和監督吵鬧了一場。他向他讀出過去的一個囚犯來信的節錄，監督只得立刻命令獄卒把事改正過來。當然，我沒有把我的秘密洩露出來。

第十九章

執行反社會主義者法律的前夕

一 謀刺皇帝及其後果

五月十二日消息傳到我的囚室中——這是一個使我極度震驚的消息——就是前一天午後三時，有個萊比錫人，名叫賀台爾的社會民主黨人，謀刺老皇帝；但皇帝逃脫了並未受傷。起先，這事對我完全是個謎。我記得賀台爾這個名字，別稱雷曼。一年前，他已在黨的圈子內聞名了——我個人並不認識他——他正沒有工作，也許他也不要有任何工作（他的行業是錫匠），他從事銷售我們本地的黨的機關報“火炬”和別的社會主義書籍。但是後來發現他是個騙子。他竊用了收到的錢，被管理部門解僱了；這是四月五日的事。萊比錫的黨員們決計將他開除黨籍，並且就在五月九日的“前進報”上公佈了將他開除的事。

他被解僱以後，便向萊比錫日報和國家自由黨的代理人斯拜力格去求援，並捏造與誇大一大串反對我們黨的事實，把它們出賣給他們，而他們便利用這些來反對我們。於是他們便出錢送他到柏林。在柏林，他兩邊都利用；他參加了一個社會民主黨的會社，同時又加入了斯多格的基督教

社會黨，當時，這個黨正大開門地招收好些搗亂陰謀之徒，其中有一個裁縫格倫堡，他曾因欺詐被慕尼黑和斯圖加特的黨開除。格倫堡說努畢林博士，就是第二次謀刺皇帝的人，也是基督教社會黨的黨員。在柏林，賀台爾仍零售社會民主黨及基督教社會黨的報紙與書籍。當被捕時，發現他身上有李卜克內西和慕斯脫的照片，那是他經常出售的。

俾斯麥一得到賀台爾謀刺皇帝的消息，立刻發電報到柏林：“用壓制條例，對付社會主義者。”這就是他久已切望的對他所痛恨的黨派下致命的一擊。然而，社會及新聞界對這消息起初頗見冷淡；等後來有些報紙指責社會民主黨人該對這次行刺負責時，半官方的“漢堡通訊”便立論說過去七十八年之間，有過許多次謀刺聞名的人的事，却是出於許多不同黨派的人。要把政治暗殺的罪名硬安在社會民主黨人身上是不公平的。

賀台爾在受審訊的時候，否認行刺；他原來的真正意圖是自殺。他被捕時身無分文，而他用的那把手槍簡直是件廢物，據專家鑑定那槍發射不到幾碼遠。查出來賀台爾是私生子，所受教育尤差。他的頭腦中充滿了“聖經”與“教義問答”的詞句，却不能寫出一句正確的句子。他的笑是白癡的那種笑；他走進法庭及聞判死刑時都是笑着的。調查出來，他自少年時起就是一個說謊的人，還做賊。他的全部行爲都是墮落的人的行爲。可是他還是被判了死刑，而由於這樣一個人，德意志社會民主黨却受到迫害！

二 第一次“特殊條例”或稱壓制條例

俾斯麥要有一套對付社會主義者的壓制條例的願望很快便被併入議案了。這個議案五月二十日送達帝國議會，並定於五月二十三日進行辯論。

國家自由黨人感到很不安。普魯士內閣已因自由黨人的各部長盡被排除而成爲一反動團體。這議案包括六項，具體地把下列限制加於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傾向之會社及書籍可由聯邦會議[⊖]予以禁止，但此項禁止應於帝國議會開會時立即通知，因帝國議會之要求即須取消。授權警察得臨時禁止該項書籍於街頭，廣場，或其他公共場所出售。此項禁止如於四星期內未經聯邦會議正式公佈，應即取消。集會之禁止及解散權全歸諸警察，不得上訴。違犯此項禁令者應處以五年以下的監禁。印刷品可不經司法裁決即予以沒收。被公告禁止的會社的會長與此種集會之發起人及主席以及出賃此種集會場所之主人應處三月以上之監禁。此項法律有效期限爲三年。

想到我們的黨在帝國議會中一定會激烈攻擊這些措施，我就從監獄中寫信給他們說：“爲我們這方面說話的黨員應該考慮到他的演說詞會成千成萬份地散發出去；還可能被用作競選的小冊子的，因爲倘若這法案不得通過，帝國

⊖ 聯邦會議(Bundesrat)，代表德意志內各邦的政府；其代表五十八人由各政府指派。

議會會被解散。因此，一切用來反對賀台爾的話須得小心考慮過，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經過長久的考慮後，黨決定不參加辯論；而只發表一篇正式的宣言，這篇宣言由李卜克內西宣佈，大意如下：“這種企圖——甚至在司法審訊尚未結束以前，就想利用一個瘋子的行爲作為藉口來實行一個早已計劃好的反動陰謀，並硬把一件未被證實的謀刺德意志皇帝案的‘道義上的責任’加在一個黨的身上，這個黨反對任何性質的謀殺，並且認為經濟與政治的發展並不依賴某些個人的意志——在一切無偏見的人民的 eyes 中，恰表明了他本身的罪惡；這樣，我們這些德意志社會民主黨的選舉人的代表，迫於必要乃作下列的宣告：

我們認為參加現在提交帝國議會的這件越乎常規的法案的辯論是損及我們的尊嚴的，並且我們決不容許我們的決定被任何一方面來的挑撥所搖動。不過我們仍將參加實際的表決，因為我們認為我們的責任是要以我們的投票來影響決議，以便盡我們的所能來防止人民的自由受到史無前例的破壞。

不論帝國議會的決議怎樣，已慣於鬥爭及嘗盡迫害的德意志社會民主黨對即將來臨的迫害與鬥爭將泰然處之，這種自信是由於認識我們的主張的正義性和不可戰勝性而產生的。”

繼李卜克內西以後，國家自由黨的領袖培尼格森接着發言。他作了一篇很好的演說——我想是他的演說中的最好的一篇。他說到當時內閣的不穩定情況。在普魯士，內

關的危機似乎成了一種有經常性的慣例。在把獨裁的權柄付與別人以前，重要的是應該考慮一下應該付與什麼人。他的黨不能同意目前這套“特殊條例”；歷史告訴我們這種法律條例將會引致何種情形，並且決不會生出什麼好結果。他願意把他的黨的助力貢獻出來確保人民的自由與確定的職權，但必須基於施用於所有人的普通法律。當表決時，第一項以二百四十三票對六十票被否決了。中央黨投的是贊成票，國家自由黨中却只有三位教授投贊成票，即培賽勒、馮·涅司脫和馮·脫累歇克。政府至此便沒有更進一步地作，而中止了這項措施。可是內政部長仍催逼警察最嚴酷地使用他們的權力，而這種訓令正是他們求之不得地去服從的。

三 努畢林的謀刺皇帝及其結果 · 一八七八年的選舉

五月底的時候，我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六月二日是星期日，傍晚七點鐘左右，我與家人一同散步回家時律師弗拉泰格的姊妹奔進來，激動地問我們聽到了那個消息沒有。我們住在郊外，消息傳來很慢。我們說不知道，弗拉泰格小姐接下去說：“你可認識努畢林博士？他今天下午用槍射中了皇帝，傷勢很危險。”我好像被雷電擊中一樣說不出話來，可是最後我回答說我從未聽見過他的名字，而想決不會是我們的黨員的。弗拉泰格小姐放心地走了。

第二天早晨我到“前進”的辦公處去，看到一封新聞電

報，也毫未說起努畢林是我們的黨員。我們都覺得很輕鬆，謝天謝地這次我們的黨該不能認為應負責任了。我們中間誰也不認識他；以前誰也沒有聽見過他的名字。我離辦公處出去，但隔了幾分鐘又回來了。第二個電報又發來了，却說努畢林已承認他是一個社會民主黨，並且他還有同謀的人。我們都啞口無言。

後來發現，賀爾夫電報局(德國的半官方通訊社)那方面的記載和別的關於這事的消息是嚴重地歪曲真相的。可是他們作得太好了。那時輿論，本來已因六月一日德國海軍當時最大的一隻艦船“大公號”互相碰撞後，竟在大白天距英國海岸不遠的地方，帶着五百船員一同沉沒的事，激動異常，再加這次謀刺的事，便升到白熱化的程度了。

俾斯麥高興了；他袋中已有了解散帝國議會的辦法，他希望，選舉以後，他便可有聽他支配的多數票，來通過他的特殊辦法和保護貿易政策。

努畢林從面臨以“菩提樹下街”知名的一個窗口向皇帝射擊。接着他曾圖自殺，却被一個衝進他房間的官員砍倒而未成功。有一個時期他完全失去知覺，無法審問。已確知的事實是他曾在萊比錫學農業科學，而在般恩鮑博士的班上辯論時，顯出他是我們最可畏的反對者之一。在德累斯登情形也一樣，他去上蒲曼脫教授的課，而這位教授明言他是我們的仇敵。在德累斯登，他在公共集會上攻擊我們，因此為我們的黨員如伏爾瑪所認識。我們的黨員在回答法庭提出的問題中，講到他時認為他是一個完全不足道的愚人。他對於我們的黨甚至比賀台爾更少有關係。有的人想

他的謀刺是被報紙對待賀台爾那種態度引起來的。認為勞畢林是個墮落的人的這種意見是廣泛地被承認的；甚至法官也向一個主筆這樣表示過：“報紙上描繪出的勞畢林的形象是很不真實的；他決不是有智力的人；他甚至比賀台爾還愚蠢。”當九月十日勞畢林死在監獄中時，還沒有找出最小的證據以證明他跟我們的黨曾有過一絲聯系，或我們的黨曾直接或間接地影響過他的行動。

可是在那些只求煽惑社會來敵對我們的人和那些決意犧牲一切利用這兩次謀刺以推動壓制條例的人，這些確實的事實是不存在的。俾斯麥利用他對新聞界的有力影響，以便驅策社會瘋狂地仇恨社會民主黨。別的有興趣於擊敗我們的黨的人也參加了進去，尤其是大多數僱主們。從此我們的反對者說到我們，便不用其他稱呼，只稱為暗殺者的黨，或“毀滅一切”的黨，這個黨希望剝奪羣衆對於上帝、君主政體、家庭、婚姻與財產的信仰。與這黨搏鬥，若可能便撲滅它，在他們看來是最崇高的榮譽。千千萬萬被人知道是社會民主黨員的工人立即被開除了。報紙的廣告欄中登載着工人簽名的宣言，表明他們將來不參加任何社會主義的組織，不買、不讀社會民主黨的報紙，不為社會民主黨的用途捐款。在僱主方面的恐怖主義變得如此兇暴以致我們的報紙不得不告訴黨員，人家要他們在什麼東西上簽字，他們就簽字，可是以後他們仍可以願意怎麼做就怎麼做；因為在這樣的恐怖主義底下，他們是可以不遵守這種誓言的。這種恐怖主義還不止此；愛國的房主通知社會民主黨的房客限期遷出，多少年來一直非常歡迎社會民主黨顧客的飯店

老闆，現在叫他們別再上門來。我們在萊比錫的報紙編輯通常把稿件送到印刷所後順便進某一家酒店喝杯啤酒，現在這店主叫他們不要再進他的門。柏林和其他各處也發生同樣的情形。

但是這些發狂的野性的發作和政治上的瘋狂，尚不能滿足狂熱地進行迫害的“愛國”志士們。一大陣的“不敬罪”的告發，不論真有其事或假造的，都落在我們這些忠實者的頭上。從好些案件中得到證明，告發的人實在出於想報私仇的惡毒企圖。法官們對這些迫害狂也讓步了。他們差不多總是採用法律所規定的最高刑期，直至五年的監禁。

早在七月的時候，激進派的“伏斯報”印出了一張柏林地區以外判決的名單，刑期總數竟達五六百年。綜計兩個月內，五百二十一人被判了八百十二年的監禁。這些人中間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的社會民主黨人。警察的行動，就像在這種情形下總是如此的，好像喪心病狂一樣，對基於最不足信的嫌疑就進行搜查逮捕。那些被捕的人大部分差不多隨即釋放了。

哥達的市議會禁止原來擬定六月召開的社會主義大會在那裏聚集。我們屢次聽人傳言，那些執政者說：“應該把這些社會主義者綁起雙手，擠壓在牆上，等他們起來反叛，便可槍斃他們。”因此“柏林自由報”寫道：“當心！同志們；小心；他們正要槍斃你！”可是差不多所有的社會主義報紙訂戶的數目都增加了——例如“柏林自由報”的訂戶在六個月之內，自一萬戶增加到一萬四千戶。

就我個人，以及作為一個從事商業的人說來，這種普遍

的仇恨有着很不快的後果。我釋放後不久，因有要緊的事，爲我的營業到德意志西北部和萊因河下游一帶去。幸好以前我從未到那裏去過，也沒有人認識我。我用着假名字住旅館，因爲如果用自己的真姓名，沒有旅店主人肯收留我了。每天我都得聽人家對我們的黨及對我本人作最惡毒的詈罵。當我送上樣品時，我在商店手中所得到的待遇正如預料中的一樣。哈勒的一個商人看中了我的樣品，向我要一筆相當大的定貨，可是等我一交給他我們的商號名片時，他便把定貨取消了。別的人簡直就拒絕與我們來往。這樣奔走了六星期回去時，所賺得的錢還不够我的花費，雖然我已是盡量節省，並且自己提重約二十磅的樣品箱子，只爲了節省力夫的錢。

一回到家我就立刻投入競選運動中。俾斯麥素來最能把握時機，勸服了聯邦會議來解散帝國議會，其實在第二次謀刺皇帝的事發生以後，就是當時的帝國議會也已有大多數人願意投票贊成壓制條例了。但是俾斯麥還有其他的目的；他要擊破國家自由黨的勢力，推行他的保護貿易政策。在他所作的一次競選演說中，他高傲地幾乎要背棄迄今以前所盛行的經濟制度了。這篇演說詞說到帝國議會中佔優勢的律師、官員與大學教授等——就是那種不直接生產的人——使得會中的辯論都帶着理論的氣味。政黨的仇恨，各派間爭權的貪婪和各領袖的野心使得帝國議會成了演說表演的舞台。大部分的代表並不從事真正生產性的職業，既不從事貿易，又不從事工業、農業或商業。這使浩大的國家利益的代表都交給那些並非生產者，而只是倚靠薪水、財

產、俸祿與投資爲生的人的手中。

這次選舉的競爭比以前的那些次更要劇烈。所有的資產階級的黨派聯合了起來反對我們。當時的口號是“帝國議會中不得有社會民主黨人”，甚至激進派的報紙也如此說。

我作德累斯登和萊比錫的候選人。在德累斯登是鼎足而三的競爭：一個自由黨員，一個保守黨員和我自己。第一次投票，我得九千八百五十五票，那個保守黨得七千二百六十六票，自由黨得五千四百一十票。第二次投票是保守黨與我兩人的競爭——第二次投票的日期，他們狡猾地就定在我的敵手七十歲生日的那一天——我以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六票對一千〇七十二票當選。在萊比錫，我得了五千八百二十二票，比上一次選舉多了六百票。我們的黨共推出了九個候選人，在第一次投票中僅兩人當選。

這樣，社會民主黨並未被排除出帝國議會去。即使就所得票數而言，雖然在我們的敵人大力進行宣傳鼓動反對我們並在某些選區內施行恐怖主義之後，我們却比原來所預期的得到更好的結果。我們在第一次投票中得了四十三萬七千一百五十八票，與一八七七年的四十九萬三千四百四十七票相比，只失了五萬六千三百八十七票和三個議席。

這次選舉結果是有利於俾斯麥的保護貿易政策的。國家自由黨自一三七個議席減到一〇六個議席，激進派自三十九個議席減至二十六個議席。他們所失去的議席給保守黨得了去，也有些給中央黨得了去。

現在俾斯麥有兩份多數票可由他支配——一份是國家



2 033 4510 2

自由黨與保守黨合成的多數票，可支持他的壓制法案，另一份是保守派和中央黨合成的多數票，再加上國家自由黨的右翼，也可支持他的保護貿易政策。這樣，否認有階級覺悟的工人的政治權利並用關稅加重人民羣衆的負擔的新時代就開始了。爲了通過反社會主義法律，新的帝國議會定於九月九日召集。

這齣戲已準備就緒，就要開始了。照安排好的是一齣悲劇，劇中的經過是將社會民主黨作爲君權與資本家的利益之祭壇上的犧牲品。但是，像以前一樣，這齣戲沒有演成；我們把這齣悲劇轉變成了喜劇，那位力大無窮的漢寇利斯走上前來，本要用他的短棍來打倒我們的，却在與他所痛恨的敵人作了十年可恥的戰爭以後自己跌倒了下去，他自己的屍體阻塞了這個戰場。

在從前神聖羅馬帝國的時候，前進中的軍隊的呼號是“教皇派(Guelph)歸我！保皇派(Ghibelline)歸我！”現在却是“俾斯麥歸我！社會民主黨人歸我！”